



时代鸿爪

石西民

新华出版社



五十年代时的作者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辑了作者在近五十年间发表的新闻通讯、时政论文、杂文和新闻学专论等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从一个个具体的侧面深入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还可以看到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留下的坚实的脚印。收入本书的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写的战地通讯，在解放战争时期采写的关于国共和谈的通讯，保存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书的对象是新闻工作者、史学工作者和广大青年读者。



应似飞鸿踏雪泥

(代序)

林 放

能够见到西民同志把他从事新闻作品的作品编辑出版，在我是非常高兴的事情。高兴，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同业，都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平时总觉得：比起其它领域的作品来，新闻领域的作品是常被冷落的。在某些正统派的评论家看来，新闻体裁的通讯、特写、评论、札记等作品，终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就是我们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也很少想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编集成书，以文会友。现在西民同志破了这个成见，出了这本书，为我们新闻圈增添了热闹和活泼的气氛，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

这本书取名《时代鸿爪》，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拿苏轼的名句来概括这本集子的内容，是说在这些文章里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就象飞鸿在雪泥上印下指爪一样。这可能是作者取名的原意吧。但是我却更其喜欢另一种“题解”。也不妨把这些文章看作是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年代留下的梦痕和脚印。究竟是时代这个飞鸿留在作者笔下的指爪痕迹呢，还是作者这个飞鸿留在各个时代的指爪痕迹呢？倒有点象“庄周梦蝶”的寓言：“不知周之梦为蝴蝶焉，蝴蝶之梦为周焉？”我看，两者都说得通，而且都合乎实际。



着眼于时代的痕迹来看待“鸿爪”，我们从本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前后，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时期的世态和国风。这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从黎明前的黑暗到“明明的天”。它包括着三座大山的崩塌，两个中国命运的搏斗。风云变幻，惊心动魄。这就是印在这本书里的“时代鸿爪”。

倘使着眼于作者在各个时期留下的梦痕脚印来看待“鸿爪”，我们从这本书的篇章中仿佛看到一个作者的面影：是那么一个旧时常见的文弱书生，他是怎样搭上了时代的脉搏，一步一步地从纯真的爱国主义走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他又象一个弄潮儿驾一叶之扁舟，在那狂风骤雨的黑夜，冲破汹涌澎湃的波涛，执拗地朝着远处一闪一闪发光的灯塔航行。

不论是时代在作者笔下留下的鸿爪，或是作者在各个时期留下的鸿爪，现在都已成陈述了，有的已经恍如隔世了。然而，“六经皆史也”，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都是值得今人回顾和后人追念的。它决不象苏轼原诗所说那样只是偶然地留下的指爪，也不会象苏轼所感叹的那样留下指爪之后就“鸿飞冥冥”，不计东西。应该说，时代的指爪是理有固然，有它的因果缘分的。而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也得对他所经历的时代负责，对他自己印下的指爪负责。从这点意思开来说，编印这本文集而名之曰“时代鸿爪”，那意义是颇为严峻的。

西民同志为人简易谦和。他的谈吐文风亦如他的为人。我们相识四十多年了，平时见面机会却不多。抗战期间同在重庆，即使偶然同坐冷酒摊摆龙门阵，也很少听到他说起自己的经历和笔墨生涯。所以本书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以前未曾知道的，这也增加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他那时在著名的《新华日报》工作。在蒋介石的大本营办革命报纸，有如踏虎尾，捋虎须，工作条件十分险恶。那时当记者，出门就干采访，回报社就当编辑，写通讯，撰评论，举凡古今中外，国计民生，社会现象，什么都写。这样



的记者生涯，正如这本书所收文章体裁的既广又杂，还是值得我们回味的。而且那时办《新华日报》，不止要从事笔耕，实际上是在白区做党的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些都是属于时代的“鸿爪”，值得介绍给如今青年一代的同行知道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花开花落，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现在彼此都已年逾古稀，白发盈颠，难得再有巴山夜话，浦江雅集的意兴和机缘了。所喜见到这本《时代鸿爪》，有如晤对老友，想象作者生平，也可以略抒故旧情怀。出版之际 作者特意让我写点闲话，附在书里，这是我的荣幸，自然是很愉快地写了这么一些感想，表示高兴，并以之请教于作者和读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应似飞鸿踏雪泥（代序）

经济研究

- 一、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 3 ）
- 二、“禁用现洋，只用钞票”是怎么一回事？……………（ 8 ）
- 三、日本往哪里去？……………（ 14 ）
- 四、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书……………（ 19 ）
- 五、“开发华北”问题的检讨……………（ 25 ）
- 六、为什么川越会升任驻华大使……………（ 30 ）
- 七、一笔总帐……………（ 33 ）
- 八、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 40 ）
- 九、“誓以青年身心保卫祖国”……………（ 47 ）
- 十、重弹旧调的“中日经济提携”……………（ 49 ）
- 十一、日本军部……………（ 52 ）

新闻通讯

- 一、北行途次……………（ 59 ）
- 二、国防线上的石家庄……………（ 63 ）
- 三、平津失守与平汉前线……………（ 66 ）
- 四、苏州河中的五日夜……………（ 72 ）
- 五、熊式辉之言……………（ 76 ）

——江西省的动员民众办法

- 六、记九江姑塘战事……………（ 79 ）
- 七、赣北战地见闻……………（ 82 ）



八、战地访问李汉魂将军	(85)
九、大战火烧山	(89)
十、庐山脚下游击战	(94)
十一、金轮峰歼敌记	(97)
十二、一年来的新四军	(100)
十三、江南游击区横断面	(105)
十四、在新四军与四个俘虏的谈话	(115)
十五、陈毅将军访问记	(120)
十六、越过江南敌人封锁线	(127)
十七、地方游击队是怎样产生的 ——记丹阳游击队	(133)
十八、较场口事件目击记	(141)
十九、陪都又一大暴行大血案 暴徒行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	(144)
二十、中共代表团招待记者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	(147)
二十一、在法庭上 ——较场口血案听审记	(150)
二十二、下关惨案的经过	(155)
二十三、南京谈判	(160)
二十四、南京一周	(165)
二十五、只打不谈的一周	(169)
二十六、渺茫的庐山	(173)
二十七、“等”时间	(176)
二十八、时局的激流	(179)
二十九、恶化的局势	(185)
三十、打，骗，拖！	(189)
三十一、绝路	(192)



三十二、“拖”“骗”已到尾声了·····	(195)
三十三、歧途·····	(199)
三十四、西洋镜快拆穿了·····	(203)
三十五、南京之秋·····	(207)
三十六、和平——已经死掉了！·····	(210)

日本研究

一、与敌国内反战的人民团结起来·····	(217)
二、清算一年来的日寇·····	(223)
三、悲惨的日本劳动者·····	(230)
四、论米内内阁·····	(235)
五、黯澹的近卫内阁·····	(246)
六、近卫内阁改组的意义 ——论小仓、丰田、铃木三人之登台·····	(254)
七、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258)
八、由近卫到东条·····	(260)
九、日寇所谓“临战体制”·····	(265)
十、东京大狱·····	(272)
十一、为美国借箸一筹·····	(275)
十二、挽救太平洋战局危机的关键·····	(280)
十三、日汪关系演变的新阶段·····	(285)
十四、人类命运之键·····	(296)
十五、重大而长期的战争·····	(299)
十六、苏日关系与盟国团结·····	(304)
十七、论日寇攻势的新阶段·····	(310)
十八、彻底粉碎日寇“求和”阴谋·····	(317)

专论·杂文

一、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	(327)
二、孙中山先生与宪政·····	(332)



三、孙中山先生与苏联·····	(341)
四、为民主的中国奋斗到最后·····	(346)
五、忆黄源·····	(350)
六、在战地的丘东平同志·····	(354)
七、论慎独·····	(356)
八、爱祖国·····	(359)
九、法西斯荒谬的国家理论·····	(361)
十、说“左涂右抹”“东摆西摇”·····	(367)
十一、清朝文化思想统治兼记明末清初 几个有操守的学人·····	(369)
十二、送鹿地亘夫妇回国·····	(374)
十三、悼念之余·····	(378)

政论·回忆

一、关于思想工作·····	(383)
二、对学术研究的三点希望·····	(391)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岁! ·····	(398)
四、喜见《辞海》出版·····	(408)
五、对《江海学刊》的一点希望·····	(412)
六、忆获秋同志·····	(414)
七、对少奇同志的怀念·····	(418)
八、政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生命线 ——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的一点体会·····	(423)
九、纪念郭老 学习郭老 ——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感怀·····	(430)
十、郭老与《十批判书》·····	(439)
十一、在云岭叶挺住过的地方·····	(444)
十二、孙冶方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448)



新闻研究

- 一、两年来本报所组织的几种群众运动…………… (455)
- 二、关于新闻写作问题
——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全军新闻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60)
- 三、悼念人民的新闻战士浦熙修…………… (467)
- 四、学者与战士
——回忆潘梓年同志…………… (472)
- 五、祝《金华报》复刊…………… (484)
- 六、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
——纪念《新华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 (486)
- 七、忆《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华岗同志…………… (500)
- 八、毛泽东同志与《新华日报》…………… (507)
- 九、增强党性 深入群众
——学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513)
- 十、悼念田伯萍同志…………… (517)
- 十一、学习恽逸群同志…………… (520)
- 十二、附录 一九五七年二月在上海
新闻座谈会上的发言…………… (526)
- 十三、后记…………… (532)



经 济 研 究



亢旱后的浦江农民生活

一、旱灾的种种相

浦江县是浙江省腹部的山丛中的一个县，人口二十余万，每年出产谷米仅敷本县的民食；至于人民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费用，大半要求之于副业的收入，如茶叶竹炭树木等的输出，这是指往年年成好的时期说的。浦江的国民经济素来贫瘠不发达，加以受近年来普遍全国的经济不景气影响，浦江当然不能跳出这个悲惨命运的圈子。除粮食价格一般下跌不计外，拿副业各部门的货物价格来看，平均皆比二年前跌落三四倍，例如目前盐价极贵，农民入山砍伐树木或毛竹，再背负城中出售，所费时间至少一天半，三年前可以卖得一元二角，现在最多只能卖四角钱，如此尚不足购买一斤盐。农民的痛苦可想而知了。

可是今年竟又遭到并不偶然的旱灾！浦江亢旱不雨达三个月之久。一向靠天吃饭的浦江农民，秋收是绝望了。一切半殖民地农村里灾害所显现的极大威力，它与社会的原因所交织而成的各种惨痛祸害，都加之于浦江的贫困大众——农民身上了。

因为天旱得过于长久了，乡村的溪流中再也看不见半点水，农民们除了每日老远去寻点吃的水来以外，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禾苗枯槁下去，靠农民的手足胼胝是根本抵御不了灾荒的袭击的！



秋收的时间将到了，这本来是最忙的季节，可是今年十分空闲，有的农民一家空着肚子整日闷睡在床上不出门。在各处的田野中，能够看到田中长着少数半稔的稻禾的大多都是地主所有，这是因为地主的田本来要比一般农户耕地的水利及肥沃条件都要好些。乡下农民对我的谈话，除诉说自己今年要饿死、无办法之类以外，就是说某某大户生活好，他们今年所收获的谷倒不一定比往年少。事实也正是如此的。

在这里再来谈谈浦江一般佃农负担的田租情形。浦江的田租一般通行三种形式：一种是钱租；另一种是谷租，规定每年佃户论亩数应挑若干斤谷与地主；其它一种是分租，由佃户于收割前通知地主，届期地主派人来田监视，迨收割完毕，双方平分，然后由佃户将地主的一份挑到地主家去。田租的形式是这样三种，而习惯上出钱租的佃户，须在头一年将田租钱交于地主，然后次年种田，所以租钱是先一年已经交出的。今年遭逢空前的旱灾，以货币为田租而交给地主的佃户，损失了农业生产上的成本费，而这一笔租银，也只好自认晦气了。

以第二第三种形式纳租的佃户，在往年每当地主差人来实地察勘时，不管自己如何贫困，也得拚命去设法弄点酒肉之类来敬飧贵宾的。今年究竟怎么办呢？佃户是心急火燎的。

生存逼着农民，除开那些过分的弱者外，即使你象一只茫然无告的羔羊，也总要被逼起来挣扎求生的。

二、饥饉中的农民生活

浦江也和其它各旱区同样，米价是随着秋收绝望而日益腾贵。这对于饥饉的农民大众，当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农民的苦难远不仅止此：因为亢旱更使农村金融涸竭，他们手中大都没有钱，农村中的副产品也无力经营，加以如前节所述其价格又非常低廉，使大多数贫农雇农没有条件和机会搞副业或出卖他们



的劳动力。这样，浦江空前的荒歉，配合着这种相对的劳动力过剩，就更具有破坏力了。

处在饥馑线上的浦江农民，怎样来挨度这当前的苦难呢？无辜的弱者唯有绝望地自杀。这种悲惨事情相继发生，且已引起沪杭各报的注意了：

“杭州六日电：浙省空前灾旱，已成绝望，自杀到处传闻，顷有浦江县来客谈：该县东乡武塘地方，一家老幼男女十一人，均服砒霜自尽，又有某村一家八口，亦均服毒毙命，惨绝人闻云。”

至于下列各点，都是作者所闻所见，颇能反映农村不安的情境：

一、在浦江东乡一带的村落里，常有青年农民三四十人，成群结队地到邻县去挑私盐来贩卖。因为浦江盐价特别高昂，贩运私盐，每天可得余利半元左右。不过在各县镇关卡缉私队的严查枪击下，他们常冒丧失性命的危险，然而饥馑压迫着他们还是趋之若鹜。

二、稻熟的时候，农民自己的田亩上是一无所有，但是地主的田庄上有些收获。因此，常有结队农民，公开地将地主田地上的稻谷，强行收割回来。每逢晚上，大批的穷苦孩儿，也偷偷地到地主田中截取一点稻头，藉以充饥，那更是风行全县。

三、与浦江交界的建德地方，今年至少也同样苦旱。那儿很多的雇农苦力，都是浦江人，月前大批地（约二三百人）联合起来，将一位姓钱的大地主的一片森林砍伐殆尽。他们将砍下的树木，挑到东关（建德东乡一大镇）各大店家门口，强求收买，以换取盐米之类。

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灾后赌风的盛行，尤其是“花会”。据作者估计：单就“花会”一项来说，全县大小总有二百余处，分布于浦江各地。譬如浦江东乡黄宅市等地的



“花会”，因为范围较大，每日夜竟有五六百元的输赢，操纵这些“花会”的往往就是当地的豪绅、恶霸，他们可借此赚不少的钱财，使亢旱后的浦江农村，更迅速的崩溃，社会秩序更加败坏。据说有一天，县公安局长亲自去拜访一位“花会”大王，劝他停止主持“花会”，但毫无结果。那位“花会”大王借口天旱无事，而且说自己输了一笔钱非待捞回血本，决不停止，而公安局长无可奈何。这是多么滑稽的交涉！

亢旱后的浦江农民，就是生活在这样激荡、衰颓的空气之中。

三、政府与乡绅对于旱灾的救济

浦江县府的财政，今年更为困难，因为占主要收入的田赋，虽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减收已成定局。事实的经过是这样：当农民日夜忙于辟水的四五月里，县府严令全县各庄书（即田赋征收员）开征本年上忙钱粮。但是当时，农民日夜地在艰困之中讨生活，当然逼不出钱来。因此全县一百二十余名庄书，就无法应付县府对于现款的急需，结果相继被押入狱。可是以拘禁来驱使庄书更严厉地向农民强征田赋，只能加重农民的实际穷困。所以直到现在，政府还是不能预定重新开征田赋的日子。而近月来要求减免田赋的声浪，又随着灾情加深而日形澎湃，县府财政已走到最后的穷途了。那末，县政当局哪里还谈得上救济呢？

浙江省办理积谷，去年来就在积极进行，浦江各区各镇，也在县长区长乃至乡长的监督之下，加紧举办，规定农家每当秋收时，须缴纳占收入百分之一的积谷。今年浦江虽然遭受了这样严重的旱灾打击，政府当局还是三令五申地热心催收。譬如最近县政府更异想天开，定出这样的办法，即将现在征收不起的积谷，当作它已经收起，复以借贷的形式，借给出纳积谷的农民本人。这种为“公”的努力方法，其巧妙真是令人赞叹不止！他们哪里



会顾到农民的死活，真是救济云何哉！

固然县长科长有时也下乡勘察灾情，然而他们实际所干的工作，就是坐了轿子，带着卫兵，到某个乡绅家里吃顿酒饭，打几圈竹牌而已。此外县府为了调查灾情实况，也曾发下两种十分繁复的表格，要农民填具呈报。谁都知道，大部分的农民都是目不识丁，那末，这事的办理，就有赖于地方的绅士。譬如有好几处乡长为了填具这些呈报灾荒的表格，竟雇用了几个专门人来抄录，他们的薪给要由各农户负担。这样，农民在没有受到赈济的半点恩惠以前，却先要赔出不少的金钱。

省政府也派有人员来视察浦江的灾情。他们除了享受县长的盛宴外，有一天曾偕粮柜主任坐着汽车，风驰电掣地在县城附近的浦钟汽车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他们所喝进的凉风，一定更多于所调查得到的灾情！

至于地方上的“善良”绅士对于灾荒的救济，也同样的糟糕。浦江的乡村，十九都有严密的宗法组织，即每一个村庄里，都有巍峨的宗祠和丰富的公产，而且民国初年他们也曾办过积谷。所以照理说来，这些宗祠的余荫和农民的血汗，当这大难来临的时候，应该全般拿出来倡办赈济平糶；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每族的公款积谷等等，皆操于那些族长绅士手里，对于自己没有多大利益的救济事业，他们当然延而不办。何况政府前曾通令各乡，严禁动用原有积谷，他们就更有借口了。不仅如此，他们当这灾荒年头，反可乘此危急时机将公家银钱和积谷，以高利借给一般农民，盘剥厚利，然后据为己有。

亢旱后的浦江农民，是得不到任何人的救济的，真正能解救他们的，还只有他们自己！

（原载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十二日《中华日报》，《中国经济情报》第一卷，第二十、二十二期）



“禁用现洋，只用钞票” 是怎么一回事？

十一月四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在这天早晨财政部公布了“新货币政策”的通令。

这个“新货币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的钞票为法币，停止兑现；

（二）所有银币杂银一概收归为国有，禁止使用；

（三）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稳定法币对外汇价。

这三个办法实行以后，据说有下列五种作用：

第一，外汇可以稳定了；

第二，工商业可以繁荣了；

第三，财政收支预算也可以适合，孔部长说：“十八个月以后，财政预算保定可以平衡。”

第四，币制也能够统一了；

第五，“绝对不是通货膨胀。”宋子文先生说：“现在所流通纸币的准备金超过十成以上。”杨荫溥先生也说：“目下纸币发行只有四万三千万元，就是发行到九万万元，也还有六成的准备。”

“新货币政策”既然是这样的好，我们只有预祝它前途顺



利。但在祝祷中，我们要同时看看它的前途和已经发生的事实。

一 外汇能够稳定吗？

怎样叫做外汇呢？外汇就是中国货币对于外国货币汇兑的比率，就是一元中国货币对外国货币能够值多少。这种汇兑的剧烈变动，对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是很不好的。譬如说，今天进了一支值五块钱的钢笔，明天因为外汇跌落，可以不必五块钱就可买一支钢笔，那末这个进口商人就要倒霉了。同样，经营出口贸易的商人也要担这种汇率剧烈变动的风险。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利用这种降低外汇的手段把大量商品向外倾销，我们中国的出口贸易也真不知吃外汇剧烈变动的多少亏。现在据说这种外汇能够稳定了。宋子文先生说：“过去因为汇率非常不安定，所以对外贸易带有赌博性。现在政府规定由中、中、交三行大量买卖外汇，以后法币对外汇率就能够稳定了。”是这样容易吗？这“大量买卖”还必须有几个条件才行。要哪几个条件呢？第一，必须要保证不滥发纸币，就是说中国的纸币信用好。这样才可以与外币取得一个相当稳定的比率。中国的纸币信用怎样呢？前些时候纸币是可以兑现的，可是内地时常还要发生钞票贴水的现象，现在停止兑现了，纸币信用将会怎样呢？谁都不敢担保。第二，要统制对外贸易。这一个条件在中国关税还没有自主的现在是不可能的。第三，一定要有雄厚的平准外汇基金来控制汇率。譬如说，英国这种基金有三万七千五百万金磅，美国有二十万万金。可是因为国际汇兑战争非常剧烈，这种基金损失数目是很大的。英美两国现在还存多少，大家已发生疑问。中国呢，据最近估计，上海存银只有三亿三千万元，而且有一部份还是外商银行的。虽然在外埠也封存了一点，但是要想拿来做平准基金，应付大量入超的中国汇率，这一点存银数目实在是太微薄了。退一步说，外汇即使的确可以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和平地让我们过去的。



日本不是在说这种举动是威胁他们吗？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再用平准基金的大斧把对华汇率仍旧抑低吗？那末，可见外汇稳定的前途是很可疑的。

二 工商业能够繁荣，自然是最好的。

哪一个同胞不希望“景气来临”呢？失业的饿着肚子的同胞固然天天这样希望着，就是老板们也何尝不在憧憬着能够“一朝开泰”！

然而，究竟是什么恶魔使工商业这样零落呢？这是值得研究的。真是由于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吗？不是的，一千个不是！通货紧缩固然使物价降低，使农民穷困，使工商业交敝，然而这不是最基础的原因。最基础的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内战、封建的剥削和连年的灾荒。仅仅靠增加通货，不除去这许多恶魔，是救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

再退一步说罢，假定通货增加，工商业能够得到低利资金的润泽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连这一点也不会实现的。货币制度改革以后不是只听见如何恢复地产活动的声音吗？地产业的畸形繁荣，是不是对工商业有益处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是不会的。地产业繁荣，那不过使大批有用资金流入到不生产的地产投机事业上面去罢了。工商业呢，恐怕是一点好处也不会有。

三 财政收支用什么方法来平衡？

工商业繁荣了，进出口贸易上升了，于是各种税收也大量增加，这样，自然财政收支也就可以平衡。不过，根据我们前二节的说明，这种如意算盘并没有十分把握。我们前面说过，工商业是不是会繁荣，进出口贸易是不是会上升，现在都还成疑问。然而政府每年军事费和债务费支出都非常庞大，平衡预算，自然是最要紧不过的事情。发行公债吗？增加税收吗？都困难重重。那



末，有实现平衡的方法吗？

有的。把所有的现金准备都集中起来，把钞票的价值贬低下去，把这一部份现金超过钞票价值的部份拿来发行新钞票的准备，拿这许多新钞票来作为财政的收入。这样，财政收支就可以平衡了。

杨荫溥先生说：“华币早已脱离实际价值，照当日国际银市，实际价值高过币值百分之六十五。”因此，他接着说：“目下上海存银有三亿三千万元，照上面的比率，实际等于五亿四千万元；目下纸币发行仅四亿三千万元，故即增加到九亿元时，仍可有六成准备。”是的，只要纸币再多发行一些，纸币价值更往下跌，现银与纸币价值游离更大，那末现金准备不是更加丰富起来了吗？

四 任何人都希望币制能够统一啊！

上海钞票拿到北平去用要贴水，南京不用上海的银角子，这是多么的不便！边远省份更不用说了。现在，看事实吧：

广东接到财政部的通令以后，接着就发布命令，规定以广东毫洋省钞为法币，收现银为国有（其实是省有），停止兑现。

平津一带现银并不南运，日本竭力反对华北现银向南方输送。

山东也舍不得雪白的现银向省外流出。

外商银行并没有遵令将现银拿来掉换法币（英系银行除外），日商银行公开表示拒绝现银引渡。某国浪人且以一百四十元纸币掉换一百元现银。

这许多现象说明什么呢？现银并不能集中而是要继续向外流出，币制也并不能统一。



五 “绝对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多苦呵！币值贬低了，物价上腾了，譬如说从前一元钱买的东西，假如在通货膨胀二倍之后，要二元才可以买到；从前有十元一个月收入的人，在这样通货膨胀以后，只等于有五元一个月的收入。这还得了么？

好在有人向我们担保“绝对不通货膨胀！”

事实呢？从前一元钱可以兑换铜元三千四百的，现在只有三千了（实际上，兑换店只给我们二千九百六）。假使拿去买烧饼，从前有一百三十个烧饼可以买，现在一百个都还不到。

各业都在加价了，这也许是“奸商操纵居奇”，“故意抬高物价”。然而他们居然登了煌煌的广告呢，昨天“申”“新”两报上面不是登着面包业从十六日起要增加二成半的价钱了吗？

不要紧，这都不是改革币制的本意。市政府和社会局正在努力取缔。可是在没有取缔成功以前，我们怎么办呢？

六 会不会做帝国主义货币战争的牺牲品呢？

日本报纸在中伤：中国币值贬低四成啦！中国和英国订结二种（一千万镑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借款，一千万镑以全国铁道收入为担保的信用借款）秘密协定啦！我们都不相信。

美国某专家表示：“中国币制，事实上已附从日益扩大的英镑区域”。我们也不相信。

然而今年春天二千万镑借款的传说，三月间“沙逊的镑券计划”，五月里哈孟德将军来华考察铁道，九月间的罗斯爵士来华，币制命令发布后的独有英商银行遵守中国法令，港币的同时贬值，等等，这一连串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英国这样努力援助中国的时候，美国却冷冷的表示说：“在不妨害美国在华利益之下，美国决不干涉！”美国“白银派”领



袖毕德门说：“以后银价将继续上涨，国际间通货战争，将更加剧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日本从这次币制改革以后，天天在表示说：“这是中国联英抗日。”“这是违抗日本领导下的中日满经济提携。”而且说，它绝对反对任何秘密借款，致诱中国于共管。又说，中国币制改革事前不与日本磋商，简直是侮辱日本，并且决不让它成功。这种种愤慨声浪，又是表示什么呢？

在争夺中国货币权比较和平的方法用完了以后，我们能保得定他们不会用真刀真枪在中国领土上面厮杀吗？

那末，会不会做帝国主义货币战争的牺牲品？我们谁也不能说“不会的”。

（原载《生活知识》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版）



日本往哪里去？

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两个大法宝来挽救它的危机。

第一个是通货膨胀。自从一九三一年年底停止金本位以后，日金对外汇价贬低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这几年来日本的工业和对外贸易，在牺牲劳苦大众和汇兑倾销之下，就渐渐繁荣起来。物价上腾了，输出增加了！近视的人，真会惊异起来，以为日本已克服了恐慌这一大怪物了。

第二个是军事工业的景气。这是怎么说呢？我们晓得，日本侵占东北以来，军费一年年的膨胀，一九三二年到三五年短短的四年当中，军费的支出一共三十五亿一千六百多万，明年度陆海军预算，又是十亿五千九百万元。在这一笔庞大的军费中，有一大部份是投入国营和民营的军需工业中去的。据今年七月间日本工业新闻发表的调查，从昭和七年到昭和九年三年间，陆军方面投入军需品工业的金额，总共算起来，是九亿元光景，其中百分之八十（约七亿元）是被支付于民营公司的。海军方面投于民营工厂总有十亿左右。

由于每年数亿元巨额资金的投入，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业部门，象制铁、制铜、机械制作、化学工业、水泥以及其它工业部门，的确一天天繁荣起来了！

这二个大法宝，克服了日本的不景气了！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金融产业巨头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



不过，欢欣鼓舞的也只是极少数的金融巨头罢了。那鉅额的军需定单百分之七十是投入拥有八百万资金以上的大公司中的。根据一个专家的估计，真正沾到军需工业景气利益的，全国不到三千人，其余工业主就只有听听“好景气”的呼声，勉强维持都很困难呢！

四年来在东北的投资开发，日本的金融巨头如三菱、三井、安田、住友等财阀都获利倍蓰，他们是更加发胖了，但是那大多数日本帝国的平民，究竟得到些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劳工的生活状况吧！在军需景气下的机械工业，近四年来，工作人数增加半数以上，但是定额工资指数，却反一年年的往下减退。纺织工业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工业部门之一，工资指数减低三十以上，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形大致相同。

失业工人非常多。许多工厂差不多全数可以雇到熟练工人，却招临时工人。日本劳动者被剥削的程度的深刻，与半殖民的中国工人几乎没有两样。知识分子的失业，也是非常惊人的，据最近文部省调查，平均每县知识分子（中学以上毕业）有一万四五千失业，其中六成留于农村变为高等游民，四成则集中于大都市。

再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农民生活吧。农民生活的痛苦，我们只要摘引一段东京朝日新闻所载关于日本青森县农民穷困状况的报告就很明显了：

“救济的呼声虽高唱入云，但事实无半点动静，农民无力买便宜米，只好以茶汤、马铃薯汤来替代稀饭，就这样一天能吃三顿的家庭已是莫大的幸福了！二星期前，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因肚子实在过于饿了，就在树林中摘了不知什么植物的果实来吃，结果不到二天，全身发肿死了！”

日本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农民大众的贫困，也影响到他们对于自然力侵袭的防御。这几年来，日本内地的风、水、旱



灾，也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地频年不绝了！

日本内地农民生活的痛苦和营养不良，已成为目下日本一大问题，大多数的农民，终年很少有吃肉吃鱼的机会，农村工资每日二十钱（合中国钱不到二角），工资的低落真可惊人。

日本这几年来的景气，完完全全的建筑在数千万劳苦大众过分被榨取上面！但是今年来，这繁荣也遭到很大的打击了。景气已变成一阵清风化为乌有。这原因可以归结到两点来说：

第一，几年来日元贬值，汇兑倾销的结果，一般产业部门的生产力追逐着繁荣的幻影而飞速上升。但是因为广大劳动者生活的日趋恶劣，购买力继续降落，因之国内市场也一天天缩小。国外市场呢？“黄祸”的呼声，排斥日货的事实，几乎满布全球，国外市场的开拓就少有希望。因此一个巨大的恐惧——生产过剩——就产生了。从轻工业部门漫漫蔓延到重工业部门，棉布、人造丝等的价格一天天往下跌，证券市场的股票行市也开始暴落。水泥、人造丝、矿业、肥料跌价，接着重工业的股票也开始下跌。今年六月间的市价，就比去年三月里的要跌低百分之十五。这一连串事实，使得那些金融巨头，也含悲苦笑了。

第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更深刻化了。我们晓得，日本停止金本位之后，日本银行及其它赋有发券权的银行如朝鲜、台湾银行等兑换券的发行额是一年年增加的，一九三一年总计只有十四亿余元，到去年已增加到十八亿余了！此外公债发行额的增加非常可惊，日本政府公债在一九三一年冬天的时候，一共不过六十一亿元，今年六月增到一百零四亿，地方债在四年前不过十六亿八千五百万元，到今年六月突然超过二十四亿以上，国债的总额快满一百三十亿了！

这几年来，日本虽然增发了不少的不兑现纸币，但是一方面由于政府严厉的防止资本逃亡，一方面运用公开市场政策（随时买进或卖出公债，以调节国内经济因通货动摇所引起的变化），



总算一时阻止了恶性膨胀（币价狂跌）的危机。可是现在是不行了。

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军阀口口声声喊着“非常时期”。它一口气吞下了东北，还更在积极制造华北的自治。并且，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上要侵入苏联的西伯利亚，梦想摧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海洋上又要打击美国，想独霸西太平洋的主权。于是，日本的军阀，疯狂地喊着扩张军备！但是庞大的军费究竟向何处去募集呢？平民租税负担是很重了，增税显然是不可能。发行公债吗？公债已达百亿以上了；日本“大藏省预金部”及其它各重要银行的存款，快要全数变成公债了，害得金融巨头也恐慌起来。假若再照样滥发公债以填军阀的欲壑，那末恶性通货膨胀的危机，显然是在眼前了。

金融巨头的代言人高桥藏相高喊着“公债渐减主义”，拚着他的老命与军阀们争执着削减预算要求额，这不是很明显地表示金融巨头也害怕军事无限扩张的结果，会招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解体吗？

对中国的侵略正在一帆风顺时候的军阀，绝对不会对金融巨头低首。一九三五年华北事件的发生，也就变成它自救的灵药；

“军部通”的小岛精一氏不是也说：“此次华北事变，对于打开日本迫切的反动恐慌，为绝对唯一的要件，从此可以打破日本逐渐实现化的生产过剩危机，因而能引起大规模的新发展景气的效果。”

谢谢灵丹的神效，中国还是四年前一任别人宰割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费一兵一矢安安稳稳地导演下了一幕华北自治的喜剧。日本的金融巨头又好欢呼起来了，市场开拓了，过剩商品有销路。华北占领了，“光荣”可以刺激人心。公债又可以增发。总之，日本的前面好象又充满光明了！但是，今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真能因华北事件的成功而挽回厄运吗？



不要过分的乐观吧！日本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年来困苦生活的体验，已经深深地对空虚的“光荣”抱无限的失望了！我们只要看最近劳工运动是如何急进，轰轰烈烈的横滨一万人的海员罢工是多么英勇，劳动者左倾是如何普遍。今年“警视厅”在北海道一带检举“全国劳动协会”重要分子不下二百余人。但是这种高压手段，能制止劳动者的活动吗？在农村中随着破产的加深，两极化非常迅速，对现状不满的呼声，几乎遍及全国各乡村，许许多多失了生计的农民，皆在寻求他们的出路。向左呢？还是向右？总之农村的不安是很显著的了。

至于那许多为帝国开拓领土而喋血沙场的武士们，他们生活的痛苦，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兵士每日定额平均只有十八钱，折中国钱不到一角八分。“大和魂”的武士们，频年在沙场拚命流血的结果，眼见一家老小全陷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他们总会有一天恍然大悟，“帝国的光荣”是多么空虚而可笑的一个东西啊！

日本究竟往哪边走呀？最近的将来，事实会给我们很好的答复的！

——一九三五，一二，三一。

（原载《生活知识》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



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度营业报告书

最近，一年一度的中国银行营业报告书又在报端刊布了。凡是留心整个中国经济状况的人，对这—个洋洋数万言的报告书，差不多都是非常注意的。因为以中国银行的地位、财力和人力，大家都相信它能够对这杂乱无章的中国国民经济，给我们—明确的认识。

但是，假若我们完全信任这一报告书，并且要想在这一报告书中更彻底的去认识—番中国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譬如经济崩溃究竟到了怎么样的程度？为什么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的衰落不堪，有的却蓬勃滋长？以及国民经济的前途又怎样？等问题的话，这是千错万错的事情，结果你一定得不到—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

什么缘故呢？因为中国的银行资本，彻底的是一种买办资本，中国银行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我们知道，买办资本的机能是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代理人，它的任务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向殖民地大众进行榨取；而它自身就在帝国主义者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大众的汗血的过程中，分润—点余沥而生长起来。所以它虽然表面上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门，与其它国民经济部门站在—条战线上，而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譬如近几年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全陷在迅速崩溃的过程里面，农业、工业都难逃—厄运，但是银行业反而畸形地繁荣起来，这多半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深入榨取加紧的缘故。这是它第



一个特征。

中国的买办资本还有第二个特征。因为中国到现在尚逗留在半封建的经济组织状态底下，所以买办资本为了要顺利地为帝国主义者在国内开辟广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它必须勾结许多的封建势力方有可能。

大家都晓得，现在中国国民经济是一天天衰落，农村破产一天天深刻，工厂倒闭也一日日尖锐，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过剩商品的廉价倾销，打倒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结果，加上国内封建性的苛捐杂税和不断的内战，很严酷地摧毁着农民大众的生产力！我们可以总结起来说，整个国民经济的日趋崩溃，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大恶魔在相互作用怪，就是有一二经济部门近年来有畸形繁荣发展的趋势（如公路、铁道、航空之类），也是因为这两大恶魔认为需要这许多工具，用以加紧对全国大众进一步榨取的缘故。我们若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民经济的真相的话，那么，上面所说的几点都是最最基本的出发点。但是，这种基本的出发点，在买办资本家的眼光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在上面说明买办资本的特征时已经说过，帝国主义是买办资本唯一的凭藉者，唯一的主人，封建势力却是它的盟兄弟，唯一的帮手。它们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它哪里可能告诉一些它们自身的丑恶给我们呢？

我们抽象地说明白了这一报告书所以不能告诉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真相的原因之后，现在可以开始把这报告书的内容来做一番检讨。今年这一报告书，从币制与金融说起，详细说明去年一年中，白银出口的增多，金融恐慌的严重以及政府维持金融的苦心，再说到新币制的宣布和成功。其次说到中国银行本身一年来的业务。此外谈到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农业概况，工业情形和经济建设等等，对各种经济部门，大致都加以说明。我们读完了这报告书，再把许多的感想加以整理以后，可以归结到它有如下三



种缺点，第一是它有意的将许多严重的事实逃避不谈。第二即使说明了一种事象，也只是简单的将某一种事象平铺直叙一下，或者加上一点粉饰和恭维，至于该事象产生的原因结果以及对外界的影响，都没有很客观的说明。第三对于新货币制度，作了一种过分的盲目的恭维。现在按照它叙述的次序，逐一来作一番检讨吧！

报告书的头一段，叙述了各国放弃金本位及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以来，中国汇价上腾，白银大量流出，结果是通货紧缩，物价惨跌，以至形成非常严重的金融恐慌。在说明去年金融恐慌的时候，报告书中从没有提到各帝国主义的货币贬值对殖民地的特殊意义；也没有说明国内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是爆发金融恐慌的基本因素。报告书一方面忽视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恐慌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完全抹煞了造成金融恐慌的内部的基本原因。它只说明了金融恐慌的现象，丝毫不曾触及中国金融恐慌的本质。

接着说到政府救济金融恐慌的那一段，只是说政府如何增加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官股，以应危局，如何救济银钱业的周转不灵，结果使不稳的局势渐趋稳定。是的，政府增加中、中、交三行资本，救济银钱业，从表面看来，完全是事实。但是它所以如此的原因：第一是由于财政的危机。我们晓得近年来，政府财政全靠上海银行做外府，金融与财政已结不解缘，如果政府坐视上海金融恐慌扩大，势必危及政府的财政；三行增股是由四月一日发行的一万万金融公债扩充的，这样并且伏下一笔以后改革币制的张本，当然这都为的是要解决财政问题。第二去年中、中、交的救济银钱业，彻底表示着以政府的力量，来独霸整个金融市场；象通商、四明等银行，都因发生恐慌而渐渐以增股的方式，完全受政府三银行所控制；此外，如普通储蓄，有奖储蓄，公债汇兑等一般商业银行的营业，差不多全被政府银行所独占。上面两点，是政府救济金融恐慌的原因和目的，中国银行去年营业的突飞猛进，就因为这个缘故。但是，这许多我们可以在中行报告书



中看出半个字来吗？

中行报告书叙述到中国币制改革的时候，一点也不曾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货币权的原因和事实告诉我们。罗斯爵士的活跃看不见半点影子。就是日本方面种种阴险破坏的事实也一概抹煞。并且对于英国大使的通令，美国政府以每盎司六角五分购买我国五千万盎司白银的举动，还表示出赤诚的感激！此外，对随着国内封建割据而来的省法币也无半点指摘。

联系在英镑之上的币制改革，到今日为止，还是成为帝国主义竞夺的对象，并且，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到今日止也没有得到一个解决。金融领袖陈光甫，货币专家顾季高等，最近都不是为了这货币财政大难题，远涉重洋到新大陆去吗？然而中行报告书却把新币制恭维到天上去了！“今兹外汇汇率，既长久稳定，因之出口增而进口减，据海关报告，可以窥知是为六十年来未有之现象”，这种武断，近来有很多学者附和着，读者可参考上期论贸易出超一文，此处不必赘述了。

在论对外贸易的时候，对于进出口贸易衰落和私运的严重性，很轻描淡写地放过了！对于去年进出口物品以及各国贸易关系变迁的意义，统统不曾加以必要的分析，我们所能领悟的，也只是几堆枯燥的数字而已。

中行报告书说到国际收支平衡的时候，也犯了上面所说的毛病。在它的国际收入和支出两个估计中，只是机械地列上许多数字，求其平衡而已。华侨汇款是千万侨胞每年过着牛马生活的汗血钱；外人对华投资和外人在华用款，是剥削中国大众汗血的资本同镇压半殖民地民众的经费；偿付外债是中国大众每年被榨取去的金钱；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收支款项，我们怎可以不把它严格的加以区别和说明呢？

说到农业概况的时候，报告书的缺点更大了！去年广布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的风、水、旱、冰雹等灾害，数千万人民



的死亡流离，无法统计的房屋、田地、牲畜、作物的损失，在中行报告书上却以“去年国内虽不免间有水旱之灾，但全国农民尚称有年”两句话敷衍过去了！大家都说中国是一“灾荒之国”，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摧毁着的中国，的确是没有一年不闹灾荒的。这如果不是为了粉饰太平的话，或者倒是由于“扪心无愧”，“未便启齿”的缘故吧？

说到农业生产成本的时候，武断是更大胆了！它虽然也称“统计资料的缺乏，难于估计”，但是它从工资、肥料、农具、种籽等的价格变动上，从银行贷款合作社利率低微（目前的农业贷款和合作社运动，对于大多数农民毫无利益），上以及乡村交通治安的进步上加以观察的结果，就断定农业生产成本均有减低了。我们若不从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有无普遍改良和进步，同一面积的生产物逐年是否有增加等等来看农业生产成本的话，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能够证明什么呢？在说明农产收获的时候，不附带谈起农食问题的严重性；在说明农产价格的时候，对于有几种农产品价格涨跌的原因毫无说明；关于去年的农产对外贸易，也丝毫不指出它的特殊的更趋于殖民地化，更依赖于帝国主义战争景气的意义；反而对于币制改革及农村合作、农村金融、农村交通等于农民大众只有损害并无好处的东西，推崇得有声有色！

工业情形一节中，除了说明一些工业部门开工停工及出产数量的统计以外，只是一面怪民族工业资本不足，一面很轻松地说因利率过高和洋货竞争受到打击而已！民族工业在目前是否真是只受到一点“打击”呢？那是有纷纷关厂倒闭的事实在，无须多加说明的。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帝国主义者不仅将过剩商品输入中国，打倒我们的民族工业，现在更进一步积极到中国来设厂了！我们的“友邦”并且用很不客气的办法——偷运来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的“高额进口税”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更应指出：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落崩溃，还有内在的原因：第一是大众的



购买力减弱了。第二是封建性的统税，已将民族工业（至于外人在华工厂却不同）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第三是近来流行的各省割据经济，上海出产的货物，山西不准入娘子关一步。湖南两广都有过这种酝酿。这三种原因，都是今日民族工业基本的病根，但是，中行报告书能够告诉我们吗？

最后，我们要谈到经济建设了。报告书中谈到公路，谈到水利，谈到棉业、育蚕及铁道建设等等。建设在今日的中国，的确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公路、铁路的飞速发达，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注意，公路、铁道建设为什么在这几年特别积极起来？它对于农民的影响怎样？它对于列强的关系又怎样？这些都值得我们万分注意，但是，报告书中毫无解释。

时常看看报的朋友，大家一定很清楚，近年来各种交通事业的发达，在国内意义上说起来，是便利“剿匪”；在国外意义上说起来，是帝国主义者迫切要建设中国的交通网以增强它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公路的发展，除掉无偿的吞噬了大批农民土地以外，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对着风驰电掣的汽车，只有望风涕零而已！我们目睹近来英日法德比等国在华铁道权利争夺的紧张，真是惶恐万分，哪里还能跟在中国银行代表人的后面喝几声彩呢？

上面，简单的将中行报告书作一检讨。当然，我这一检讨是很肤浅的，希望读者加以批判。我的本意，除了指出中行报告书所不应忽略的许多地方以外，同时也为了证明：买办资本的代表不能剖析中国经济真相的理論的正确！

（原载《时代论坛》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



“开发华北”问题的检讨

日本在去年正月以后发动了一次所谓“华北事件”，其纠纷一连继续到六月底。土肥原将军和梅津司令官将半年来震动全世界的察东问题、河北问题先后胜利的解决：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免职，驻扎河北省所有中央军全部撤退，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在“另有任用”之下解职，东北军也开始向后撤退。这样，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从此以后，日本开发华北的呼声就一天天响亮起来了！

日本军部的代表，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出开发华北这一“和平工作”来呢？最大的原因便是日“满”经济集团变成了破局。日本一向宣传满洲是它们唯一的生命线。假若我们换句浅显的话解释起来，就是东北遍地蕴藏着的十二万万吨以上的铁矿和五十万万吨以上的煤藏，是发展日本重工业的宝库，广漠的沃野，是日本粮食和原料唯一的凭藉，有三千万以上人口的东北，也是日本推销过剩商品最好的市场，同时也是解决日本逐年膨胀着的人口的唯一处所，这就是所谓“生命线”的真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站在这根本精神上，逐渐改革了“满洲国”的币制，建设“满洲国”的铁道电信，占据了东北的海关，并且一再修改“满洲国”的关税率，来完成紧密的日“满”经济集团。但是万万料不到日本所积极经营着的日“满”经济集团，在事实上竟成破局，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这几年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数目不算少了，不过主要部分都投在非生产的军事方面，以现有的投资看来尚谈不到工业的发展。煤铁等矿冶方面虽然相当发达，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日本的需要。所以近二三年来，日本经常每年须向华北的开平，法属印度的鸿基采煤百数十万吨。从农业方面说来，日本一向以战时食品和原料的补给为目标，有计划地于南满强制农民停种大豆改种棉花，在北满竭力培植小麦的生产，结果因为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缺陷，全部失败了！同时东北农村破产加深，农作面积和农产指数逐年减少，农民购买力日趋薄弱，日本过剩商品大量推销毫无希望，更加上四年来移民的宣传和鼓励很少成绩，因之，就是在日本民间，也有表示日“满”经济集团需要一次再检讨了。

日“满”经济集团显然已发生破绽了。日本志士们的眼光渐渐都射到华北来。他们不约而同的高呼着：“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华北究竟有什么值得他们这样狂热地赞美呢？关于这，大阪每日新闻社所发行的经济旬报中，很扼要的说明了：“开发华北的意义是以华北的资源来解消日‘满’集团的矛盾，以华北的市场再现经济的繁荣！”同时它更具体地说，将华北圈入日“满”集团有三大利益：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铁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

日本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最感迫切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是莫过于棉花小麦羊毛和煤矿了。这中间有不少是满洲所不能生产或是生产不足的东西，华北五省这几部门的出产和埋藏量却特别丰富。华北棉花每年出产七兆担，占全国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小麦产量也占半数以上，每年产二一〇兆担，羊毛产量每年五十一万余担，占全国羊毛产额百分之九十以上。山西十三万兆吨煤藏，可以液化成为石油，在缺乏石油的日本心目中，早已跃跃欲试。这就是日本开发华北的动机和本意了！



日本怎样进行其开发华北的工作？那应该回溯到去年六月华北事件结束以后。在那时候，关东军和满铁、华北驻屯军，三位一体发动的开发华北的工作，是由有三十年侵略中国经验的满铁负总责。所以七月以后，满铁和关东军特务部的调查班，纷纷开始有计划地调查华北的经济，一时天津许多在野名流和落伍政客也纷纷成立各种经济团体响应。不过在起初，一方面由于华北政治机构未见稳固，同时又因为日本军部与政府意见参差，满铁投资华北一时不易实现。虽然当时有许多聪明透顶的日人想出许多“不花本”的办法来，也有主张整理日本在华北的旧债，以作投资之用，这些计划后来都被事实的困难所打消了。一直到八月间，松冈洋右被任为满铁总裁，才决定以日金一千万元创设兴中公司，积极开发华北经济，不过困难问题仍是很多，兴中公司直到十二月方才成立。从此以后，开发华北就有计划地实行起来了。

日本认为要开发华北各省丰富的资源，交通机关是先决问题，所以他们喊出交通第一主义。在日人计划中的铁道敷设共有四线，第一线是沧石路（沧州至石家庄）横贯津浦平汉两路以接正太路，进一步从沧州延长至大沽海口，一方面又加紧疏浚白河使它能够停泊万吨的船只，这计划完成以后，山西井陘的煤，很快可以输出供日本工业与军事之用了！第二是彰济线（彰德至济南）连络胶济津浦平汉三路，华北最著名的清化镇煤铁矿产，可以很迅速的由火车装运青岛出口；第三线是展长平绥路至兰州或西宁，包头至五原一段，目前也已在积极筹筑了。第四线是山西同蒲铁道迅速完成大同至太原间路轨。这种铁道网的完成，不仅仅是日本开发华北经济的先决条件，同时也表示日本军事控制的强化。

兴中公司成立以后，日本外务省就拟有以七百万元援助华北农村，使华北农民更生的计划。这计划的目的是在实现其“工业



日本农业中国”的理想。因此他们决定派遣技师，在天津及其它农业要地设置农事试验场，使华北农产逐渐改良，更密切地与日本工业联系起来。目前满铁特别向朝鲜总督府借棉花种子十万斤，分发冀晋鲁三省农民试种，并且规定贷给每省农户费用三万元，棉花的培植是很急进，对畜牧业和小麦都竭力在奖励中。日本当局还正在设法如何以技术和资本来援助华北矿业的发展。总之，今后日本对于华北开发工作，一天天加紧了！

这种以“工业日本，农业中国”，为目的的开发华北，究竟能否象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小册子中所说“促进华北农村的更生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呢？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吧。何以呢？因为日本开发华北最主要的意义是在备战，华北的棉麦羊毛矿产皆为日本战时不可缺少的，万一太平洋上日美发生冲突，或者日本要进攻西伯利亚，整个华北的物产都有长期被征发的可能，“更生”与提高购买力无从谈起，不过是一句美丽的外交辞令罢了。

在另一方面，我们更须注意，开发华北是使华北殖民地化的一种方式，它要使华北永远成为落后的原料供给地。有许多人对于这一点很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假如日本的目的是在沦华北为殖民地，那末为什么不干脆用武力占领，而单单要来做一套开发的工作呢？这实在是很错误的认识。第一因为各国在华北经济势力的错综，所以日本在遂行其国策时，不得不取相当慎重的态度；第二因为华北与中国其它各部的经济联系很深，假如日本用武力来占领华北的话，那末华北与华中华南的经济联系就要中断，那时候华北的经济必随着日本军事的胜利而迅速崩溃，这在正迫切需要市场的日本是很有所顾虑的。

日本在华北的不敢冒昧从事，在最近的金融统制上，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不久以前在大连某集会上，满铁调查部的许多中国通很坚决的表示着，欲统制华北金融，非排除“浙江财阀”



在华北的势力不可。但是他们同时又耽心，假使一气将“浙江财阀”逐出华北，华北经济马上就要瓦解，所以结果他们只得耐着心来一步一步地干。今日华北的私运和纱厂的兼并等现象，都是日本“渐进”政策的表现！

假若他们对于华北的交通、农业金融、工业等各种开发和统制，能够统统完成的话，到那时候，华北名实就会变成东北第二！因为那时候的华北经济已密切地与日“满”联在一起了！那时候，开发华北又当在狞笑和胜利中，变成历史上的陈迹。话虽如此，但是我们如能早早未雨绸缪，而实施适当的对策，则我们的华北还是有救的。

（原载《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



为什么川越会升任驻华大使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越，将于本月二十日来华履新，东京新近举行的外、陆、海三相会议，已议妥了对华具体的方策，交给川越携带来华了。在这国难严重万状的今日，凡是爱国的人，对于这次川越的西来，心中所蕴藏着的，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不可言喻的心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川越个人的历史，这也许是读者诸君愿意听听的吧。

日本“二·二六”的暴风雨，产生了一个广田“弱体内阁”。当广田首相任命正向南京呈奉国书的有田为新任外相之后，许多带着惊奇眼光的日本人，都不约而同的将他们的视线集中到驻外重要使节的驻华大使人选问题上来。这几年机陞不安的中日国交，产生了不知多少的争执和悬案！尤其是在目前日苏关系万分紧张的时候，他们把对华外交格外看得重要。驻华大使的后继者究竟谁最适当呢？很多日本的国民，都是这样关切而自问着的。

究竟谁是最适当的后继者？有许多日本人抬出曾经做过驻华公使的重光葵来，当时重光葵的呼声的确非常高，大有舍此其谁之慨！外务省方面有部分人传出将由白鸟大使转任的消息，还有一部分人且断定将推举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出马。但是谁也料想不到，广田首相却会把这一重责，轻轻放到驻华总领事川越的头上去的。这种历史上罕见，并且超越外交惯例的擢升，不仅引起中国与欧美人民的惊异，就是日本人方面的惊奇程度，也不在外人



之下。

有些日本人慨然地说：“在这跃进的时代，人事的变化，是真难逆料的！”但是天下真的有难以说明的事情吗？不，没有的。川越的所以能够升任大使，重光葵等的所以落选，只要我们肯去探讨，都能寻出它必然的根源来的。

这几年来，中日局势的演变的确是太快了！日本许多太平时代有名的外交家都落伍了！他们已赶不上时势的发展。我们不是听到过一串“协和”“焦土”“水鸟”“啄木鸟”以至今日广田的“一元化”外交政策吗？这一演变，恰好说明了瞬息千变的时势向前奔驰！重光葵虽然是多年驻华的公使，但是他已远落在时势需要的后面，所以新阁成立不久，重光氏终于挂冠而去了！其他失败者也未始不是因为不合时宜的缘故。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川越的所以能够荣膺驻华大使的重任，就因为他能够成为典型的时势所需要的人物。

时势需要怎样的人物呢？我们从近来日本对华政策的积极和军部势力日益膨胀的情形看来，今日日本担任对华进行国策的外交斗士，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一个熟谙中国一切的“支那通”。第二必须与军部间有良好的关系，使进行一切交涉时，不受牵制，没有隔阂。而这两种必要的条件，正是川越所具有的。

假如你有机会去与川越晤谈一次的话，那么，你所能得到的印象，恐怕只就是他的外国语很坏，并略略带些官僚的风度而已。他是一个不容易被发现出其它特征的人，假若你一定要说明他的特征的话，那么只能说他是具有无特征的特征的人了。

讲到他个人的经历，他是宫崎县人，生于明治十四年，生长在一士族的家庭里，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大正元年（民国元年）跟东乡欧亚局长、天羽情报部长等一同服务于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不久便被任为汉口领事，民国七年的时候奉调回国，充



任外务省一等书记官及西伯利亚事情调查局官员，此后又继续担任亚细亚局第三课长，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总领事等职，驻任于火奴鲁鲁、吉林、青岛等地方。“九一八”事变的翌年，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八月里又被任为日本驻“满洲”特权大使的随员，参与缔结日“满”议定书，回国后又被选任广州总领事，一直到转任天津总领事为止。

川越的简单历史，略如上述。我们假若根据他二十余年来的外交经历说，他确是一个“中国通”。他全部的外交官生活，差不多都消磨在中国南北各都市里。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今日日本担任对华的外交人物，单单有了“支那通”的资格，尚嫌不够，必定还要与军部方面有很圆滑的关系，能够得到军部的赞助，才可有为。因为惟有这样，广田内阁一元化外交的实现才不至发生问题。过去的教训太多了，“九一八”以后，历来日本在对华的外交问题上，外务省与军部，中央与驻华官吏间的意见分歧，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这军部势力逐日膨胀的时候，与军部关系的圆满，是驻华大使最必要的条件。

川越过去任青岛广东领事的时候，与军部的关系并不十分圆满。当他任驻“满”参事携带日“伪”议定书回国时，曾因此表示不愿再回伪国，当时关东军跋扈的姿态，的确使他很厌倦外交官的生活。但是曾几何时，自从他转任驻津总领事以后，就一天天与军人亲近起来，去年六月以后，华北风云俄然紧急，他襄助着当时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进行种种攫取华北特权的的活动，发挥他特殊的才能。从此一帆风顺，得到军部急进者的赏识，终至戴上这令人惊异的大使荣冠。时势造成了一个川越，现在是要看川越如何来创造未来的时势了！

（原载《申报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一 笔 总 帐

绥东的寇氛正炽，成都、北海事件又不断地发生，在这样一个敌人新的进攻形势下，沉痛的、耻辱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又降临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们在这纪念日的前面，默念五年来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加深的侵略历史，我们的心头只感到难以形容的悲愤窒息。但是我们一想到九个月来全国全民族解放洪涛的激荡，一支使敌人战栗惊惶的巨大臂膀，就要在一次伟大的决斗中高高举起的时候，我们却又燃烧起悲壮与兴奋的情绪。在这一个大决斗的前夜，正是我们彻底清算敌人加给我们的奇耻大辱的时候。现在我们对这五年来血写成的历史，作一扼要的叙述。

一、悲剧的开始

民国廿年，青天霹雳的“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北大营的炮声中爆发了。我们的东北当局看不清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所在，为保存实力和地盘，不惜节节退让，希冀日军自动停止侵略行动。这样，一纸不准抵抗的命令，造成了失地千里的记录，不到一日夜的功夫，抚顺安东营口各地就全被日军占领。最可痛心的，是我国东北军下层士兵的抗日情绪，由于上峰绝对不准抵抗的严厉命令，缴械存库、徒手后退等等极端的约束，而无由发扬，以致转而让一班卖国媚外的汉奸将领象吉林边防军



参谋长熙洽，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辈，能够毫无顾忌奴颜事敌，充当了敌人顶好的“以华制华”的工具。熙洽以吉林省城作为他向日投降的礼物。十月中旬，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畔崛起抗日的时候，汉奸张海鹏的部队竟一变而为当时消灭抗日力量的先驱了。

沈阳事变发生以后，中央当局以申诉国联为唯一对策，结果，铸成了千古大错。国府当时所发告国民书中说：“深信国联苟经公平之调查，本其应有之职责，定能予我们充分之公道，合理之援救”。又说：“希望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外交政策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在国际间尤其是在当时日内瓦国联散布许多“自卫发动”“克日撤兵铁道沿线”等烟幕，一面从容地击败了黑龙江孤军御侮的马占山苏炳文丁超等抗日部队，不到十月底，黑龙江全省也全部沦陷，东三省除锦州一隅外，已全部变色。据美国某军事专家统计，“九一八”一役，中国损失土地二百四十万方里，等于近百年来中国所失领土的全部。这样浩大损失的代价，结果是获得国联行政院不辨是非，不分皂白的一个双方撤兵的决议而已。

二、昙花一现的团结御侮

当这样一个空前的亡国惨剧上演的时候，在国内的政局上，也正是宁粤关系极度恶化的时候。当时粤军三路入湘，中央也命何应钦坐镇长沙，派遣十五万大军南下，剑拔弩张，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和平的呼声，和团结御侮的声浪，也就哄传全国。当日团结御侮，集中国力的呼声，是指两个方面而言：一方面是指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而言，中央党部发表告党员书，勉励“抛弃成见，努力御侮”，而当时具体的团结办法，就是召集四中全会共赴国难。另一方面是指全国各党各派的合作而言，当时



朝野上下都表示非全国团结不足御侮，所以四全大会就有“设立国难会议揽全国英材”的决议案，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充满全国团结御侮的声浪，可惜结果是失望了。

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运动，从当时南京上海广州三处同时召开四全大会一点就给‘团结’两字以有力的讽刺。至于说到国难会议，情形更为滑稽。国难会议的组织大纲，中政会本来规定是可以决定国难时期内政外交财政军事以及关于国难之一切临时设施方针的，而国难会议的决议案，可以由中政会转送国民政府执行。但是后来四届一中全会又将它的组织大纲更改，只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等事宜，因此上海许多希望结束训政，开放党禁的被邀参加的名流学者，都感到很失望而拒绝参加。所以到后来，国难会议虽然勉强在洛阳开成了，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可怜的。团结御侮既变成了昙花一现，留着的不过是一句口头空话，暴日更可乘此机会放肆侵略。因此，民国廿一年一月二日，锦州的陷落，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信号。

三、局部抗战的时期

锦州被占以后的形势，表示出暴日侵略的野心更加狂炽，我国当局虽然还是彷徨在信赖国联，设立锦州中立区等歧途上面，可是民众抗日抵货的怒潮，却一天天的汹涌澎湃，中国各地军队兵士的抗日情绪，也因民众抗日怒潮的澎湃而日渐高涨。在这样的情势底下，局部的抗战，就有它必然产生的原因了。局部抗战的第一期是“一二八”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日战争。

民国廿一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鉴于我国东南一带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公然表示将采取断然手段，以排除中国的抗日运动，派遣大批军舰来沪恫吓。一月十八日那天，上海日本领事村田借口日僧被殴，向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提出惩凶道歉、抚卹及取缔反日团体等四项要求，并且限期答复。同时日本在沪



驻军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时上海情势非常紧张。我国当局在日本压力之下，于二十八日下午完全屈服，全部接受日方条件，会同租界当局封闭所有抗日团体。可是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却趁机突然猛攻闸北，与正在调防的十九路军发生冲突，伟大神圣的“一二八”血战就这样开始了。闸北战端开始，我国兵士军官莫不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后方爱国民众的物质援助，源源不绝，我国军队接连击败进犯的日军，日军竟至四易主将，直到后来终因日军大队增援，截至最后决战，前线日军已达七万以上，而我国军队除十九路军及第五军一部分外，始终不曾有过一兵一卒的增加。所以艰苦支持三十四天之后，就不得不向第二道防线撤退。这次血战大大激励了抗日爱国的士气和民心，可是其结果，我国公私损失不下二万万元，还签订了一纸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侵沪的日军反能乘机全部调赴东北去剿灭当时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此外所谓伪满建国典礼，日伪议定书承认伪满等等强化日本控制东北的勾当，都在这个时期一一实现了。

正当淞沪血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满洲事变以及中日间的纠纷，与中日双方当局磋商中日纠纷的和平解决。据那时的消息，中国政府当局在庐山开会商议的结果，向国联调查团提出愿意将东北辟为自治区域，希望日本撤兵，但是日本却坚持承认既成事实，坚决表示伪满必须存在。国联调查团既不能慨然承认伪满，那么只好悄悄地回到北平起草那报告书去了。

十月二日国联调查团洋洋二十万言的报告书同时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处发表，最重要的内容是：（一）不承认伪国为真正的以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二）对东北事件的解决原则认为应该是适应中日苏三国利益的满洲自治。这报告书发表后，我国除名流学者胡适之称誉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以外，全国上下充满着反对声浪，认为这是诱导国际共管的先声。国联牺



性弱小民族的面目，完全显露。而当时日本国内对国联报告书的反感，更为强烈，结果是使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因此更加嚣张起来。

民国廿三年山海关石门寨的失陷，是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的起点，这时候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以强硬的姿态退出国际联盟，一方面更分兵三路，自朝阳、开鲁、凌南大举进攻热河。当时我国当局也表示绝对抵抗，但是等到战事爆发，热河的军队望风逃亡，省主席汤玉麟狼狈退走，不出七日，太阳旗就飘扬到热河全省。当热河失陷的恶耗传遍全国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起来，因此第二时期的局部抗战“长城战事”就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揭幕了。长城血战虽然有过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二十九军部队的光荣胜利，但终因指挥不统一，滦东一点被日军突破，以致全线动摇，结果日军直扑通州进迫平津，我军当局又不得不签订一次城下之盟——塘沽协定，从此通州至延庆一线以东地带，中国便无驻扎军队的权利。而华北的局势，也从此日非了。

四、从军事侵略到和平侵略

塘沽协定成立以后，“九一八”以来中日间的直接战争行为，到此告一段落，而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也开始新的转换。这种新的侵略政策的具体指针，可以拿直到去年下半年方才提出的广田三原则来说明。三原则的内容第一是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第二是排除以夷制夷的政策，第三是中日“满”共同防共。总括起来说，日本对华的新政策在形式上是运用外交手段，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如对内蒙积极导演所谓“大元国”以完成其分裂中国领土，包围苏联的阵线；对华北则开发华北、增兵华北双管齐下，竭力造成一个特殊局面；对全中国则以中日亲善为招牌，积极提倡经济提携，以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诡计，而其终极目的，无非是避免以武力占领的形式，完



成控制全中国的野心。所以这种侵略方式的转变，是侵略的进一步，而决不是和缓。

五、新侵略手法的两个阶段

我们把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塘沽协定签后到民国廿三年年底止，看作日本新的侵略政策下的第一阶段。这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点是一方面以恢复中日亲善关系为口号，积极恢复对华的贸易输出，一方面指令驻华有吉公使交涉解决历年中日间的债务；第二点是交还战区为要挟，来完成伪满与华北的通车通邮，乃至进一步控制华北；第三点是发表震动中外的“四一七”天羽声明，打击当日国联的对华技术合作，自认为东亚安定势力，公然表示其排斥欧美独占中国的野心；第四是使满洲加紧殖民地化，使溥仪僭号称帝，改革驻“满”机构，完成日本驻扎东北三位一体的官制等等。

到民国二十三年年底止，中日亲善的空气，自从罗文干辞外交部长职，黄郛再度北上以来，早已渐渐弥漫起来，中日贸易也迅速恢复常态，中日旧债大致都已清理，华北与伪满的通车通邮差不多也全部解决，所以第一步，日本的新政策就得到空前的胜利。

民国二十四年到现在，我们把它看作第二阶段。这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因英美在华权益防御战的剧烈，使日本对华侵略很趋深刻。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间河北事件未曾发生以前，是英日美在经济利益争夺最尖锐的时期。从正月起，英镑借款的传说闹的满城风雨，日本在沪设置二万万元信用贷款的谣言也不断在报纸上出现。接着英国的哈孟得、美国的福勃斯以及日本的许多实业考察团先后来华，列强间的明争暗斗空前的激烈，日本控制华北的欲念，也更加迫切起来。所以尽管是在喜气洋洋的公使升格的亲善



声里，河北事件也会突然发生。直待冀主席于学忠撤职，中央军全部退出河北，冀省府迁移保定，国府更于六月十日发布睦邦命令以后，满天暗云方始渐渐散去。但是何梅协定变成了河北的卖身契约，整个河北已全在日本军队控制之下了。

河北事件解决以后，又是一个中日经济提携猛进的时期，中日贸易协会和开发华北的兴中公司先后创办。然而十一月间中国币制在英国人罗斯指导下正式改革成功，日本在华北策动的分离运动从此也日趋严重；土肥原少将“不流血胜利”的阴谋，虽被全国爱国大众的抗争所阻止，土肥原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也成画饼，但是汉奸殷汝耕却在冀东倡言自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野心，也是决不会有片刻停止的。

今年“二二六”东京军人暴力政变发生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更推进一步。这几个月来日本在华北不断扩充驻军，现在已有五万日军满布平津及平宁沿线一带军事要冲，日军特务机关已遍设东北各省；内蒙傀儡国大体制造完竣，只待乘机上演；绥远处于风声鹤唳的惊骇之中。照目前情势看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更有重新卷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

五年来的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日本的侵略有加无已，一切的幻想希冀只有增加屈辱；一切的苟且退让只能多制造许多束缚我们的协定。五年来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集中全国抗日的力量，联合世界拥护和平的力量，一致抗战，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得到解放。

（原载《现世界》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



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

近几年来，我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同样都陷在不能自拔的深渊里面。税收的一般短绌，支出的浩繁膨胀，以至入不敷出一贫如洗的现象一模一样，而债台的高筑，赤字的严重，也完全雷同，病民害民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中央财政的病民，是由于整个税制的不良，关盐统等间接税的收入，占据全预算额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下层的勤劳大众负担着最大部分的国课，而少数富商巨贾却逍遥于纳税义务之外；地方财政的病民则不然，今日我国地方岁入，主要系根据1928年第一次财政会议的国地收支标准，以收益税系统的田赋、营业税、契税等项为大宗，这与先进各国的租税趋势颇为符合，所以税制本身无可非议，但是病根却在税制的紊乱和税额的苛细繁重。例如拿现在要说的田赋来讲，田赋是地方财政最大的基石，据国府主计处的报告，苏浙鲁豫等省每年田赋收入，常占总收入半数左右。1931年度全国各省（包括东北四省）田赋一项的收入合计共达一万万零八百九十余万元之多，足见田赋在各省财政上所占地位的重要了。这样重要的田赋，倘若按照它的性质来说，是一种很公平的直接税制，但是目前各种地方税中，打击农民的生计，摧残农业生产的发展，田赋已经变为厉阶了。

今日田赋病民之深，积弊之巨，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把它种种事实综合起来，可以归结到如下两种主要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田赋的繁重。有些人说，田赋只是有田人的负担，所以无论它繁重到怎样的程度，与大部分没有土地的穷困农民是没有干系的，其实这是极错误的估计。田赋虽然是一种不大容易转嫁的直接税，但因其终年不绝增征的结果，乖巧的地主们早已千方百计全部转嫁到大众的身上去了。所以田赋的繁重与农民大众的生计是有极深刻的联系的。

我们晓得在满清时代，田赋征额限度森严，尚不觉得怎样苛扰农民。因为清朝的康熙皇帝在朝的时候，为了笼络汉人心理起见，曾经下过永不加赋的御示，所以清季中叶以后，虽然外侮内忧国用庞大，巨额的赔款，更非加赋莫属，但是总因祖训所在，还不敢过分违悖。比方太平天国战争的时候，清廷要另辟厘金以作军兴时的挹注，而不向增赋路上走，也是因为上述的缘故。直到满清的统治被推翻，田赋附加的总额还未超过正税的十二分之一。民国成立以来，形势为之一变。历年来军阀割据，混战不已，都以田赋附加为他们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因为每当军需孔急的时候，创办新税，缓不济急，而增征田赋，“只须随粮附征，手续简便成效显著，且普通农民完纳田赋已成习惯，不致引起强烈反感。凡此等等都是使那些不肖官吏巧立名目以田赋为他们搜括渊藪的原因。所以民国成立以来，田赋是一年年的增重了。

自从北伐告成，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表面固然统一，实际割据如故，内战不已，以至田赋收括也变本加厉起来。据1934年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材料，江苏省各县的田赋附加有一百零五种，浙江全省各县竟达七百三十九种。附加与正税的比例：江苏灌云县课小粮的附加，超过正税三十一倍，灶田地亩捐及大粮附加，各超过正税三十倍。海门县附加超过正税二十六倍，淮阴、涟水、如皋、崇明、高邮五县亦自十二倍至十六倍不等。江浙赋重情形大致如此。更惨重的为四川，田赋一年四征，是很平常的现象，乐至新县等县的田赋，早已预征至1980—1990年以上了。其他各



省大都类似，此处因篇幅关系，不一一枚举。这真合乡谚所说：“数不清天上的繁星，说不尽人间的苛税。”在这样繁重的赋税底下，逃亡投水竟成为农民注定的命运。

第二种现象是田赋税收的逐年衰落。按理田赋收入只有逐年增加决无逐年减少的道理，岂知事实恰恰不尽如此。近年来各省征收田赋，普通总在六七成左右，征到七成以上的便等于凤毛麟角了。号称东南富庶之区的浙江，近年各县滞纳的旧赋，总额超过一千万元以上；湖北省的田赋只能征收到四成光景；据李陵君的调查（见1935年3月27日《大公报》《经济周刊》）河北静海县历年田赋实征数额占额征数的比率是每况愈下，计：1927年为百分之八七·一五，1928年为百分之七七·四七，1929年为百分之七六·四五，1930年为百分之七三·九〇，1931年为百分之七〇·二〇，1932年更减至百分之六九·六九了。这种衰减的趋势，决不是一二地方特具的情形，而是今日中国各地一般的现象。

究竟为什么田赋会衰落如此？这原因是很多的，最最主要的是一般征收制度的不良，里书柜书等的营私中饱。我们知道一般里书柜书的所以可能公然舞弊，实在是目前那种征收制度不良的直接成果，而征收制度的所以不良，又因为地籍不明不实的缘故。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诸侯皇帝的统治，都是建筑在农民的纳供上面的，田赋的课征已有了很悠久的历史，因此它的积弊也是说不胜说的。明朝万历六年的时候，曾经通令全国，举办土地丈量，可说是我国历史上整理田赋的重要关键。满清入关统一中国以后，田赋征税虽然仍旧沿用明朝“一条鞭”的旧制，不过因为迭遭世乱，万历旧册难免残缺不全。往后东南各省复经过了洪杨之役，鱼鳞黄册，不毁于炮火便辗转流入里书册书的手中，以至政府与人民的地土纳税关系，日益隔膜，政府要征收田赋，就非依靠熟悉当地田地状况的里书不可了。这种不良制



度，民国成立以来，变本加厉，一般里书柜书因有私藏帐册为护符，飞洒中饱，就成为—种公开的秘密。因此农民每年虽然饱遭惨苛的榨取，但是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为征收者所吮吸中饱。

因为征收制度不良而产生的舞弊事件，这几年来真是层出不穷的。例如前年江苏松江县政府利用折田升漕，减成压征的机会，共同舞弊，侵吞税款数十万元。苏州田赋征收处主任朱均鎔曾被人控告侵占国课五十万元，后来经财政厅调查结果，据说积弊已深，如彻底查究，牵涉各图经漕及漏税人在内，约有数百之多，恐将形成大狱。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不难看出田赋舞弊的可惊，自然，这对省库的影响，是更无庸解释的。

除掉上面这种最大原因之外，近年来各地农民在天灾人祸交相煎逼下，抛弃田园流亡相继的情形，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知道，大凡离村可能性最多的农民，总是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一般说来也是极其微细的，所以他们的逃税，在整个田赋税收上说，还不至形成—极端严重的现象。此外象一般地主豪绅的抗缴田赋，也不失为田赋税收衰落相当重大的原因。目前内地有许多的豪绅地主，他们认为缴纳田赋是一件不光荣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利用他在乡间的优越地位以逃避重税的盘剥的。他们的逃避，结果是使下层的农民增—层负担，因为本感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这田赋税收江河日下的情景里去求财政赤字的平衡，只有借增加新赋—个办法。如此辗转相承，农民生计是益发可怜了。我们哪里还能忍心说田赋对广大的农民并无严重打击呢？！

我国田赋问题的严重既如上述，民国成立以后，政府当局站在如何清理税制增加收入的观点上，也深深地感到有整理土地的必要。所以民国初年有全国经界局的设置，对田赋制度加以不少改革。终以政局多故，内战无已，中央政令不出都门，致十余年来毫无成绩可言。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对地政整理颇显—



种新的气象，是年七月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分国地收支标准，将田赋划为地方税收，十月间财部更颁布限制田赋附加税办法八条，规定田赋正附税捐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附捐总额不得超过旧有正税之数。1930年当局颁布土地法。1931年更有中央地政机关的筹设。尤以1934年5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对田赋标本兼治办法有更明确的规定。治标有减轻田赋附加的决议案，主要原则有下列几项：（一）未实行清丈以前，各县田赋如能按陈报地价为征税的根据者即照百分之一征收，附税名目一律取消。（二）未实行清丈以前，各县田赋不能按陈报地价征收者，附加税不得超过原有正税总额，在原科则轻征区域，以正附税合计，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一为原则。（三）自1934年度起，不得以任何急需，任何名义增加田赋附加，并严禁各县乡区镇的临时亩捐摊派。（四）附加带征期满或原标的已不复存在者，应即予废除。（五）田赋附加现已超过正税者，应限期递减，并将土地陈报所增赋额，尽先充抵补减轻附加之用。治本的办法，大会通过了土地陈报纲要三十五条。那次会议结束以后，减轻田赋和实行土地陈报，已成为近年来政府当局自誉为获得重要成功的要政之一了。现在我们就拿目前的整理情形来做一检讨。

首先我们来检讨一下治本的土地整理。我们知道土地整理最根本的办法只有实施清丈，但是清丈一事，必须巨款。据国联专员拉西曼报告书估计，今日中国以最经济的航空测量统计，即需一亿五千万之巨。政府整理土地的目的，本来为图增加收入，如今不但收入一时不易增加，反要先支一大笔垫款，这自然不是目前破落户的政府所能希冀的。所以政府当局不得不从节省经费的土地陈报来着手，而这种陈报办法本身，根本就不是彻底的办法。我们现在不想用很长的篇幅来详细的批评土地陈报的利弊，不过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浙江省首先举办土地陈报，耗资三十余万。农民巨额陈报费负担（每亩一角二分）的结果，是地政的一



败涂地，农民毫无好处。其它各省办理土地陈报的结果，截至今日为止，除安徽当涂和江苏萧县认为极有成绩溢出熟田甚多以外，其它区域就无优良成绩可言。事实上办理土地陈报的确困难繁多，尤其是按照各地施行土地陈报情形，举凡绘图编号都由各地乡镇长经手，所以乡镇长对土地陈报忠实与否，具有莫大关系。可是我们知道今日各地乡镇长大都是当地的地主豪绅，地籍不明对他们只是有利而无一弊的，以这种人来负担整理土地的大责任，哪里产生得出好的结果来呢！

其次我们来谈关于减轻田赋附加的问题。这两年来报纸上，时常有各省长篇关于已减去的田赋附加名目以及数额的统计发表。据孔祥熙氏的报告，江浙等十六省市截至1935年8月底止，先后废除附加税共计一七、八九三、〇五四元（内河北省五九六、〇〇〇元系拟截数），假若我们从那字面看来，数目是并不算少的。不过宣传是一回事，而事实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都能够想象到，目前各省省库的一贫如洗，催征旧赋命令的急如星火，这些事实会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回答，所谓减轻田赋附加，只不过是——篇官样文章而已！今日的各省财政拮据情形，那里还谈得上为人民减轻一点负担。

不过相信统计的人，一定要说，上面的话是一种不顾事实的武断，因为根据实业部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我国的田赋，1911年以来，逐年增高，到1933年就达到最高峰，1934年的田赋与1933年相等，1935年则显然减少了。水田田赋已较1934年减少百分之七，平地田赋较1934年减百分之八，山地田赋也减去百分之七。照上面数字看来，减轻田赋附加，不是已发生实际作用了吗？粗看起来好象理由很充分；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统计的真确程度是大有问题的。现在姑且认它是很正确的，并且将其它原因抛开不讲，单单对于这种减轻附加给予农民的影响上来提出两点事实，请大家注意：



第一，我们假若拿近年地价降落的速度，来与田赋减低的程度作一比较时，则很显然的，田赋的下降决赶不上地 价 下 降 之 速。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1933年的平地田赋占地价百分之二·七四，1934年增至三·二六，1935年更增至三·四九。山地田赋对地价的百分率，1933年为三·〇五，1934年增至三·四六，1935年更增至三·七四，从这样一个数字的对比中，人们清楚看到，即使真的田赋绝对额减轻了一些，但是这种减轻的程度是远落在地价跌落的后面的，也就是说农民对田赋的负荷是只有随着那废除减轻的呼声而日益苛重起来的。

第二是变相田赋的迅速增加。作者最近回到阔别数载的浙江故乡，正是催收积谷三令五申的时候，不论公产私产，凡有田五亩者必须无偿纳燥谷一百斤，多则类推，这种情形与增加附税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山西省于所谓减轻田赋之后，因为财政赤字无法抵补，各县当局竟能呈准财政厅向人民按村摊派。减轻田赋所予农民的究竟有什么利益可言呢？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的苛捐杂税，是半封建社会必然的产物，要彻底的清除苛捐杂税的压榨，只有根本从半封建政治的改革着手，否则，换汤不换药，农民的负担是始终不会减除一些的。我们对于铲除田赋积弊减轻田赋附加，也认为有待于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当然这种解除农民大众切身的苦痛的运动的完成，是还要看农民大众自己的努力了。

（原载《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



“誓以青年身心保卫祖国”

当这民族危亡逼于俄顷的时候，华北的日本驻屯军突然举行了一次空前巨大的军事演习。这次日军演习区域，除平津两地以外更包括大兴宛平大直沽等地在内，面积几乎在五万方里以上。参加演习的军队竟达七千余人之多，差不多动员了全部平津丰台通县一带的日本驻军。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演习起到十一月四日止，先后演习凡十二次。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分两处各在平津附近举行。三十日后为联队对抗演习，分红白两军以北平为目标，作攻守战。十一月三日，步兵大队和坦克车，重炮，高射炮，机关枪队以及马队，在北平穿城示威。四日在平西八宝山受田代司令检阅后，才告完毕。

在这次日军演习期间，农民所受的痛苦与损失最为重大。凡被划入演习区域的地方，所有田中秋禾必须尽数割除，以利行军。在演习和行军区域以内，所有的井都要用高粱杆子圈好，日军并且对农民说：如果有一个日军跌到井里去或被害，出事的那乡村的人民是都要砍掉头颅的。在演习期间，一切商店停市，学校停课，各地民房被占为临时兵营者不下数千间，其中被任意拆毁践踏者不可胜计。而且每一民房被占据后，除留一人服侍日军外统被赶出去。所以那几天演习区内的居民，扶老携幼逃难四方者络绎不绝，一幅流民图，真是惨不忍睹。

这种行动，显然就是蒋委员长在二中全会上所说的，继续破坏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的行动。可是我们政府，只向日使馆发了一通抗议书后，就在日本置之不理中含混过去了。至于我国冀



察地方当局，除了下令平津两市和大兴宛平安次武清天津等五县警察休息十天，为日军代备饭锅柴草之外，更派专员十余人，驰赴丰台照料，为日军代征夫役供给茶水并购办饮食，北宁铁路特备专车供日军输送外，还预备了大批肥皂点心衣袜劳军。为“友邦”军队服务的殷勤，真可说是体贴之至了。当十一月二日，日军司令田代来平指挥日军攻守北平演习的那一天，我国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宋哲元委员长更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在郊外炮声震耳欲聋中，畅述其“兄弟之邦”的真诚合作，席间并殿以“醉太平”等中西歌曲，一派欢欣，难以笔述。日军演习完毕后，田代招待我国地方官显时还说：“此次演习规模极小，不足供贵国参考。”而冀察新贵齐燮元代表宋哲元致答辞，略谓：“对此次贵军演习，招待不周，很是抱歉！”我们看到这些光怪陆离的新闻，已不知道平津尚算中国的领土不？！

国家蒙受这样大的耻辱，有许多恬不知耻者流，还在歌舞升平，粉饰他们的丑恶哩！但是北平各学校都在日军大规模穿行平市的时候，下半旗志哀，并停课一小时以示抗议，清华大学师生八百余人，在那天举行宣誓礼，“誓以青年身心保卫祖国”。平市三千余学生在学联领导下，举行一次灾区服务运动，下乡救济日军演习后受到损害的四郊农民。他们向农民赈济，慰问，宣传和组织，结果获得很美满的成绩。北方青年这种真挚的爱国精神和行动，是值得我们全国的爱国同胞仿效的。

紧接着日军大演习后不到一星期，宋哲元部二十九军也在固安一带举行秋季对抗演习四天，这总算是乌烟瘴气中的华北的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二十九军弟兄的忠勇卫国，是全国同胞一致深信的，不过我们但愿二十九军的领袖们觉悟，今日的华北情势，已非我们演习的时候，而是切切实实抗战的时候。我们切盼这次的演习，不要只是一种“作态”和解嘲的“烟幕”才好。

（原载《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出版）



重弹旧调的“中日经济提携”

时到今日，我们还来谈中日经济提携问题，在一般人看来，不认为有过时之嫌，也一定要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而透露些厌恶的神气。其实，即使抛开这个问题对我们民族命运的重大影响不论，而只要认定它现在仍在发展着的话，仍然不容我们对它丝毫有所忽视。

日本提出中日经济提携这一口号，一般人都认为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冈田内阁时代，广田外相发表中日经济提携主张的时期开始。可是真正探究起来，这一口号的萌芽，还在一九三三年的秋天。长城抗战以后，塘沽协定签订了，华北已入一极险恶的状态，日本的势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经过冀东战区扩大到平津一带。在这时候，日本的一部份军人和政客，就提出了所谓日“满”北支的经济联盟口号，积极推动起来。

日本为什么在那时候要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新口号呢？我们可以从欧美、日本、中国本身三方面来加以说明。第一从欧美方面说，因为“九一八”以来，日军在华不断进行军事侵略，使欧美在华经济权利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随之而产生了欧美列强在华经济权益的防卫运动。欧美列强的防御战，是透过国联经济合作的美名，来加紧抓取中国经济利益的斗争。欧美列强的这种攻势防御，使拙笨的日本感到非常恐慌，闻名世界的“四·一七”“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就是因此而发的。可惜这种带有恫吓性的宣言，并不能发生极大的效果，欧美在华力量还是逐日增



长。第二，从日本说，日本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因为军费膨胀过巨，他们能力有限，不胜负担之苦，而且在军事侵略底下，在华的日货市场是反比例的一天天缩小。第三，因为中国抗战情绪一天天高涨，使日本许多野心军人也感到有“尽量减少皇军实力的牺牲，以取得事实上的胜利”的必要。这三种客观原因的存在，使日本国内一部份资产阶级和军人，都感到“经济提携”是排除欧美在华势力不战而胜的最妙计策。因此经济提携的呼声，就在长城血战后，渐渐散布出来了。

不过那时候的中日经济提携，还是很零碎的意见，运用范围也局限于华北一隅。到了一九三五年春天，经过广田一番宣布，接着中日两国当局和在野名流就起了一阵应和。我国吴鼎昌周作民等金融巨头，也在那浓厚的提携空气里东渡扶桑，与日本实业巨子交换了意见，结果组织了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这才正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知道，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照广田的说法是以金钱及技术来帮助中国，发展中国的原料生产，以供日本工厂的应用，做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然后，调整中日的贸易关系，将大批工业制品销售到中国来，独占中国的市场。这种经济提携是最为日本资产阶级所欢迎的。然而日本对华的政策，主要的并不取决于资产阶级，事实上，处处受少壮军人的操纵。因此广田卖尽了气力，日本野心军人还是一再地在华北制造冀东伪组织和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尤其到了去年“二·二六”政变以后，军人的跋扈，更不可一世，广田虽然荣任了首相，实际上反而彻底做了军人的应声虫，他的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也就随着中日局势的紧张而日益销声匿迹了。

在军人与资产阶级的夹板中苦挨了十个多月的广田内阁“一无成就”塌台了。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摩擦，以军人和金融寡头合作姿态出现的林内阁粉墨登场了。林内阁一成立，立即又打出



“明朗外交”，“经济外交”的旗帜来，一个几乎渐渐冷淡下去的“经济提携”问题，又从新掀起了人们新的记忆。

林首相为什么要来玩一套“经济提携”呢？根本原因依然是上面三个，只是这三个问题，在目前更严重了。第一，欧美在华的经济权利，有了极大的伸展；第二，日本国内的金融财政商务各方面，由于军事膨胀的结果，都显著地表现出严重的破绽；第三，中国正在以全国力量阻止日本的领土侵略。去年绥远的抗战和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已使日本的野心家们不能忽视中国抗敌力量的增长。在这时候，日本来提倡经济提携，假使能够实现，不仅在掠夺中国资源和独占市场上是一个聪明办法，最主要的更在于用经济提携来软化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瓦解中国抗敌的统一阵线，这是此次日本旧调翻新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儿玉谦次率领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目的之下，西来中国。随着而起的又是一番热闹。拜访当局以及社会闻人，杯酒联欢了几日。半公开半秘密的，开了一次中日贸易协会。现在是归的归去，赴华北考察的，也已离去上海。这热闹的情景，现在又变为沉寂。

东京的报纸满含悲观的论调说：“因为中国太自大，她要先谈政治，后谈经济，所以儿玉此行是失败了。”但是儿玉在回国后，却又很乐观地说，此行是打下经济提携的基础了。总括说起来，目前日本有两种势力正在互相倾轧，他们或者是使我们“慢性中毒”，或者是要我们“饮弹而死”，都是逼使我们走向绝途的。国际情势也复杂错综，利用的得法与否，也要影响到我们的前途存亡。但无论怎样，最后的决定力量，还须依赖我们自己。在今天，假使我们全国上下有一致抗侮的决心，那末，不管它是迷人的毒酒，还是凶恶的锋刃，都必将在光芒万丈的抗敌火焰之下销声匿迹。

（原载《自修大学》第一卷第一辑第六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



日 本 军 部

近年来军部这个名词，在日本的报纸甚至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都是以显著的地位标明着，可是一提起军部的定义来，即在日本人士的意识中，也还是一个传说纷纭、解释不一的问题。至于在我们国人的眼光中，自然更显得模糊难辨了。有的人说，军部就是日本内阁中的陆军省；也有人说，军部包括陆、海军省两方面。其实一般说来，军部的范围不仅应该包括陆、海军省，而且一切其它的军事独立机关，如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都要算是构成军部的一部分。

光是说明了军部构成的体系，还不足说明军部是什么。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指出，所谓日本军部，是因海陆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的人员，平常表示政治见解一致，而被日本的国民所用惯的一个名词。所以军部这一名词与政治是不能分开的。所谓军部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式的法西斯政治思想，它一方面攻击官僚政党的腐败和唯利是图，同时又攻击资本家的利欲熏心，不顾大众生活和皇国的发展，所以主张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党政治，实现天皇的亲政；另一方面，它主张膨胀军事预算，积极向外侵略，所以对华侵略是与军部密切地联在一起的。军部的所以使世人注目，原因也就在此。

日本明治宪法规定，军人是不得干涉政治的，并且还规定军人不得加入政党，剥夺了军人的众院选举及被选举权，甚至村町



的公民权。因为有了这一种严苛的规定，所以自明治维新以迄昭和时代滨口首相被刺前止，军人在政治上总是采取蛰伏的态度，在日本国民的意识中，军部两字，还不怎样有力。

但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恐慌吹袭樱花三岛以来，日本的农村经济一天天的穷困没落，失业的恐慌弥漫了全国。这期间的资产阶级政府，由于本身的腐败，已难以拯救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旭章帝国。大部分从农村出来的中下级将士，由于生活的困苦（日本兵士生活还比不上工人），对官僚政党的腐败无能迅速地燃起仇视和不满的火焰。他们再也不甘缄默，他们的心头郁积着向外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欲望。终于霹雳一声，一九三〇年滨口首相因为签订伦敦海约而被刺，军人干政从此就渐渐抬头了。滨口被刺的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军人的气焰更因之盛涨得不可一世。

军部的势力自从一九三〇年滨口首相被刺以后，随着少壮军人秘密结社的勃兴而一天天扩大起来，到了今日，谁都不能否认它已整个地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在军部法西斯势力的膨胀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九三二年刺杀犬养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和一九三六年“二·二六”惊人的东京暴力政变。在“五·一五”事件以前，政党政治还有存在的余地，到了“五·一五”犬养首相在军人枪弹下丧生以后，政党内阁从此宣告死灭了。“二·二六”东京的暴力政变，是军部急进派对政党官僚的全面攻击。到现在，在军部控制下的林内阁竟公然拒绝了政党议员的内阁。这几年来政党的失势，充分反映出军人势力的嚣张。

日本军部所以具有稳然操纵政治的力量，是有历史上的原因和日本军事组织上的条件。第一，从日本的历史原因说：武士道精神是一向被日本国民所景仰的，当一一九二年赖朝征夷开府镰仓起，至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止，六七百年的幕府政治完全是一种武士政治。明治维新以后，封建式的武士政治虽然没落了，但



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侵略成为日本雄飞东亚的必然要求。中、日之战和日、俄之战，奠定了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的基石，所以武士精神，军人崇拜，在日本国民中反而是特别的狂烈了起来。

第二，从日本的军事组织上说，日本宪法载明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的大权，天皇有总帅陆、海军，制定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和宣战媾和……之权。天皇之下设有元帅府和军事参议院为最高的军事顾问和谘询机关，直接隶属于天皇。此外内阁组织中的陆、海两省，管理军队的编制和设施，形式上两省组织虽在首相统制之下，可是海军省因有军令部的设置，关于海军的调遣用兵，全由军令部掌管，军令部的总长是直属于天皇的，有参赞帷幄之权。陆军方面有参谋本部，掌管陆军的用兵调度机关也是直属于天皇的，亦有帷幄上奏权，除向天皇负责外，不受其它一切权力的干涉。不仅如此，即陆、海两相，也有帷幄上奏权，所以内阁对海、陆军的控制力是极为薄弱的。因为日本军事组织的特殊，所以也促成军部势力的膨胀。

日本宪法规定，海、陆两相须由现役海、陆军中的上中两级将领充任，通常内阁更迭的时候，新首相上台组织新阁，陆、海两相都要由旧任陆海两相推荐。因此没有现役陆、海军人的支援，新内阁即无法组织。例如今年广田首相辞职，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奉命组阁，但是宇垣是接近资产阶级的温和派，向被急进军人所攻击，所以宇垣匆匆赴京筹备组阁，海、陆军方面即不与合作，前任海、陆两相以拒绝推荐新海、陆相为反对的手段，结果竟无法解决这困难，宇垣内阁终至流产，这是最新的实例。

由于内阁的组织非获得军人的援助不可，所以近年来每当新阁成立，新陆相必定预先向首相提出：军事应该如何扩充，政治应该如何改革等等条件，作为就职与否的前提。前任寺内的答应就任陆相，就是广田先接受他的条件的结果。



最后，我们更应该指明，军部内部是充满派别的分歧和意见的歧异的。比方说，在每次政治变动的时候，海军的态度，显然要比陆军缓和得多。在我们看起来，这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大概海军对资产阶级的依赖特别感到深切，例如三菱的造船事业的技术，可以说是远东海上王国日本的灵魂，海军将领对资产阶级在海防上的功勋，是自然会使海军对他们表示好感的。但陆军的情形却正相反。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上，就会有缓和激烈的区别。此外，陆军内部少壮军人的急进态度，远在上层将领之上，而上层将领间，如上面所述的宇垣派，比起荒木一派来当然是缓和得多了。在海军中派别的分歧比起陆军来，是要好得多了。

正如德、意法西斯政权一样，日本军部意识的产生，是孕育于反对资产阶级官僚和政党，过去军人刺滨口、杀团琢磨、犬养毅、高桥是清等等的时候，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利害冲突，好象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军部决不是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是财阀金融寡头的最忠诚的卫士。军部内部派系的分歧，有一大半原因，就是由于他们背后的独占资本家相互间有利害冲突的缘故。军人与财阀的结托，如荒木大将与三井财阀、大仓财阀的关系，宇垣大将与关西财阀的勾结都是很明显的。总之，大财阀须要军人去替他们开拓广大的利益，而军人也须要财阀的资金济助。军部不是个超社会层的超历史的东西，这是十分清楚的。

（原载《自修大学》第一卷第一辑第九期，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



新 闻 通 讯



北 行 途 次

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时半，我从上海寓所乘黄包车穿过霓虹灯闪耀着的，一列长蛇似的汽车静躺着等候舞场里酣舞的主人的跑马厅一带，悄然来到车站。

走到售票处，询问到徐州转陇海车至郑州的票价和卧铺，我身旁挤上来一个中年旅客，问售票员沪平通车到什么地方为止，售票员回答是济南。“济南！昨天不是还可到沧州吗？为什么路线缩短得这样快？”我在惊讶中，不禁脱口问出这样一句话。坐在售票处的那位瘦瘦的售票员对我望了一眼，没有作声，只摇了摇头，面部的表情带着十二分的惆怅！我的心完全被他那悲哀的情绪所感染了。但是动荡在我心头的，不是消极的悲哀，而是满腔的悲愤和勇气。

沪平通车的机车发出了一声长吼，车身开始蠕动。我怀着一股雄壮的热情，随着车身在黑黝沉静的原野里奔驰。一间可以容纳四个旅客的二等卧室，只躺着我一个人，寂寞紧紧地包围着我，好在夜深人倦，车到崑山便昏昏睡去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从车窗向外一望，但见秀丽雄伟的栖霞山的山景一片片向后掠过，原来火车已快到南京了。我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向不转睛地注视着往后飞过的栖霞山的山峰，内心充满了许多感慨，不禁默祷着：栖霞山啊！但愿你是捍卫京城的铁壁，阻住胡虏侵略到长江！



车到下关，上下的旅客不多，我还是一个人占据着一间。在车站向报贩买了一份当日的《中央日报》，日机轰炸天津保定伤亡极惨的大标题，刺入我的眼帘。汪主席在庐山的演讲词，一句句地读下去，读到举国一致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种子的一段的时候，火车刚巧驶入长江渡轮，准备驶过江去。在往年没有添置渡轮的时候，旅行者渡江是一件极麻烦的事情，现在当然便利多了，不过时间的耽搁要是与有铁桥比起来，那又不可以道里计了。车身被渡轮载着驶在江心，我看看四周的江水和两岸景物，心中突然涌上这样一个问题：中日两国大规模战争如果正式爆发，以敌人雄厚的空军力量，怕很容易将我国的铁道交通破坏，那时候，长江的渡轮难以象今天这样，平安地渡运长江南北两岸的车辆了。这不是杞人忧天，在敌人谋我日亟的今天，为了军事运输的便利和安宁，政府当局应该早有未雨绸缪的措置吧。

我这时的思潮，又向另外一端伸展。在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不仅各重要铁道交通可能被敌人破坏，而且全国大小城市都有在敌人轰炸中化为灰烬的可能，但对这场民族战争，是没有决定意义的。敌人的破坏，只能使我们前后方的联络受阻，各种物资的接济发生困难，只能使我们对敌人的抵抗力量，暂时不能迅速发挥，但决不能阻止或涣散我们抗敌的行动和意志。只要“一致牺牲”，“焦土抗战”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固然大受损失，但敌人亦同样得不偿失。只要我们全民族一致奋斗不懈，我们虽然不能全歼敌人，但是我们有打退敌人，驱逐他们出境的最后把握！

渡过长江，列车朝北前进。一个人孤坐车中，翻读宋史消遣。宋史记载着汉族亡国史中最悲惨、最可痛恨的一幕，所以热血人士曾有厌读宋史的心理。真的，在一个苟且偷安的“和”字之下，不仅断送了赵家的天下，而且给千秋万世遗留下极大的耻辱。今日敌人蚕食华北，眼看汉奸数典忘祖，种种丑态，假如不



是相隔近千年，真会认为是北宋将亡时历史的翻版。譬如侵略华北围攻平津的敌人，口口声声粉饰自己的侵略为“自卫行动”，又因为不能一口鲸吞华北，就利用汉奸来组织维持会，慢慢咀嚼下肚，而且还可堂而皇之的声明“不为领土”。这种策略与当时金人围攻汴梁，伪言“吊民伐罪”，利用张邦昌、刘豫等汉奸，册为楚帝、齐帝，使汉奸名义上统治黄河以南区域而自诩“本非贪土”毫无差异。汴梁被围而朝堂和战未决，终致开门迎敌，二帝被虏。这种情景，按之近情，真是绘声绘形，历历如在眼前。北宋之亡，决不能尽归因于金人之兵强马壮；今日华北之危，亦何尝不是自己民族子孙的不争气！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宋代辽金人的侵略与二十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性质上早已截然不同。我们六年来饱受敌人侵略的热血同胞，也但愿历史不至重演。不忍到了今日还会看见有偏安江左的南宋那样的误国亡国景象。

无尽的遐想，一直到列车驶进蚌埠，才被旅客烦杂的声音打断。月台上有许多荷枪的兵士梭巡着，气氛与经过的各站有些异样。车中上来了许多人，顿时又热闹起来。车抵徐州刚刚是下午五点三十分。徐州是陇海津浦两路交叉点，与郑州一样，是今日军事上的后方重镇，车站上气氛的严重较蚌埠尤甚了。许多辆救护汽车，正在货车上起卸。尚有数列北征的铁篷车，静静地躺在岔道上，车站上宪兵检查也极认真。我一看行车时间表，要到六点半才开，尚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便出站往附近小饭馆胡乱吃了些东西，走上陇海线开往郑州的车厢中。

津浦线的北上车，自华北日军挑衅以来，乘客日渐稀少，而南下车则每日挤满避难的同胞。徐州某报标题云：“行李萧条南渡日，伤心北望已无家”，说得多么凄凉！这个二等车厢中的情形与刚来的津浦北上车大不相同，半间小小的车厢，挤满了妇人小孩和军人。小孩子的啼哭声和满地的屎尿，一股臭味触上鼻



尖，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厌恶和难堪。因为这些都是为国出征将士的妻儿啊！伴送到车站来的军人丈夫，满头是汗忙着搬行李、找座位，一位河北口音的中年旅客，用很响亮的喉咙对占有一坐席的另一旅伴说：“老乡！你站起来，让她们坐吧，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她们是军人的家眷，他们是去打敌人的！你让了罢！”军人都要慷慨走上抗战的前线了，旅客为军人妻儿让坐，这情景是多么悲壮呀！

从徐州西行，天色渐渐黑下来，四周的景物是看不见了，但是迎面一列列令人兴奋的兵车，不时从车窗边驶过。车到郑州，郑州车站又是那样的紧张，过往车辆是那样的繁多。一个光荣的自信占据着我的心头：中国要怒吼了！中华民族战士的目标，不是南渡，而是北指！

（原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申报》）



国防线上的石家庄

石家庄在平汉路没有通车以前，不过是数十家农民聚居的一个寒村。后来平汉通车，正太铁路亦以此地为终点，于是人口大增，商业也因之繁盛，各种工厂，如纺纱、玻璃、火柴、烟草等业均先后创办，一二十年来的经营，现在已成为六万人口的巨镇。

正太铁路通车以后，山西省生产的煤和棉花以及其它杂粮，皆从此处转平汉车经天津运销海内外，故石家庄在政治区域的划分上，虽属于河北省获鹿县区之内，而事实上却是山西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唯一的咽喉。记者抵石家庄之次日，访晤当地中央银行吴经理，据谈：山西煤矿与井陘煤矿，每年经石家庄运出者，价值总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山西每年秋后棉花农产经石家庄输出者，总数在四五千万元左右，从此对石家庄地位之重要更可获得一个明证了。

敌人在加紧侵略河北进窥山西的过程中，早就注意到石家庄，过去日人高唱的沧石铁道或津石铁道是皆以石家庄为终点的。假如日人梦寐以求的津石线有一天筑成，敌人的铁蹄就可以很迅速地沿此路从塘沽经天津到石家庄，更进一步深入三晋！到那时候，横亘的太行山脉怕也阻止不住敌人的猖狂！

然而敌人的阴谋终于未能如愿以偿。芦沟桥头的一场血战，已惊醒了全中国的大众！中国是站起来了，不再步步退让！敌人至此大概也十分觉悟威胁欺骗已不能顺利的来完成其“巧取”的



侵略政策。真的！除非华北化成焦土，中国已决心用血肉阻止敌人侵略触鬣——津石线的完成。津石铁路恐怕要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芦沟桥事件爆发后，石家庄的空气自然也因之紧张起来，上行的火车是一日日的繁忙，机车的气笛，不断的发出狂啸！这一切在饱有战时生活经验（在北洋政府时代平汉线时有内战）的石家庄人民的脑神经里是不很陌生的。上月二十七日，平津局势突然变化，保定成为河北唯一的军政中心，日本的飞机接二连三地飞往保定轰炸。石家庄是保定往南第一重地，所以日本的飞机经常光顾，低飞侦察，不时用机枪往下扫射。本月四日奉命驻防本地的某部曾用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向敌射击，但未命中。

在石家庄经商的人，大半都是山西籍的客户，这几天来，有钱而没有什么事情的富商巨贾，听说已有不少离此返晋，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的少数。记者抵石家庄后，闲步街头，商店依然象平常一样营业，居民也都很镇定，毫无慌张的状态。据此地中央银行吴经理告记者，此地金融方面，只河北省银行钞票因为平津沦陷关系，信用上受点影响，但是经中、中、交三行竭力维持的结果，市面流通，与其它纸币并无轩轻，故金融也很安定。

芦案发生前，本地驻军就调往前方，之后此地往来队伍虽然很多，但皆系过路性质，所以有一个短时期没有负维持石家庄治安专责的部队。上月二十日以后，始有某部移于此，专负石家庄警卫之责。记者甫抵石家庄，对驻军所得印象是精神饱满，纪律严明，心里感到非常愉快。驻军长官对石家庄防空极为认真，除掉不时举行防空演习外，并派弟兄沿街晓谕居民以防空方法。石家庄居民自民国二十年石友三驻防本地叛变时遭受奉军飞机轰炸后，对空袭的认识，较一般内地居民真切得多，每家差不多都掘有地洞以防飞机投弹，因此，石家庄的防空，总算较内地要略胜一筹。



近来潜伏在石家庄一带的汉奸，颇为猖獗。本月四日恰为记者抵此间第一日，车站附近，又捕获汉奸八名，于他们身上搜出手榴弹等破坏物甚多。据记者向当地军警机关打听结果，近来捕获的汉奸，总数已不下三数百人，惟详细的内幕，因为军法机关极端保守秘密，故无法知道，但闻日内将要作一次大规模的判决。

因石家庄汉奸问题，使我联想起日昨火车中某君的话。某君告诉记者，上月三十日保定三辆子弹车被炸事件，一般人都以日机投弹的准确为异，因此有人断定这是由于汉奸的告密。这种猜测是真是假，尚需切实调查，但是今日普遍全国的汉奸活动，的确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记者由郑州至石家庄，沿途拍照，皆遭军警盘问，可见当局对治安维持，以及对各种形迹可疑者的注意和戒备，是很认真的，这可以使汉奸消形敛迹。不过我总觉得制裁汉奸扰乱后方，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组织民众起来执行。所以今后政府应更注重于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和指导民众救国运动。

（原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申报》）



平津失守与平汉前线

这次平津战事的失利，决不是战斗的失败，而只能归罪于战略上指挥上的错误。以二十九军弟兄抗敌情绪的饱满，前仆后继牺牲精神的壮烈，不仅令全国的同胞感动得流出热泪，就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士，也都自然地流露出崇敬的心理。芦沟桥的阵地，不是用飞机大炮夺回来的，而是二十九军弟兄用大刀手榴弹，奋不顾身在敌人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下，滚身前进，用血肉换来的。领导三十八师在天津苦战的李文田师长亲口告诉记者，天津抗战的时候，弟兄们用自己的肉身去冲破敌人的电网，在一层层卫国战士的尸首上面，终于突破了敌人的电网而占领了东车站和敌军大本营海光寺的一部分。尤其当天津抗战发动时，就连日本同盟国意大利的军队，也让我们的弟兄穿过意租界并举手敬礼。这样忠勇的战士，会在三天之中轻弃我们数千年的古都，华北唯一的商埠天津而向后撤退吗？

七月八号，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全国明达之士早就断定，这是日本法西斯军人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决不是一桩偶发事件。这种观察非常正确。敌人自在芦沟桥挑衅后，其侵略行动是极有计划的。第一步用威胁政策以图华北地方当局屈服，但是冯治安先生率领的三十七师忠勇的战士以不断的苦战来回答威胁阴谋。敌人第一步政策失望了，就运用第二步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在当时敌人自以为是成功的。敌人的报纸曾经认为三十八师



张自忠先生的部队是亲日的队伍，因此把攻击目标全集中在三十七师一方面。敌人估计分化政策是布置就绪了，只待有一个突然的事变。上月十九日，宋哲元先生离津返平的时候，在北宁路北仓附近发现了铁轨上有一个炸弹。事实是很明显的，敌人是旧调翻新，再玩了一次“皇姑屯”的把戏。幸而敌人这一次技巧拙劣，宋先生的专车平安通过。这样，第二步的分化政策，因宋先生的回平，又不见得成功。于是，敌人第三步就开始运用歼灭战术，企图一举以飞机大炮密集的攻击，粉碎我二十九军的战斗力。从七月二十六号三十八师刘旅在廊坊的血战开始，敌人就运用了这一最后的战略。廊坊的战事，敌军正式出动了大批的空军，二十七、八两日，团河南苑的血战，敌军轰炸机三十余架在我军营房的上空轰炸，敌军的野战大炮，数十门一排，连珠似地向我阵地猛射，坦克车、步兵一齐出动，南苑黄寺大楼，西苑宛平，在敌人的攻击下，差不多全成灰烬。英勇的战士们，在敌机轰炸声中，震聋了耳鼓，震眩了眼睛，他们在无望的挣扎中，溃退死亡。文化古城北平，不到两天，已全在敌人包围之下，留在城里的高级将领，此时若不仓促出走，就只有血战一场与城同尽了。

华北地方最高当局，以他们的睿智明达，决不会看不清敌人无厌的野心，但是在他们一贯的“忍辱负重”的原则之下，甚至到仓皇退出北平时止，还不愿意斩断“和平解决”的愿望。就为了当局过分期待和平，处处遭受敌人的牵制。华北的军队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不能迅速的完成战斗配置，平汉线上的援军也只能徘徊在保定迤南，不能前进。即连宛平后方唯一军事要冲的长辛店，竟至毫无防备。我地方当局为了热望和平解决，不扩大事态，自有他们不紧急动员的苦衷，以免过分刺激敌人。然而这正坠入敌人的奸计，使敌人在各点击破我们的军队。等到廊坊战事爆发，北平四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当局虽下令集中军力，准备



抗战，任邱河间一带驻军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推进，可惜机会已经错过，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敌人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攻，我们是无计划无步骤的局部应战，胜利的谁属是无待赘述的。可痛心的是太辜负了二十九军英勇抗敌的战士。芦沟桥抗战爆发后，始终没有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的组织。上月二十九日深夜，数千二十九军的弟兄，扶着在前方受了伤的战士，一步一挨的退到保定城外，抗战跋涉，二天二夜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横七竖八地整天躺在城门的泥堆上，受伤战士的呻吟声和肚子里难熬的饥饿，迫着他们发出沉痛愤懑的怒号。没有收容所，没有接济，虽然英勇的爱国壮士决不会因此而消沉自馁，但是我们总觉得良心上沉重地压着惭愧。好在经政府与冯治安先生的努力，为国受伤的壮士，现在已有后方医院疗养，而百战归来的弟兄们，也已经整理就绪，在不久的将来，国防线上，定可再见我们英勇二十九军战士们的努力杀敌。冯治安先生最近在保曾向人表示：“过去环境复杂，顾虑太多。现在一切问题都单纯化了，今后只要听命中央，中央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华北抗战所以受挫折，就在“环境复杂，顾虑太多”上面，但愿今后全国一致，朝向一个目标迈进。平津虽然沦陷，但是一举而廓清华北畸形局面，倒未始不是失望之余的一线喜兆！

在这次华北抗敌战争中，最光荣的收获，不仅是二十九军将士们的忠勇卫国，还有通县伪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两先生领导之下，毅然反正，与敌人艰苦血战，以及石友三先生领导下的保安队与孙殿英部民军在北苑一带的血战。他们的牺牲虽然惨酷到令人不忍卒睹，但是由于他们的反正和血战，清楚地告诉了全世界和侵略者，中华民族毕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毕竟是觉醒了！

记者七号赴琉璃河前线视察，实地访问最前线的驻军。二十



九军的战士因为经过长期间的血战，需要作短期间的休息和整理，所以平汉前线的防务，早已换上生力军某部担任。我们在前线所接触的高级将领和弟兄，他们抗敌的坚决和自信，使我们兴奋得要淌下眼泪来。驻防在最前线的冯师长告诉记者，他们的队伍，在挑选便衣队时，各部队的弟兄皆争先恐后报名，一时报名的人数超过了原来预定数两倍以上。还有某部的几个勤务兵和传令兵，他们自动请求上峰准许他们赴前线杀敌，他们万分不愿轻轻地放弃报国的大好机会。前几天我们的便衣队在良乡城四周活跃得很，良乡城里头的敌军，将城门紧闭，害怕得缩着头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过这许多卫国弟兄们的生活是太苦了。他们每月七块半钱的饷，一个月的伙食费就得六元多，所剩余的，还不够买一双必需的布鞋。前线的战士们并不希望奢侈的生活，他们仅期望后方援助抗战的民众团体多接济一些鞋袜毛巾等日常用具，至于防毒面具和药物，自然是更欢迎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各地后援会的同志们注意。记者更访问了苦守宛平二十余天的王冷斋先生，王先生今后大概要担任河北省府招待各地宾客的职务，所以他特地关照记者，希望各地慰劳团的组织，代表人数不要太多，代表一多，在战地上招待是极感困难的。王先生的意思，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注意。

在前线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两件事：第一是北方一般民气的消沉和民众组织之松懈，第二是汉奸活动的特别猖獗。中国本来就象是一盘散沙，近年来因为国难严重，中南部各省在政府注意下训练了许多壮丁队等，总算略见成绩。但在河北省政治措施上，处处与中央政府有些相违，因此对于国民中占绝对多数的农民，从来就忽略了训练与组织工作。农民们知识孤陋，缺少民族国家意识，都因为缺乏训练和实际的组织。这一种缺点，在今日需中国全民族动员抗战的时候，特显严重！德国名将鲁登道夫曾



说，全民族精神统一是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定论。可是在德国，它的战争是向外扩展，侵略弱小民族和国家，这种战争只是为德国少数有钱的金融寡头获取原料和市场。所以德国的野心军人为了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为少数资产阶级抛头颅抛热血，就只得创造一种虚伪的什么日尔曼民族是天生最优秀的民族等理论，排斥犹太人，胡说共产主义与宗教都是犹太人的阴谋，以这种方法来统一民族精神。虽然阴谋家用心良苦，但是结果民众必然会从事实上认识这种理论的虚伪性。东方的凶横强盗日本，现在发动全国民众来侵略中国，其法西斯的口号、目的与性质是跟德国绝对相同的，因此他们的结果也同样是一般无二。侵略国家的军人虽然道出了全民族精神统一的重要，但是事件的发展终会使他们的努力归于泡影。

然而在我们中国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个民族，全民一致要求打倒侵略我们领土，掠夺我们主权的敌人，争取国家的自由独立。所以只要抗敌战争一爆发，全民族都会精诚地团结一致。我们的民族精神统一，不需要象鲁登道夫那样去制造违反真理的理论，但是北方民气却出人意外的消沉，几乎使我们不可解释。而民气消沉，组织松懈，对全民抗敌的伟大战斗力量的树立，不待说是一大缺陷，因此民众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在前方是特别的需要了。为了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怎样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民众的力量与军队弟兄的战斗有机的联系起来，该是今日最迫切的任务。记者在前线晤及某师政训处长文国琳先生，他很恳挚地谈到组织前方民众的各种困难，谈到军队里政训工作的不易开展。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今后的民众组织和训练工作，必须由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三方面密切合作，才能获得成效。

在前线我们听到好些极严重的传说，有少数县份的地方行政长官，竟在敌人踪迹未发现前弃城潜逃，这样的行政长官，怎配



去领导民众、训练民众？这些事实使记者想起，后方的救国团体应该努力培植深入民间的工作人员。

其次关于汉奸问题。在前线不时可以捕获汉奸分子，这些被逮捕的汉奸中，十之八九皆为生活无法解决，以极低廉的代价，供敌人驱使的可怜虫。他们的技术非常低劣，记者有一晚宿前线某司令部，车站方面捉来一个汉奸，问他在什么地方做事，他说是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当弟兄的，再问他三十七师师长是谁，他却瞠目不知所对。这样的汉奸，敌人驱使他们不在探听军情，主要是在破坏交通等等。为了几块钱背弃祖国去为敌人卖命，想起来真是可痛而又可怜。

记者早就认为，对付这些汉奸的办法，最根本的是加紧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提高人民爱国抗敌的热情。这样，民众便可以直隶肃清当地的汉奸，使汉奸无法活动。目前军队对汉奸的注意的确是极认真的，但是也有缺点。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政府军队或民众团体，对于扑灭汉奸，应该有负专责的组织来管，这样才能有系统的调查和破获。我们对捕获的汉奸，不仅是处以极刑，最要紧的是应该用各种方法，使他供出羽党，以便一网打尽。这决不是普通军队里的长官或弟兄所管得了的。记者到各处考察的结果，有许多汉奸自逮捕后，即东移西迁，引渡到第二第三机关审问定讞，时间一拖长，就可以使那些汉奸羽党有所准备，捕捉自然困难得多。我很希望政府的特务机关，在此时应该全体开到抗战前线去专门做扑灭汉奸的工作，后方的民众团体也应该加倍努力掌握铲除汉奸的宣传和行动。

记者在前方观察，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取得，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固然是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倒是要看今后民众与军队怎样打成一片的问题。谨以此语作本文结束，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原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申报》）



苏州河中的五日夜

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左右，当黄浦江中泥浊的潮水涌入苏州河的时候，我乘坐的帆船开出了老垃圾桥，向西驶去。

一条苏州河，划分了两个世界。河的北边是炮声、炸弹爆裂声的交响，而河的南岸依然是熙熙攘攘，充满和平中繁嚣的市声。我从船上向北边看，敌人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在阳光中象一个个银球，清晰地从空中降落，接着便是轰隆隆的声声巨响，一股股浓重的黑烟冒上了天，泥灰、破纸屑飞舞在苏州河的上空，又散落到我们的船上。我们的船就行走在这天堂与地狱的分水线上。

船过曹家渡，我们的心情有些紧张起来，因为再往西驶去，已经没有租界的依靠，苏州河两岸都是中国地界，敌人的飞机大炮可以毫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为了保护人和船的安全，在这闸北大场一带战斗正是激烈的时候，船夫连夜把船摇出危险的北新泾一带。一轮深秋的明月和连珠似的枪炮声，伴送我们西去，也冲破了夜的沉寂。我难以入睡，站在船头望着四野，不少被敌机炸毁而半浮在江面上的沉船，迎面而过，夜风吹来，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第二天一早睡醒起来，朝阳照得两岸的稻田一片金黄，河水也不象上海附近那样混浊，河面泛着绿波，野鸟在岸边矮树丛中欢唱着。这一望无垠的丰收景象，这美丽的田园秋色，简直象是



把我帶到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我照旧站在船头，领受这大自然的赐与，暗暗感到心头的畅快。的确，一个身居上海闹市的人是很难享受这明媚如画的秀色的。对于象我这样两个月来在战争空气下过着刻板的报刊编辑生活的人来说，真是难得的轻松。可是，刚刚产生的这点闲情逸致，很快也就被轧轧的敌机声打断了，我的思潮重又回到了现实。由于敌机的飞临上空，顿时觉得原野为之变色，已经不是明媚与柔和，而是显得沉寂与恐怖了。

说日本的强盗们最爱与中国的老百姓作对，并且以此炫耀自己的胜利，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们的木船摇到黄渡镇桥不远，两架敌机正飞过来在黄渡镇与江上大显身手。在这没有武装的村镇上空，敌机显得多么的威风。它低飞盘旋，机身发出怪声，然后是俯冲投弹，它的机身简直可以触到船上的桅杆了，然后侧身飞上高空。就在这一瞬间，行驶在我们前面的，与我乘的船距离不到半华里的一条民船被炸下沉了。镇上也落下了炸弹。我眼巴巴地望着敌机在头上施虐，只有听天由命。要笨重的木船一发现敌机就迅速靠岸，让搭船的人上岸躲避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的空中武士在镇上投弹，在河中炸沉了木船之后，胜利返航了。法西斯就是这样与善良而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真是不共戴天的呀！

在敌机飞走以后，我们的木船靠了岸，我走在街头，看到人们的脸上还留着余悸。突然发现一个老太婆左手抱着一具小孩的尸体，右手掌遮着额际的阳光，伸着头呆呆地望着天际，龙钟老态和那可怕的面容，使人心弦为之颤动。这时候那被炸沉的船上的贩米主人和水手，由于跳下水的时间早于敌机投弹，总算幸免于难，从水里游了出来，通身湿透蹲在江边，不言不语，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沉没的船只，脸上充满绝望的悲痛。看看这情景，“人道”这两个字在日本侵略者的字汇中是半点影子都没有的吧？它所有的大概只有“兽道”。



从黄渡镇向西，一路溯江而上，两岸景色依然而河中的沉船越来越多。中华书局的五船书，被敌机炸成碎纸片漂浮满江。小火轮被炸沉的也看到好几条。被敌机炸沉的船中漂出的尸首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不时地从我坐的船只的两旁向东漂去，一张张灰白的脸，令人惨不忍睹，令人怒火中烧。他们是谁？他们的子女、父母，恐怕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归去。日本强盗如此残忍，如此酷嗜平民的鲜血，这是人类的耻辱！

沿着苏州河有不少小集镇，大都坐落在江边。我是每到一镇总要船只停下来上岸去看看。每个集镇上最大的商店，必定是碾米厂，可以想见江南鱼米乡的名不虚传了。大凡我经过的那些小镇，都使我失望。在这靠近战区的后方，看不到一幅抗战的标语或漫画，也没有报纸，在一个镇上能看到一份上海的报纸就算很了不起的了。人民还是在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只有敌机来袭，才扰乱了镇上的和平，使他们感受到敌人的残暴。然而，这种活的教材给予他们的也是悲伤、恐惧超过了愤懑。人民没有教育，缺乏组织，这最可痛心的“民气低沉”，又是谁人之咎？！

西行重西行，整日在敌机的威胁下，坐着这十五世纪的运输工具，其中满载着准备运到武汉去的新闻卷筒纸，经历了五个昼夜的航行，逃脱了几次的危险，终于到达了我的第一站古苏州了。

苏州是人们赞美的人间天堂，如今反成了人间地狱。敌机一天数度来袭，苏州的大部分人民，差不多有半天多的时间，消磨在防空的地窖中，市面是分外的萧条了。苏州人的脸色是贫血的，黄得有些呆板。

苏州是后方基地，民众的后援工作，虽然做了一些，但总不能令人满意。有人说后援会的工作精神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恐怕下仅苏州一地的情形吧。现在正是需要动员全体民众，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希望苏州民众团体的领袖和



爱国的热血同胞，加紧地工作起来。

在苏州最欣喜的是碰见了刘良模、吴大琨等好友，他们是青年会军人服务团的干部，努力在为受伤官兵义务服务，成绩斐然。见面后他们再三诉说工作范围扩大了，而应用工具（如书报、无线电收音机）很不足。中国的一切都需要从极大困难中埋头苦干。以他们那样的服务精神，我想任何物资困难，也阻碍不了他们工作的开展吧。

（原载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申报》）



熊式辉之言

——江西省的动员民众办法

暴日的铁蹄已蹂躏到赣北一带来了。江西三千万民众现在已经迫切地需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家乡而战斗！我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偕武汉各报驻南昌外勤记者，访谒江西省政府熊主席，叩询关于动员江西民众以及保卫江西的意见与一般设施。

当我们一群外来记者的面前，熊先生以极耐心的态度，与我们作二小时的谈话，使我们知道许多江西省政府当局对抗战民运及政治军事上的布置。以下我愿意简单地将江西政府当局的见解向远地读者作一介绍。

熊先生在敌人压境的情况下，提出了四个口号，便是：（一）不准敌人走江西的路；（二）不准敌人住江西的屋；（三）不准敌人吃江西的米；（四）不准敌人吃江西的水。这是熊先生所提倡的坚壁清野的办法。如何来实现这一计划呢？第一是彻底的破坏公路，要做到化路为田，使敌人的重兵器无法在江西境内自由活动；第二是焚毁敌人必经路线四周的房子，即使不能焚毁的也应除去屋瓦，使敌人无屋可住；第三是将接近战区一带的历年积谷，扫数运回后方，因此，即使敌人深入，也无法吃江西的米粮；第四是塞井填沟等工作，使敌人不能饮江西的水。

这四项坚壁清野的办法，在省政当局的眼光中，认为是对付



具有优势武力的敌人最厉害的办法。不过事实上，记者近二旬来在各线旅行，尚未发现各近敌地区开始按照当局的原则去做。而且象公路的破坏就是据熊先生自己的表示，也已发生困难。因为公路的破坏，严重影响到我们自己军队的运动和一切有关军事的运输，因此江西军事当局与政治当局在这一个问题上，见解便不能一致，而这不一致，阻滞了执行。邻近战区的各地民众，现在差不多是迁移一空了，但民众的迁移是无计划的各自逃奔，因此，塞井、焚屋、毁路，都已没有人去做了。今日江西省当局还未能开始按照自己理想彻底执行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熊先生表示很重视动员民众的工作。他说：“古今历史，谁能动员民众，谁便能获得胜利。”他认为过去民众动员不起来，主要原因在政治机构不健全。他说政治机构相仿于骨干，要能动员民众，必先使骨干健全起来。因此他自从去年十二月由南京回到南昌，便专意于培养一批充任区镇长的青年干部，到今年四月，不惜花了四十万经费创设地方政治讲习院，每期训练三个月，第一期已经毕业。可是随着时局的紧张，第二期现在尚无法开办。沿江战事紧张以后，江西当局认为局势严重，又创办一种战时民众组训干部班，预定招收三千青年，每期训练一星期，训练期满即分发沿江沿湖各县襄助县政府做动员民众工作。最近又在南昌招考民众组训高级干部训练班，预备招收能力较强的青年，授以一月训练，分发后方各县去做训练动员民众干部的工作。

行政机构的不健全，是动员民众的一大阻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江西当局有毅力来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充实基层的行政人员，这是可喜的现象。培养大批青年干部，在抗战爆发以后，已成为各地方政府及军队一致的努力目标，据不久以前的粗略估计，全国有七八万青年在受着各种训练。这种训练，到现在成绩圆满的还是极少的少数。其原因，训练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据江西的干部训练情形，政治讲习院



的课目，有六七十种之多，如卫生行政、禁烟行政、警察行政等名目不胜其繁。以三个月短促的时间而要学员修毕大学四年都不能读完的课程，这是如何可能？江西的干部训练，现在还在初创，我们不愿多作不必要的成功与否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便是训练内容要“精”，要“简”。

动员民众这件大事，是否除了地方行政机构要改善以外，还需要民众有组织起来的自由？熊先生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认为“民众动员不能由民众自动的去做，而要由政府统一办理。”所以江西今天各县的动员委员会是由县长做主席，这是熊先生“定乎一”的主张。他认为：“某一县的绅士愈多，则各人都要组织什么团体，因此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动员的事情反而置之不理，等到局势一严重便溜之大吉。这理由，是因为民众（实际只是少数绅士）没有责任心，而县长就不同了，他有责任，有省政府在后面监督，不敢不负责。”把各地方少数腐化的豪绅，看作是民众的唯一领袖，或者是民众的唯一代表者，这大概是所以使江西省政当局不相信民众有自动组织能力的一大原因吧！因而民众至今也未能真正动员起来。

为了保卫江西，江西当局是在这样干，前途怎么样？让亲爱的读者去思索。

（原载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新华日报》）



记九江姑塘战事

敌人占我马当、彭泽湖口以后，九江一带与敌只有一水之隔。当时，从军事方面着眼，敌人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将侧重于大江以南，九江已成为敌人进攻的第一个目标。终于这一幕九江的争夺战，在敌人姑塘偷渡的事实下揭幕了。

从九江到姑塘，是一三角洲地带，面着大江湖水，敌人处处能骚扰登陆，我们虽然以重兵防守，但地形条件对我确实十分不利。敌人飞机不分日夜到处低飞狂炸，上月二十二日晚，敌人在姑塘迤北广西桥登陆前，我方沿湖工事，大部已被敌机炸坏。当时，鄱阳湖口东岸敌方汽艇一字排列，绵绵二三里，敌方偷渡企图，昭然若揭。二十二日夜，乘天色昏黑，敌汽艇十余艘，载兵五六百人，于广西桥偷渡，我方该处守军，迨敌军登陆后，激战一场，即向西南转进。该师师长闻讯，迅命另一团驰往增援，严命击退敌人，收回原有阵地。该团增援前进时，在沿湖一带已经有敌大部登陆，遂发生剧烈之白刃战，相持到二十三日天明，敌飞机群轰炸，放射机枪，我未能将原有阵地克复，牺牲极为壮烈，不得已亦向西转进。敌复步步进攻，到二十四日，战事已蔓延至九星（从九江到星子）公路两侧。我××师×××师相继与敌接触，发生激战，但是敌机每晚三时后即出发，一切工事尽被毁坏，我炮兵阵地被毁亦多，在这种情形下，我军坚守阵地也不容易。二十四日晚，我方便抽调扼守新港狮子山一带第×师大



部进行猛烈反攻，惟因运动困难，反攻不到二小时，天已黎明，未得结果。到二十五日，正面我军续战续退，退至庐山山麓。到二十六日，敌更在九江发动战事，九江我军一方面因九江无险可守，更因受姑塘敌登陆牵制，经一昼夜激战后，阵线遂亦转移。至此，敌人在姑塘至九江三角洲地段完全打通，战事可说已告局部的段落。

这一次战斗，我方牺牲极为壮烈。其次，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一星期，我阵线尽被突破。主要原因不在我方炮兵或步兵作战技术过低，也不在我步枪、重炮质地穷劣，而在敌方飞机太多，太猖獗。据一位负伤同志告诉记者，从前在上海作战时，敌机不发现大目标，不乱肆投弹扫射，这一次差不多每一村庄，每一树林，皆成为敌机投弹扫射的目标。由于敌机的猖獗，我新式重炮，无法发挥威力，有时偶发一二炮，我炮兵阵地即遭敌机成群结队而来侦察，若发现一个小目标，便大肆轰炸。故这次我方牺牲之众，主要原因是受敌机荼毒。

从这次战斗中，记者感觉到有二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战区交通问题。过去南北各战区对敌作战经验，因交通工具，如铁路、公路等，在我军转移新阵地时，不能彻底破坏，致被敌人利用，对我甚为不利。这一次赣北战事未起，南浔铁路便已开始大事破坏。铁路交通我方无法利用，所能利用的，只有星子至九江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离湖面极近，此次敌在姑塘登陆，旋踵即将我唯一交通线截断，当局无法在事先预设交通路线，这是一个失着。在今后对敌作战上，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交通问题不解决，重兵器临时无法后移，大批负伤战士无法撤退！

第二个问题是对负伤战士的管理问题。此次作战，前方既无野战医院，甚至连救护队也没有，许多勉强能够步行的负伤战士，忍着饥饿步行到离战区不远的地方。这种现象，令人极为痛



心。一个为民族在疆场浴血的战士，他们百战余生，本应受特别待遇，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真惭愧，怎样对得起这般的为国流血的同胞！

抗战是长期的，我们不怕战争的局部失败，但是我们应从许多惨痛的教训中，有勇气、有良心来改进我们的缺点才对啊！

（原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新华日报》）



赣北战地见闻

辛劳的将领和神勇的士兵

东孤岭失守！我们德星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被迫放弃了！德星公路上的战事，已到最紧张的时刻。记者就在这一紧张的局势之下，驰赴前线。

在庐山与东西孤岭山脚下，公路沿线与敌人浴血苦战的是百粤健儿×××师所部。自从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参加作战以来，就整天在敌人的大炮飞机的轰击战斗中战斗着。东孤岭失守后，曲尺形的突出阵地，在作战上更陷于不利，但是上峰的命令是“死守阵地”，“即剩一兵一卒，亦不准后退”。他们在这样一个森严的军令之下，尽管是成千的伤亡，仍坚决地为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而苦斗着。记者十日下午到达×师师部，晋谒×师长，首先代表本报向这位转战数千里的将军致敬，并探询前方的军情。

×师长在繁忙的电话声中，抽空向我们作了简要明快而沉痛的说明，最使人感动的就是他说：“本师虽因装备不及敌人，此次遭受巨大牺牲，但上面命令我们死守，我们为了尽卫国的天职，虽剩一兵一卒，亦必坚持抗战到最后。刚才在前方指挥的×旅长打电话来，向我报告紧张的军情，我回答他只有一句话：

‘坚守原阵地，奋斗到最后一刹那为止，成败利钝，都不要去作计较。’”接着又告诉我们：“我今晚即上前线指挥作战，与我部下共存亡，只有这样，我才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下。”



当一轮皎洁的秋月刚刚照临大地的时候，×师长就带着他一连卫队，静悄悄的踏上那空旷的原野，向东走去。在震耳的炮声中，记者也赶紧收拾起简单的行李跟着他们一群，走向前线的指挥所去。

敌人的重炮，正在向西孤山作不断的轰射，我们西孤山的守军，以机关枪的怒吼，来回答在大炮掩护下敌步兵的进袭。一次失败了，二次，三次都失败了，敌人的尸首堆满了山谷，而我们的阵地依然屹立不动。负责指挥西孤山方面作战的××军军长、×××将军，他们自己就在火线上指挥士兵作战。在最艰难的作战环境中，我们的高级将领，有这种牺牲精神，大大地鼓舞了战壕中疲惫饥饿的战士的勇气，记者为这种精神所感动，内心发出无限悲壮的快慰！

尽管敌人的毒气是那样的惨无人道，尽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整日不停地在我阵地上轰炸，然而我们前线弟兄的士气依然是那么的振奋。在九月五日，××团的弟兄张德强，从东孤岭退下时遭受重伤，横倒在敌占的区域里，无法跟随大军撤退。在那样危险的环境里，他以手代脚慢慢将身体滚到树林中，白天以尿为解渴的饮料，晚上又偷取田中山芋充饥，如此经过三天，等到第四天晚上，他慢慢地爬出来，身边尚带有仅余的武器——二枚手榴弹，想爬回自己的阵地去。当他爬到距我们自己阵地约二百米远光景的地方时，看见有十多个敌人正在赶修工事。张德强敏捷的将所带两个手榴弹，对准敌人投去，结果敌军四五人中弹炸死，其余未伤敌军赶忙逃窜。张德强待敌人逃散后，缴回敌步枪数枝，安全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九日我们招募敢死队进行夜袭，自愿参加的弟兄，很踊跃的报名，加以编组后四出摸营。有一组弟兄四人携手榴弹八枚，悄悄地向东孤岭西北的港口出发，当走进敌人的防地的时候，在黑夜里，怕死的敌人听见脚步的声响，吓得不敢出外，胡乱的放了一阵枪。我弟兄立即分成两队，



伏在草地上不动，等到敌人枪声一停，又悄悄绕到敌人后方，八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身上投去，当场炸毙敌军四五名，其余象惊弓之鸟一般，弃械四散逃命，我弟兄当场获得步枪四枝。敌人逃散后，很久不见动静，满以为我们的神勇壮士已凯旋回去，便大模大样地走了回来，那里知道我们的忠勇弟兄仍像神鹰一般等待着送死的敌人，所以不到片刻，用敌人遗弃的枪枝，又打死了四五个敌军，然后才高兴地返回自己的阵地。

夜袭，在前线已成为我们弟兄最兴奋的一种工作，三个二个的敌哨兵时常被我们俘获过来。白天在敌人优势火力下，誓死抵御的前线战士，大家都把夜袭当作发洩心头怨愤的最好机会，而贪生怕死的敌军，在我们夜袭战士的面前，竟是引颈就缚的一群羊。

（原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新华日报》）



战地访问李汉魂将军

对于过去坐镇潮汕，在七七抗战爆发前后，面对日寇挑衅威胁，预立遗嘱，应付危局，威武不屈，坚决守土的李将军，全国有不少的同胞已有很深的印象了。

抗战发动以后，李将军率领百粤健儿，转战大江南北。在这次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记者在××战地晤见，畅谈之下，对李将军洞察抗战形势的深刻，更表示无限的敬佩。

九月廿二日的下午，在一间满壁挂着军用地图的简陋屋子里，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记者首先询问最近的战争形势，他指明，目前敌人为了加紧进攻武汉，在南浔线以及星子方面，除了积极构筑工事外，似已放弃进攻企图。因为自从九江战役到现在，我方在赣北始终保持着有利的地形，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一方面敌人看到对南浔线的进犯，失掉它一时间上的战略意义，同时我忠勇将士坚强地抵抗，亦使敌人不敢贸然深入。不过敌人既想攻占武汉，必然要先图控制武汉四周军事上的据点，因此，连日来瑞昌武宁间公路上的敌军蠢动，颇值得注意。但是那方面我们军事上的布置很周密，而且幕阜山脉非常险陡，敌人即欲向那方面活动，困难也很多，结果将遭受更大的打击。

记者当听完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以后，因感到第三期抗战现在正处严重关头，往往有少数人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发生忧虑，所以特提出“抗战必胜”的理由的问题，请李将军根据他个



人作战经验及观察给一解答。

关于“抗战必胜”的理由，李将军首先告诉记者说：“当我驻军汕头的时候，对于抗日战争，只觉得这是保卫国家的天职，成败利钝，均非所计。那时候，惟一的目的只是与日寇拚，可以说只求成仁，不曾想到成功。但是经过这次较长期间的抗战，使我成功的信念更提高，抗战必胜的把握更坚定。不仅我个人如此，就是我的部下，现在对抗战的信心，都很有把握。许多弟兄从几月来的作战中，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他带着询问的神态向记者说：“今日在战区中，你们看到一个弟兄对抗战畏缩和动摇的没有？决没有的。一般将士对抗战的坚决，自信的提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接着，李将军说：“我们抗战必胜的惟一条件是坚持抗战到底。只要我们能坚持，抗战必然有前途。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广大的领土，可是由于其兵力不足，我们在敌人占领区域的游击战争广泛发展，到处扰乱敌人，使敌人蒙受大量牺牲，得不到代价和补偿。再加上我正规军的坚持抗战，我敢相信，这一种坚持，不怕经济力衰弱的敌人不崩溃。国际上的形势不怕不更变得与我有利。我们只要有人，有枪，有粮食，抗战从一期二期三期，甚至继续到九期十期都可打下去。所以从军事上看，即使武汉万一受到威胁，只要坚持，必能最后取得胜利。而抗战的坚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这一次的抗日战争即这样坚决，加上民众的拥护和督促，即使有少数意志薄弱的分子，于战争严重关头丧失自信，但是他们决不敢进行误国的活动。因此从军事上看，坚持抗战没有问题，抗战必胜也没有问题。”

关于政治方面，李将军表示，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战区民众的逃去，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现象，民众动员无成绩，使军队作战遭受到很大的痛苦。李将军十分重视民众动员，



他告诉记者，军队倘能得到民众的帮助，等于增加军队三倍战斗力。他更告诉记者，回忆北伐时代，他在九江南面马回岭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的时候，军队在民众热情帮助和革命空气鼓励下，象增加了几倍的力量，把孙传芳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这种军民合作的精神，照理在这一次划时代的民族对外作战中，应当更表现得热烈和有力，可是客观事实，并不是那样一事情。言下很有些不胜今昔之慨的样子。

李将军把民众动员不起来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种理由：第一是保甲制度的不健全。他说，有些地方的保甲长，不仅自己先民众而逃跑，而且还对民众大肆恐吓，叫民众马上逃跑，表示不逃跑他不能负安全责任。其次是地方行政官吏的腐败。他举出九江的例子，九江还没有失陷，县长已躲入深山，这样的“亲民之官”，怎能领导民众。过去做民运工作的人，只讲表面，不愿深入下层，再加上民众教育的不够，一部分军队军纪的不良，便使军民间形成了鸿沟。

不过当说到政治一般形势的时候，李将军仍是很乐观的。他说：“目前政治上的进步，虽然赶不上紧迫的客观形势的需要，然而这也有它的原因。中国真正的统一时间短暂，正因为这原因，使政治的进步不能赶上客观形势，影响到了全民动员。然而在其基本上仍是在进步的。大家都能站在‘民族高于一切’的原则底下，团结起来，我们就一定会愈打愈团结，这种团结一定会愈打愈坚固。我们全民族团结，就使得敌人多方面建立的汉奸组织，没有办法找到有名望的人去做它的傀儡。这种民族的觉醒，证明了中华民族决不会灭亡，这种民族的团结，更说明了中国抗战的必然胜利。”

最后，李将军还与记者谈到外交、经济各方面的敌我对比，与我方有利的所在。记者除了钦佩李将军的丰富学识和远大眼光外，在这第三期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把前方将领对抗战的见解，



忠实地笔录出来，告诉后方读者，想不是一件无谓的工作吧！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新华日报》）



大战火烧山

火烧山，坐落在金轮峰下，西边山的西南。这一座低矮的小山，高度不及西边山的三分之一，面积只有二三百平米。

火烧山在地图上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遭受敌机投掷燃烧弹，整个山头的草木完全烧掉了的缘故，大家都以火烧山来称呼它。这样一座无名的小山，有我一团千余忠勇将士，经过三日三夜不眠不食的恶战，在敌人大炮飞机居高临下的猛烈轰炸下殉了国。这种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精神，换得了敌人同等的代价，争取到三天的时间，使我德星公路上主阵地得到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布置。我们将士的热血染遍了火烧山，它告诉敌人：“我们的锦绣山河，是一寸也不允许敌人轻轻踏进来的。”

敌人占领了公路两侧的孤山和西边山，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占我左翼宝塔山大脑包几座高山，突破我左翼，迂回到隘口的后面。敌人从左侧窥我隘口防线的企图已经很明瞭，在这紧张的形势底下，为了巩固我主阵地，不让敌人轻易深入，在作战地形上显然处于不利的火烧山，我们××师的××团，英勇地担任了这一前进阵地的防守任务。

生长在江南的人都知道，九月的天气爽飒、和暖，可是德星公路上，受着鄱阳湖和庐山云雾的影响，气候变得很快。廿日晚上，我方一团满怀热血的壮士，通过蜿蜒的羊肠山径，进入阵地。天色已经微微透露出曙光来了。归宗寺、烂泥塘、鸡笼山以



及鄱阳湖上敌方军舰上的大炮，不断地向火烧山摇山撼海般地射来，浓厚的雾幕，重重地围绕在山头，辨不清手指。正在向前运动的第一连，在西边山与火烧山的山坳里与敌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

西边山上的敌增援部队愈来愈多，一连弟兄于冲杀一小时后，所剩只有一排人了。第一营营长潘正卿接到这报告时，马上下令派第×连第×连绕道出击。我们的战士象饿虎一般，冲入敌阵，一场恶战，终于击退了顽攻的敌人，第一连的一排壮士生还了。

庐山的浓雾由稀薄而完全消失了，早晨的阳光，照射在我的阵地上。火烧山前，发现五六百敌人正向左蠕动，施其一贯的包围战术。第×连的弟兄，这时也奉命参加作战。西边山与火烧山山坳中，又是一幕壮烈的争夺战！敌人的炮火值着晴朗的天气，连续不断地向我阵地上轰击。

敌机也大肆活动。火烧山已被翻腾的泥土和火药发散的白烟笼罩了。格格格的机枪声，不停地吼着，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击退。随着战况的激烈，第×连也参加战斗。这一场惨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我们的许多壮士，在敌人大量炮弹下，忠勇殉国。敌人伤亡不下二百余人，不敢再攻，向后撤退。

二十二日拂晓，敌又集合大部来攻，被我奋勇击退。从正午起一直到傍晚，敌人又连攻三四次，战况比二十一日更激烈，每次都被我守军击溃。敌人经我数度痛击，伤亡又达三百余人，而我二营忠勇战士，经过这次战斗所剩也只百余人了。连排长受伤的也多，他们都坚持在前线作战。入晚，敌因屡攻不下，恼羞成怒，又增援反攻，一时枪炮声震聋耳鼓。我阵地经连日敌炮轰投弹后，毁坏尽净，各连轻重机关枪手，都相继在阵地饮弹阵亡。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方集合数十官长，亲自进入阵地，发射机关枪，猛投手榴弹。战至夜间十时，我仅手榴弹一项，便用去



××余枚，这次敌人伤亡几达五百余名，死尸叠填山谷。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我阵地始终屹然未动。

二十二日早晨七时，强横自大的敌人见攻不下我们一个平常的山头，一气之下，动员千余人四路来犯陈家岭一带。面对着这一股凶猛的敌军，坚守火烧山的官兵仅剩一二十人，可是他们没有后退，他们的心头，只记着一句话：“死守阵地。”战斗持续到正午十一时，我方阵地上仅剩两三个人了，还是拚命射击，三天三晚的疲劳饥饿，都在“保卫国土”的光荣任务下，忘怀了。到正午十二时，仅剩二三忠勇将士也殉职在火烧山上。一千数百壮士，静静地横躺在山上，枪声听不见了，一切归于静寂。

畏怯愚蠢的敌人，到这个时候，还不敢放胆前进。敌人看见山头一层层我将士的忠骸，还以为是我方忠勇将士死守阵地不退。一直到下午二时，可笑的敌人方敢施放烟幕前进。我们虽然放弃了火烧山，然而我们主阵地的火力，迄今仍可达到山头，敌人至今仍未敢以稍大的兵力进入火烧山。

三天来的浴血战斗，敌人每天发炮不下三千发，飞机投弹与弹药消耗不可胜计，兵员的死伤更与我们相等。以这样巨量的代价，所得的仅仅一个山头，而且连山头也不敢加以占据利用。

当记者赶到××团团部的时候，火烧山的战斗已经过去，吴团长在山头星光闪烁底下带着激越的音调告诉记者：“我部下一千余人全部殉职，打击了顽强的敌人，可算对得起国家。只是我自己，今天尚没有死，我愧对国家，愧对部下。二十二日晚，于情况最危急时，我已决心率领一切勤务伙夫等杂兵，加以编制，到火烧山去与部下共生死，后来由于上峰一再劝慰，报国时期尚长，所以没有去。”吴团长言下，不胜叹息。

天际只有星星，夜是黑的，敌人军舰上的探照灯，不时向山头闪电般的扫来，敌人的重炮，彻夜发出洪大的响声，震动了整个山谷。一间破旧的茅屋，一支如豆的烛光，照着满面烟尘的吴



团长，我们二三个人在侃侃谈着眼前刚刚消逝的战事。

吴团长怀念着已经为国捐躯的部下，他告诉记者许多忠勇的故事：

“敌人方面，有不少伪军，他们在激战两昼夜后，以为我军两日不眠不食，有机可乘，在阵地上大肆反宣传。可是我们全团官兵，无一动摇。大骂出卖祖宗的贼子，我今天的枪弹，正拿来打你们这班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们第一营潘营长，作战最勇敢，负伤数次，曾有一只眼睛作战受伤成瞎。他这一次在火线上英勇指挥不幸失踪了，多半怕已阵亡。他平常最富民族意识，曾对部下讲，在这为求国家民族生存的抗日战争中，倘若我部下死伤近百，做主管官的我，即使不被打死，亦应自尽。这次最危急时，第一营全营只剩下十几个兵，营部电话机二具皆被毁坏，前后情况全被隔绝。他召集部下四连长说：我部下已差不多打光了，上面的命令，是虽剩一兵一枪，亦不准轻弃阵地。我们只有拚，即使拚到剩几个兵，我们还要打，打死为止。这是何等的壮烈。”

“第四连排长尚凤歧，是一个臂力过人，临阵最沉着的投手榴弹名手，在崇德作战时曾以手榴弹打死敌人三四十名。此次在火烧山不顾敌猛烈炮火，站在悬崖上，连投手榴弹四十余枚，敌中弹伤亡近百。西边山的敌人轻机枪，毫不放松的对准他射击，结果身中七八弹阵亡。”

夜已深了，机枪声和大炮声愈来愈响，吴团长的谈锋还是健得很。吴团长临睡前告诉记者：“×副师长说，火烧山这一次战役的结局，真象死诸葛亮吓退司马懿。”

心灵受了极大感动的我，出了茅屋，远望这连亘的崇山峻岭，这锦绣河山，虎踞龙蟠的山岭，正是敌人葬身的墓域。我会心地笑了。火烧山我忠勇战士的壮烈牺牲，会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留下最光荣的一页。这一座无名的小山，定将与匡庐鄱阳同垂



不朽。

一九三八、九、二十七于德安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新华日报》）



庐山脚下游击战

南浔线的战局，当敌骑窜入马回岭以后，形势本甚紧张，幸我两翼的守军始终能够占据高山据点，威胁着敌人的侧背，使它不敢长驱直入。记者于九月二十七日特往访在庐山脚下蜘蛛山金银街一带屡获胜利的第××师的战士。

九月初，南浔线正面的敌人，曾经几度向我庐山西麓金银街蜘蛛山阵地进犯，企图迂回前进切断我德星公路，使我血战于东西孤岭间的将士有后顾之忧，南浔正面我军，更感突出之苦。敌人这一企图，终于在我英勇将士的坚苦奋战中粉碎了。从那时候起，庐山西麓的敌人，便由攻势转入守势，激烈的争夺战，顿时沉寂下来。可是我们英勇的战士，仗着一腔杀敌的热血和雄心，决不愿坐待，采取被动的防御，当敌人不敢进攻的时候，他们乘机出击，展开主动的战斗。

赣北是有名的多山地带，庐山脚下我们的弟兄，每到晚间，时常三五人一队，静悄悄地穿过崎岖的山路，去摸敌营。起初几天，每天都得到许多战利品归来，一个两个活的俘虏，也在不知不觉中落到我们夜袭勇士的手里。据夜袭归来的战士说，敌人警戒线上的哨兵自我军连夜到处活跃后，多不敢一个人出来放哨，往往四五人或六七人聚集在一起，蛰伏在小屋子中，不敢出来。敌人这种畏怯怕死的心理，恰给我夜袭勇士以聚歼的机会。有时当我神勇的战士摸到敌人聚居的小屋旁边时，敌人还不知道，三



四个手榴弹一齐从窗口投进去，屋子里面的敌军，一瞬间便成了血酱肉泥。

对于我军的袭击，敌人开始恐慌起来了。对付我们夜袭战士的防御办法，是在第一线上布置一道铁丝网，并在网上挂以铜铃。这还不算，敌人更用了不少军犬，散布在铁丝网内，这样一来，我们夜袭战士，倘若摸到铁丝网旁边，只要一触到铁丝网，铜铃便会响起来，警犬也会对我战士狂吠逼进，可使得担任警戒的敌兵有充裕时间来作准备。敌人自认这为聪明的妙计，岂料我战士早已放弃了老办法，夜袭仍是我们战士的经常功课，而每一次出去，多多少少总要拿些敌人的东西回来。这一种夜袭继续到九月的后半月。我们的弟兄，因为每次胜利的鼓励，已一变过去零星出击的姿态，而改为几百人的大规模出击了。

康家山在蜘蛛山的前面，有敌军一百零六师团一四五联队的两个中队一个机关枪队占据着，并且做了很坚固的工事，是敌人左翼的一个军事据点。十八日的早晨，我两营弟兄出击，目标是攻下康家山敌军这一根据地。敌军利用优势的地形与坚固工事，以猛烈的交叉火力网来压制我军的接近，但是我们战士前仆后继，攻击了三四次，终于突过了敌方的火力圈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手榴弹尽向敌人众多的地方投掷，壮烈的白刃战完全代替了机关枪与步枪的射击。我们弟兄的勇敢，真可以惊天地动鬼神。有一个班长叫做陈汉江的，他一连用刺刀刺死了四个围着他肉搏的敌人，他自己也身负两创，幸而未中要害，至今未死。在我军英勇攻击下，敌人死伤了一百余人，其余狼狈溃窜，康家山便入我手。此次战斗，我军死连长一人，排长数名，士兵伤亡五六十人，胜利后清扫战场，敌我士兵互相刺入心胸，同归于尽的尸首不下十余具，可见当时肉搏的惨烈了。

二十三号晚上，我军需营长，率领三连弟兄，乘夜色昏黑出击蜘蛛山西南的大洼脑。盘踞在大洼脑的敌人有三百多，也做了



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为我们左侧一大威胁。这一次出击，我们弟兄的攻击精神更旺盛，每一个弟兄都只带手榴弹一种武器，一开始便是肉搏。敌人的密集枪弹，不能阻止我军的前进，手榴弹的火光，闪耀在敌人阵地上。这一战，因为我们进军的神速和巧妙，我们伤亡很少，敌人伤亡的却有一百余名，后来不得不慌张向鱼鳞川（马回岭东）退却，尚有敌尸四五十具临时来不及拖回去，敌中尉队长福岛任太郎也在这一次丧生。大洼脑便被 我 正 式 收 复。

据××师×参谋告诉记者，在庐山脚下作战的他们一师弟兄二十余天来，大小战斗不下二十余次，毙敌约一千余名，生擒敌队长水政政喜一名，列兵大驹次郎一名，击毙敌军官七八名，夺获敌重机关枪二挺，轻机关枪十余挺，步枪二百枝，防毒面具、钢帽、手榴弹、毒气罐以及地图、信件、旗帜等军用品甚多。记者上面所写的，仅仅是关于他们战斗过程中一小部分的报道。

××师在庐山西麓的战斗，得到了最高统帅和高级指挥官的来电嘉奖，并得到一万元以上的奖金。记者在离去该师师部的时候，特别向该师×师长致贺并祝其争取更大的胜利。

庐山脚下的游击战，虽然范围很小，并且还不能配合民众大规模的出击，所以获得战果也不大，可是记者近两月来在赣北各战线奔走，对军事上最感到难过的是我们被动的防御战仍普遍存在，而庐山脚下战士们的出击精神，主动的战斗，使记者非常的兴奋。所以我很希望这种主动的战斗精神能够很快传遍各部队里去。

采取这种主动战略，我们不仅获得了不少的胜利，而且大大地鼓励了全师弟兄的士气。当记者看到该师弟兄那种歼灭敌人的自信心的表现，想想他们所截获的敌军日记中“二天没有饭吃，对战争感到可怕”的记载时，感到这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新华日报》）



金轮峰歼敌记

德星线上苦战一月的××师将士，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毒气袭击下，凭着血肉参加了东孤岭、桃花尖、烂泥塘、甘露寺一带的战斗，牺牲极为壮烈，敌人所遭受的打击也很大。××师将士在公路正面十分不利的地形下，浴血奋战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便奉命以一部分兵力接替南康尖、金轮峰、陈家岭一带阵地，九月二十七日在金轮峰造成一个德星线上空前的大胜。

金轮峰，山如峻壁，极为险要。从鄱阳湖西岸整个战争形势讲，敌人为了要巩固赣北占领区域，并进一步进窥德安，整个的庐山，是敌人势所必取的。因为庐山在我们手里，不仅可以牵制敌人的南犯，而且还威胁到九江、星子等敌人的后方。金轮峰是庐山山脉中的一座山峰，当然为敌所必争。同时，德星路上的战事，自从九月七日敌军以大量毒气炮弹压迫我军退出东孤岭以后，西孤山、烂泥塘一带的战斗，我们是处于劣势地形下，敌人的炮火可以居高临下，发挥最大的威胁。但是在那样不利的条件底下，我们忠勇的将士，顽强坚守不退，争取了许多时间，敌人要占领一个山头一个村落尚必须花大量血的代价。后来我们放弃西孤山，扼守预定的隘口前主阵地，给敌人的进攻，更增加了困难。因此敌人为了突破我们的阵地，侵占隘口，必然要猛攻我隘口阵地的左侧屏峰金轮峰，从左翼迂回隘口之背，使德星线正面我军无法固守。金轮峰必有一场恶战。所以××师的师长，一再



以电话通知防守该处的旅长，应该充分注意和警戒。

敌人进攻金轮峰的主力是布施联队。布施联队的联队长加纳是在淞沪战役时在大场被我军击毙的，继任的联队长饭冢，又在九月初庐山下作战时，被我迫击炮弹击毙，兵员的伤亡更不可胜计；这次奉上级命令担任进攻金轮峰，事先不得不向在江北如皋一带作战的部队调来一批作补充，新任布施联队长在九月十一日方由东京乘飞机到星子就职。而这位走马上任不久的布施联队长，前几天也被我军击伤了。

这一支残破的敌军，从九月二十日起开始了进攻金轮峰的军事行动。白天以一小队为作战单位，匍伏着前进。金轮峰上满布我神出鬼没的守山勇士，他们的行动是万分的困难。他们携带二日的干粮，攀越那峻峭的山峦，晚上露营在树林里，雨露侵袭他们的身体，危险、疲劳、饥饿，加上寒冷。

一天二天过去，敌军一小队一小队被我山上勇士的刺刀手榴弹轻机关枪杀得七零八落。可是日寇大队长川上少佐指挥的一千数百敌军，仍在不准后退的严命下，继续爬山。到了二十六日清晨，有三名敌军已爬至金轮峰宝塔旁边，并且竟欲在塔上升旗。当时被我守军瞥见，即殛以手榴弹，三个狂徒，便成为宝塔下的死鬼。东西孤岭的敌炮兵，见不能占领我宝塔，便以猛烈炮火，将我宝塔全部击毁，这是敌人加紧进攻金轮峰的信号。

聪明而且神勇的×旅长，看清楚了这紧张的形势，当天晚上便派了少数壮士，摸下山去搜索侦察。我们的搜索勇士乘着黑夜摸下山去，在山麓只听见敌人大部队行进的脚步声和枪支的互撞声。我们的勇士判定了敌人今夜必然要大举来攻，便飞也似的回转山峰，将侦察所得报告给旅长。旅长得到了这个报告，顿时紧张起来。坚决的抗战意志，歼敌的无上雄心，使他不肯放松这一聚歼的良机，便部署所部埋伏在三角尖、金轮峰、南康尖等处，静待着敌人的到来。各重要据点，配置轻机枪，构成严密的



交叉火网。

二十七日拂晓，庐山是一片对面看不见人影的大雾。千余敌人，乘着大雾迷离之际，冒险攀登鸡公包凹地。等候已久的我方将士，个个精神百倍，机关枪、步枪、手榴弹，雨点一般向凹地内的敌人扫射。这时候的敌人，方才知已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在那样必死的困境之下，散开蹲伏在岩石树林间，作最后的挣扎。

一场壮烈的血战开始了。一个多月来，在敌人大炮、飞机、毒气摧残下一股无处发洩的怨愤，今天有了发洩的机会，英勇的旅长亲率全部官兵督战，这一战延长到下午二时止，敌人的尸首堆满了山谷，剩下来仍在挣扎的已没有多少了。三点钟左右，敌人增援部队数百人到达，看见当时情势的恶劣，又不顾人道，施放毒气，企图解救危局。可是我忠勇将士决不愿眼看这一场扬眉吐气的战机轻轻失去，重大的战果弃于一旦。官兵上下一致奋战，誓死不退，战况又趋激烈。战至下午六时，卒将敌逐步击溃，造成一个光荣的胜利。计二十七日一天内，击毙敌人几近一千人，俘获敌伤兵十二名，缴获重机关枪四挺，轻机枪九挺，步枪一百七十余枝，布施联队攻略计划二份，地图及大小旗帜、日记等不可胜计，尚有各种纸币二万余元。我方受伤官兵三十九名，阵亡士兵三十五名，受毒官兵均已救护幸而一个没有死亡。

金轮峰的宝塔虽然遭受敌人炮火的浩劫，但是金轮峰乃至整座庐山仍在我勇士固守之下。这是最使敌人坐卧不安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新华日报》）



一年来的新四军

神圣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烽火，卷起了全国抗战的怒潮。全国的武装力量都在一个目标——打倒侵略的日寇底下，走上疆场，为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独立自由，作光荣的奋斗。新四军的前身是散处在江南江北七八省的革命武装，他们是最坚决最英勇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铁军。当前年十月二日，奉到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后，这一群久怀抗敌杀贼志向的健儿，终于得到了献身卫国的机会。

一 新四军的成立

正如上面所说，新四军的前身是散处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区的革命武装，它的改编和集中，都不是很容易的。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开始了改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一个命令之下，虽然各部队很分散，路途也很遥远，但竟迅速地改编完成。

改编完后一月，奉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命令新四军分两地集中，江北的向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集中，江南的向安徽歙县岩寺集中。从二月十日以后，改编了的部队依照指定的地点集中，坚决支队二月十日由所在地向前开，接着团结、英勇二支队也陆续开进，江北的抗战支队也向霍山地区集中。^注这一集中，由于大多数部队相距有二千里的路程，而且大部都是徒步行军，所以直



到四月十日集中完成，由战区司令长官派员到岩寺点验。

四月十五日奉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迅速向前开进，到作战地区进行战斗，并指定任务是在某地区构成游击网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创立游击根据地。

自四月二十八日起，新四军便开始向指定地区与作战地区前进。军司令部也于五月间向泾县云岭移动，光荣而伟大的战斗一天的接近了，杀敌的热血激励着每一个革命战士，新四军便在抗战的过程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二 光荣的战斗

接近了敌人，战斗的任务开始了。江北的抗战支队于五月十六日到达指定作战地区，正是敌人向合肥进攻，企图在巢湖东岸渡过西岸。在蒋家河口上，新四军的一部开始与敌人作第一次战斗，战斗的结果，把巢湖登岸的敌人完全击溃，缴获了许多枪和一面日寇的军旗，这是新四军在江北的第一次胜利。

在江南，六月十八日新四军一部于镇江以南的卫岗地方，开始第一次战斗，截击由镇江南下的军用汽车队。战斗结果，除了一辆敌车逃脱之外，全部都被击毁，并且击毙了日寇土井少佐一名和梅岗武郎大尉一名，缴获了长短枪十余支，七千多元日币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是江南处女战的首次胜利。从此以后，根据战区司令所给予的任务，新四军不断与江南江北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造成了许多光荣的胜利，使江南江北沦陷区内的敌人寝食不安，汉奸伪组织闻风丧胆。

从九月底起，新四军奉命接防友军阵地，开始了担负局部的阵地战任务。以新四军火力的配备来说，完全不具备担负阵地战的条件，但是为了抗战的需要，为了在同一战线上便利友军的作战，有高度政治认识和牺牲精神的新四军，接受了这任务，以一支队的兵力来作阵地战，击溃了向南陵进犯的敌人，保住了南



陵。在红杨树之役，新四军一排人竟击退了敌人数百之众。

三 半年余来作战的成绩

新四军成立虽然已有一年，但是中间经过改编集中和开进，所以在去年一年中，真正参加作战不过只有半年多的历史。在这半年中，新四军全军同志在江南江北敌后坚持斗争，连获胜利的成绩。

第一，在南京、芜湖、镇江一带地区，当新四军未进入以前，汉奸到处活动，维持会遍地皆是，敌人三三两两都可下乡任意奸淫抢劫。新四军开进以后，为了能够有力地直接进攻日寇，为了发动民众抗日，非首先将这些败类清除不可。新四军在战区司令长官命令之下，解除了陈得功、朱永祥等汉奸“游击队”，有的调往后方加以整顿和训练。在新四军开入江南沦陷区以前，没有正规军队在江南作战，新四军解除了这些纪律败坏的“游击队”以后，沦陷区的民众看到真正抗敌的国军已开到他们那里，抗敌情绪日益高涨起来，一切汉奸政权和维持会如风扫落叶般的被肃清了。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广大的乡村中重新插起了国旗，少数的日寇也不敢下乡胡闹了。

第二，五月底徐州失陷，敌人又以全力来进攻武汉，而且采取沿江跃进的战略方针。在这时候，江南区域正是敌人进攻武汉的后方重要支点。新四军为了配合全国军队作战，箝制敌人进攻武汉的兵力，响应保卫武汉的战斗，向京沪铁路的两侧和京芜路进攻敌人。在公路方面，向着京杭国道以及京沪、京杭国道间的地区积极活动。在这中间，如竹子岗战斗，夜袭新站、下蜀、新塘市、东西谢村的战斗，南京麒麟门的战斗，进攻当涂，收复句容城，进攻江宁车站等，这些大小战斗，牵制了大量的敌人，获得了很大胜利，在配合保卫武汉的战役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三，九月以后，因为我游击队不断威胁南京、镇江、芜湖



等敌人据点，阻碍了敌人长江的交通线，所以日寇便抽调大部兵力来打击新四军，展开“扫荡”。九月十日后，敌人开始向镇江与丹阳中间地区溧阳等地分五路进攻。但是结果终被我粉碎了。

第四，从江北江南作战开始，新四军大小打了二百三十四次仗。在这二百三十四次战斗中，江南的占了二百次。缴获了一千五百三十九支步马枪，轻重机关枪三十六挺，驳壳枪四十八支，手枪二十支，日钞两万二千七百余元，击毁敌汽车一百九十五辆，敌人伤亡三千二百余人，俘获六百四十九人，敌我的伤亡对比，为一与四·七之比，即是我方伤亡一人，敌人要伤亡四个半人。从这个统计里，也可以看出游击战争在今天是多么有意义，在抗战中有多么大的作用。

四 江南战局的变化及今后的趋势

江南的敌情，自从新四军进入作战以来，已有变动。在新四军开进以前，敌人以南京为中心，而以芜湖、镇江为两个据点，兵力的配备很少。因为那时候，某些“游击队”专门骚扰老百姓，敌人的后方交通是很安全的，敌人全部兵力不过三联队，每一交通据点，只派一排或一班人守卫。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经常只驻有二个联队，敌以大批兵力向江北进攻徐州、合肥。自新四军开入作战后，敌人兵力增加到二个半到三个师团，还有从东北调来的五千伪军。敌人还更加注意在政治上欺骗民众，挑拨内部团结，制造种种谣言诱惑动摇分子。敌人相当的改变过去烧杀抢劫政策，以图瓦解我军民的团结。最近，敌人积极建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广泛的布置防御网，企图以过去中国内战时碉堡政策的方式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争。在经济上对我实行压迫，一方面对游击区的游击队实行封锁政策，一方面在其它地方大批销售日货，搜刮中国的资源。日寇加紧训练汉奸武装组织伪军以对我进攻，并建立地方伪政权巩固占领区域的统治。所



以今后江南抗战已走上更艰苦更激烈的阶段。

一年以来，新四军在抗战中起了它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它具有优良的传统，它是抗战中优良部队之一。今后为了坚决的坚持在江南抗战，新四军全军将士有战胜敌人克服困难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信心。他们正根据过去半年来的作战教训，对准敌人最近的企图，准备大规模的应战，以求大量歼灭敌人，争取以更大的胜利来回答全国同胞对他们的希望。政府和全国同胞也应该帮助新四军的发展，使它成为更坚强的部队，完成它应完成的任务。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

注 团结、坚决、英勇、抗战支队，即新四军的一、二、三、四支队。——作者注。



江南游击区横断面

由于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二七”这一天开幕，新四军各支队政工人员代表聚集军部参与大会，记者有机会与深入敌后艰苦作战的同志们详谈江南沦陷区的现况。现在将所谈情形写出，以告本报读者。

（一）“梅花桩”赶不走我们的游击战士

挺进溧武路以北，包括句容、镇江、丹阳、金坛、江宁一带地区之新四军团结支队，不断英勇地打击敌伪军后，当地乡村间的维持会以及其它汉奸组织，便如热汤浇雪，很快销声匿迹。敌人为了巩固江南占领区域的统治，便于去年九十月起，开始运用“梅花桩”战术。什么是“梅花桩”呢？便是敌人利用过去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碉堡政策的故伎，在江南平原河流湖沼地带的公路、河流、铁路，以及桥梁等交通要道旁边普遍构筑工事外，其它城镇所在地区也普遍设防。这种防御工事，多得象梅花瓣一样，各个据点内，都增加重兵据守，由五、六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企图围困与分割我游击队。在战略上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攻掠一个目标，往往五路八路同时出动，四面包抄，另外控制千余人作为机动部队，而且多半采取夜间进击，企图一鼓作气把我游击部队完全歼灭。敌人这种战术虽然对我破坏交通上增加了相当的困难，但是同时也牵制了更多的敌军。至于敌军对我的



进攻，靠着我军民关系的密切和部队有长期游击战的经验，只要敌军一出动，我们的游击队便得到翔实的情报，所以很机动，不等敌人到达早已从几路围攻的敌军间隙散开了。一次二次乃至许多次，敌人总是扑空，我们的游击战士始终坚持在敌人的“梅花桩”里活跃着。

针对着日寇这种新的进攻，新四军的领导向全军提出在运动中歼敌的口号。在全新四军指战员的努力之下，新战术的学习，已经得到不少成绩。最近二月七日，团结支队在一次战斗中，击溃了由天王寺来增援的敌军几百人，击毙了敌军四五十名，缴获甚多。这一胜利证明了新四军现已学会了运动中歼敌，“梅花桩”赶不走新四军而且反要成为日寇的坟墓了。

（二）争取“两面派”获得大成功

新四军的项英副军长曾经说过：“江南有七多：麻将多、茶馆多、澡堂多、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两面派多。”什么是“两面派”呢？就是在江南沦陷区里，有一部分人，对日军表示欢迎，对我们部队也表欢迎，往往我军去了，他便将敌军情形告诉我们；等到我们开走敌军来了，同样的欢迎，同样的把国军的消息告诉敌人。可是又派人到我方来申诉不得已的苦衷。

这种“两面派”在江南游击区里特别多的缘故，主要由于江南地方物产丰富，有钱的士绅过惯了安闲生活，他们并不是没有民族意识，可是处在那样敌我尖锐搏斗的环境中，他们舍不得田园财产，为了保护他那财产，便形成了两面接近的“两面派”。

对于这许多的“两面派”，新四军的同志们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反复用文字和口头宣传说明，这种“两面派”的态度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是不允许的。假使全中国的人统统变成“两面派”，那就无法抗战了，并很明确的表示新四军对这些人的态度，一点不放松直接间接派人去对“两面派”的地方士绅做



工作，尽可能用最大的力量把他们争取到抗战的阵营中来。

在正确的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的过程中，遭遇到许多的困难。有的长期受欺侮的地方民众，愤愤不平地说：“这一类大汉奸，不抓来枪毙，反而要同他们客客气气，待如上宾，这是要不得的。”可是新四军的战士排除了一切的阻碍，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日寇“以华制华”的毒策，受到惨重的打击。下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金坛附近的茅山，有一个规模宏大的茅农公司，经理叫做纪振纲。他在南京失守国军后撤时，招集了百余从南京附近退下来的广东战士，连同他本来所有的守备队，共计有二三百人和枪，来保护他的事业。敌人来了，他便成为当地一个最著名的“两面派”。新四军挺进到那边的部队曾一再派人去规劝他，指示他：“在这抗日战争中，应做民族英雄，为民族国家努力，两面应付是不好的。”纪振纲是一个有民族思想的人，当他听到来人的谆谆劝告，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斗争在他的脑中起伏，心灵中掩不住矛盾痛苦的真情：“唉！我这二十年的经营呀！我这四十万的投资啊……总要保存才好！”

然而新四军的耐心争取是成功的。不久以前，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区，强迫这些“两面派”表明态度，不允许他们骑墙观望。十二月初旬，大名鼎鼎的纪振纲被日寇武装捕到金坛去，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向他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表明态度。第一是脱离与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第二委他做镇江、丹阳、句容、金坛、溧水等七县的剿匪司令。第三要他组织伪军，每月可以由日军送他五万块钱。纪振纲在这时候想起了新四军同志一再劝告的话，终于敷衍一番，由大批武装敌军监送回茅农公司。在敌军严密监视下，他决意逃脱这一牢笼。他伪称儿子病重，急须送上海治疗，全家逃往上海。在他举家离开茅农公司前，写了一封很诚挚的信给新四军团结支队的陈毅司令员，说明他决不做汉奸，说明



这一次不得不出走的苦衷，并命百多个广东战士携武器全部开到新四军中，托新四军转送他们回原队伍继续抗战。最后祝望陈司令努力杀敌。他还说自己到了上海以后就回抗战后方为国家服务。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亲友，鼓励他们只有牺牲一切参加抗战。

纪振纲是新生了。新四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胜利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出路——坚决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

（三）在最困难地形下奋斗的一支铁军

我们翻开地图来一看，在南京沿长江至当涂石臼湖、溧水、江宁这一三角洲，四面八方都被大江大湖铁路公路包围着，里面又是河滨交错，我们能够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却破坏不了天然的公路——河流。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地区，新四军坚持与敌人战斗。

敌人最近在这一狭小的三角洲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因此新四军部队四周相距四五里十几里都是敌人。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的环境，新四军驻扎地区经常流动，最多的时候，一个司令部每天要移动一、二十次，而且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部队经常是在晚间移动。在晚上，部队又要移动，又要出动攻击敌人，很少有睡眠时间。晚间借民房住，找柴煮饭都不能点火，都在黑暗里行动、摸索。天没有亮以前，便要在黑暗中将房子扫干净，借物一一奉还然后部队开动，在天亮以前到达另一驻扎地。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不仅指挥员战斗员辛苦万分，勤务炊事同志更是辛苦得很。可是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坚持着，并且不断地获得胜利。

在那一带的敌人，不仅从军事上加紧来压迫新四军，同时用最大的力量从政治上来破坏我军民的团结，妄图使我们的战士不



能在当地立脚。敌人这一政治上的阴谋主要的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向民众故意表示好感，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怀柔政策。例如在敌军决定向某一地前进之前，先派出大批汉奸去向民众宣传不烧不杀，劝老百姓不要跑，“皇军”专打新四军，买卖也公平等等。当敌军到达时，的确也改变一些过去滥烧滥杀的现象，买东西也给钱了。敌人这一阴谋并没有得逞，因为新四军早已把中国持久抗战最后必胜的道理告诉给老百姓了，而且坚决表示新四军誓与江南民众共存亡同生死，使民众树立起对抗战的坚定信心。新四军更及时指出敌人这一种阴谋的毒辣。敌人虽然军纪比从前稍好一些，而打鸡子，要花姑娘仍然是家常便饭，这一种事实，也使得老百姓心里明白敌人究竟还是敌人。再加上新四军铁一般的军纪和不断胜利的鼓舞，老百姓不仅没有被敌人所欺骗，而且增加了抗敌的勇气。往往某一地方发生战斗时，民众一齐将财物整理送往山上，然后各执刀枪前来参加作战，异口同声地表示“来！干鬼子！妈的，我的家也不要了。”

另一方面，敌人企图利用当地普遍发展的“大刀会”，派汉奸向“大刀会”首领表示：“只要不帮助新四军，拥护‘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又说：“你们相信菩萨，‘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一家人。”还有个别的敌人，故意与地方“大刀会”人员结拜兄弟，但是敌人这一阴谋也同样失败了。这失败的原因又得归功于新四军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大刀会”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新四军是一支用最进步科学武装头脑的战士所组成的军队，当然他们是不迷信菩萨的。可是为了争取一切民族的力量到抗战阵营中来，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办法，要求他们多多训练，保卫家乡，一起联合打敌人。新四军还积极的帮助地方政府组织农抗会、工抗会等民众组织，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



战的道路。江宁第三区有一个“大刀会”的首领熊大麻子勾结敌人，秘密准备聚集二千人，响应敌军。可是“大刀会”中就有很积极的农民抗敌会的分子，得到了这一消息，马上告诉新四军。新四军的负责人通知区长，说民众开会是可以的，但在战区内，大的集会要得到政府和驻军的允许，否则发生变故保甲长是要负责任的。保甲长得到区长的通知，马上按户传送这消息，于是父亲阻止儿子参加，妻子规劝丈夫，这样一来，熊大麻子预计可以召集二千人，结果只召集了五六十人，而且这五六十人，大半都是受熊大麻子的骗，等到他们知道了熊大麻子的阴谋骗局，也很快各自回去了，一路说：“新四军不是朱永祥汉奸游击队，我们怎么可以去打他们呢？”后来，熊大麻子派了他的弟弟熊三麻子来谢罪，一场事变，就此终了。

这一支在最困难地形下奋斗着的铁军，成为敌人军事政治各方面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什么缘故呢？唯一的就是他们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保障了军事。当地的民众以“岳家军”、“薛仁贵”，来天真纯挚地赞美着他们，鼓励着他们。

（四）“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

在今天的江南游击区里，敌军不仅企图以军事力量将我游击队驱逐出境，主要的还着重于政治上的分化和宣传欺骗。在这一方面，敌人是相当巧妙的。

记者最近获得许多敌人宣传品，图书文字都非常悦目通顺，显然已与战争开始时一看便知道是日本人杜撰的完全不同了。而且宣传抓住中心，文字浅明短简。比如像长沙大火，敌人在一张小小的传单上，画出长沙大火的情景，下面的文字，除了对我政府军队尽量诬蔑外，并引用汪逆精卫攻击焦土抗战的文字，藉图使我民众对政府发生恶感。

此外，象武汉、广州失守时，敌人便以大量宣传品来散布，不



是说中国军队完全打溃了，就是说我们军事当局逃亡了。诸如此等不一而足。特别对江南民众，更提出要和平，说什么破坏和平和安居乐业的是游击队，把游击队画成一个抢劫民财的土匪。除了这种宣传之外，在敌军队中相当的约束烧杀行为，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我们不能断定完全没有发生作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有人说，现在好了，正规军不烧不杀，日本军也不烧不杀，今后可以太平了。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在日寇不烧不杀的宣传下开始动摇，但不敢相信，因此当敌军下乡，便将家财细软包好，放在田地里，自己躲到僻静处看，日寇究竟是否如宣传所说不骚扰等等。

上述的现象，在今天新四军所在的游击区里，固然是极少数，但是在我游击队兵力不及的地方，难免一般豪绅受敌宣传开始动摇。新四军就是针对这类情况不断开展政治工作。

当去年夏季初新四军挺进至江南的时候，正值我南京保卫战之后，大批国军向西撤退，半年没有正规国军在江南作战，当时民众对抗敌胜利信心是相当薄弱的。新四军一去，民众一般的心理是这样：新四军的军纪固然是好，但是枪械不精良，人数也不多，象过去那样多的正规军，有那样好的武装，都要退却，新四军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江南民众的这种心理，在去年几个月的战斗中，一般是克服了。新四军不断地袭击敌人获得胜利，民众抗战情绪提高了，民众的抗敌组织也很快的发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仍在那里害怕：现在组织抗敌团体，帮助军队赶鬼子，这当然是好的。可是将来要是新四军又开走了，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新四军针对这种动摇心理，广泛宣传抗战到底，愿与江南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这部分人的恐惧开始消失。

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悲观，心里想，游击战固然能打胜仗，但驱逐不了鬼子，收不回南京、镇江这种大都市，因此又感到抗



战前途的暗淡。对于这种心理，新四军更以最大的努力向民众广泛宣传解释：“中国的抗战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达到最后反攻，驱逐敌人出中国。我们是持久战，持久战最后是必胜的。”江南的民众，自政府军队相继西移后，久已陷入对抗战国策糊涂不清的状态，经过这种持久战的宣传教育，大部分民众已经了解持久战的意义和抗战胜利必经的阶段。

不断的宣传教育，不断的帮助组织民众，使敌人的政治进攻和宣传伎俩惨败了，民众还是我们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新四军的这种胜利是靠着部队的高度政治认识和铁的纪律，才能取得江南千万民众的爱戴，没有这，宣传只是一句空话。

（五）在铁蹄下的江南同胞

“泥脚”的敌人榨干了日本国内劳苦大众的鲜血，还不能使中国屈服。长期的战争，使它转到向我们的同胞身上来榨取，以支持他残暴的侵略。江南游击区里，敌人正在一部分（城市附近）地区开始实行搜刮。

大家都知道，江南是米丝棉出产最多的沃野。敌人近来一方面指使伪政权“维新政府”严令农民大量种棉养蚕，另一方面大量收买粮食。为了破坏我法币，伪“维新政府”最近散发许多流通券，日寇的军用票也强迫使用。大事收集我国法币，以图破坏我法币对外信用。更以大量毒物运入内地，麻醉民众。

以上仅是农产和货币方面的一些情况，此外苛捐杂税，名目更是繁多。象田赋，伪政权已开始征收，“良民证”、“通行证”、“安居证”，每种二毛三毛钱一张不等。汉奸利用这个机会，更大事渔利。往往一张“良民证”，敌人要二毛钱，一经过汉奸之手，便要向民众要四毛五毛钱了。

敌人为了巩固他在占领区域的统治，就利用大批的土匪，整个江南因此土匪如毛，民众被骚扰得无以活命。同时敌人更唆使



伪政权普遍滥招土匪组织编成所谓绥靖队，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只要有他们驻扎的地方，滥收捐税，挑一担子便要一角，摆一小摊，便要五角，开一小铺，便是一元，而且收捐无定期、无次数限制。

最使江南民众恐惧的便是敌人的抽壮丁了。为了实行“以华制华”的毒计，敌人最近在他兵力所及的游击区里，利用我国原有保甲组织，按保分配每保必须选壮丁三人、挑夫一名，若不照办，全保男女老幼，都要杀尽。因此，在江南的新四军时常有人自愿请求入伍的。有一次一个老太婆怕儿子被敌人抽到南京去训练，亲自送到新四军某团部来，坚决要求让她儿子入伍。老太婆说：“新四军规矩好，当兵像进学校，我是很放心的。”由此可见民众对敌人抽丁的态度了。

江南千百万民众就在这样血腥的魔手下挣扎着，奋斗着，期待着国旗重新插遍江南的一天。

（六）从敌人信件、日记中所看见的江南敌情

据新四军敌军工作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前方搜集到的三百二十封信和一百六十封明信片，证明了：第一是游击战已给予敌人很重的打击。在敌人信件中，前方写给后方去的部分，有四十封以上提到我游击战厉害的，讲到游击队对公路铁道交通的破坏和袭击，居住行军都遭受打击，在信中流露出困难危险和没有办法对付，表现悲观绝望。有些敌人的日记甚至说游击队可怕。不仅如此，敌人的后方也传染上这种恐惧心理了。日本女人写给丈夫的信中，几乎都有因为中国游击队厉害，因而关心丈夫安宁的文字。

第二是敌充分表现出厌战思归，怕死和不平不满的心理。在敌军信件中，这一类记载特别多，有二本敌军日记，一本天天记着梦里回到了家乡，另一本天天记着想回家，又怕回国后会失



业。据俘虏后藤说，他那一排人连排长都常常说想回国。正由于这种厌战思归心理，所以后藤和三谷两个俘虏都是被我喊口号感动而缴械的。日军中信件检查甚严，每封都有“检查讫”字样。信中反映打骂很多。

第三是敌军伤亡疾病极众，有一封信中说，他们那一连第一次补充的共有两百多人，到他写信时，只剩有三十二人。说到疾病更是普遍，有的一连病倒一半，更有全连都病倒的，所病大都是痢疾，因而竟怀疑我在水中放毒。

第四是敌人后方困难万状。据后方（本国）来信，有的说物价贵到三四倍以上，木材煤炭金属汽油之类既贵也不容易买到。汽车也缺乏，乡下稍微新一点的汽车都被征调作军用了。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还要为他们“出征”的儿子或丈夫寄钱。在缴获的信件中，内附五块钱一张老头票的有好几封。

第五是敌人已经知道新四军，并且知道新四军的历史，也知道新四军优待俘虏，只是不敢十分相信而已。

缴获的敌军信件日记告诉我们，扩大游击战争，扩大对敌军工作，是何等的紧迫而重要啊！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新华日报》）



在新四军与四个俘虏的谈话

在 敌 工 部

在我们这次进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敌军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一到新四军，碰巧有二个俘虏从前方送来。记得那还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新四军服务团开了一个欢迎晚会，那二位新来的日本弟兄还唱了在路上学会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很愉快地对新四军前后方同志给予他们的优待表示感谢。当时我深深为这一真挚的国际友爱的精神所感动，而产生了对新四军敌军工作研究的兴趣。

在新四军军部住久了，每天看见几个日本俘虏毫无拘束地自由行动。卖香烟糖果的小铺子里也时常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许多人看见了都相互笑着招呼一声，小鬼们爱玩，更时常同那俘虏打着玩。这一些，在旁的地方是不容易看到的。

正是阴历的年节，乡下的老百姓正高高兴兴地过节，前方又解来一个俘虏。他叫山本俊一。旧历除夕几千人的晚会上（这晚会是欢迎红十字会医疗队和欢送政治工作会议前方代表和日本友人），他在黑暗的戏台上唱起高亢而苍凉的日本歌，打动了人们的心弦。这是一个好机会，在军部除了已送两名战俘到战区司令部外，还留有四位日本兄弟，我应该去访问他们。



二月廿日的下午，我跑到新四军敌工部拜访部长林植夫同志。在一个小厢房里，会见了四个日本俘虏，他们正围着火炉纵情地谈笑。房子里添加了林部长和几位敌工部的工作同志和我，破坏了他们欢笑的气氛。林部长代我向四位朋友介绍来意，四个日本战俘，停止了他们的谈笑，准备回答我对他们的问话。当话匣子一打开，这比较沉静的空气，马上就恢复轻松愉快和热闹了。

介绍四个日本朋友

坐在床上的是新近刚来的山本俊一君。他今年三十岁，是一个泥水匠，京都人，从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十五岁起就过着学徒的生活了。生活的重压，折磨着他的身心，家庭是一幅悲惨的图画：父母死了，妻子在他去年被征来华以后，在艰苦的生活折磨下，抛下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病死了。正因为这种最悲痛的生活的袭击，再加上这一次被俘，他的身上和面部的表情，透现着凄凉。昨天晚上沉重而苍凉的歌声，真是他心灵深处所埋藏着的哀歌啊！他是一个日军大队的饲马员，二月十二日在铜陵被新四军战士所俘。

田畑戈是一个在台湾海岸打鱼的渔夫，今年二十七岁，未婚，鹿儿岛人。贫困使他没有就学的机会，家里还有一个劳动的哥哥和两个弱小的妹妹，母亲尚在。在他没有出征以前，由于他打渔，家庭还可以勉强支持，自从他那渔船被征军用以后，他就跟船运军米到中国来了。讲起家庭的生活，他只有摇头叹息。田畑在去年八月当涂境内被俘，解到军部后，生了很重的脚气病和发热，敌工部的同志象战友一样殷切地为他治疗，所以不很久，他的病全部好了。他具有劳动者的忠诚和纯挚，在病中，受到这意料之外的爱护和治疗，他说不出感谢。

最聪明进步的是后藤勇，他是四国德岛县人，今年二十五



岁，家庭生活也很清苦。父母俱亡，没有结婚，在伯父帮助下，曾在农业中学读过二年书，后来在大坂一家饭店里当厨师。去年六月被征来华，是敌十一师团的一个一等步兵，十二月初在丹阳附近碰到我们新四军的游击战士，我方呼喊的日语口号感动了他，使他自愿地弃械归顺。他从前方到军部的途中，跟我们护送的战士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现在他会讲几句中国话了。

在四个俘虏中，年龄最轻的是香河正勇，今年二十三岁，样子活象一个中学生，青年的活泼精神充满了他的一身。他是四国人，家有父母兄妹，受过中等教育，去年七月在镇江金坛间被俘，那时他当敌第三师团的二等辎重兵。在他们四个人中间，他要算到军部最早的一个了。中国话也会说几句，据他说，会开汽车，而且脚踏车骑得最好，他说明年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他还想参加脚踏车竞赛呢！正由于他的天真，新四军的小战士们最好和他玩。

对战争的痛恨和怀疑

在我询问他们关于中日战争的感想时，他们的回答是这样：

打鱼的田畑说：我的船被政府征去以后，叫我们运米到中国来，大家都想，二三月便可回国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过要来打仗。

香河说：被征来华时，受着当兵是国民的义务的宣传，说要到中国来打共产党。一来到中国，才知道是军阀的欺骗，战争使家庭离散，我领悟了战争是军阀资本家升官发财的工具，与我们是毫无相干的。

后藤说：他们一排人对战争都是厌恶的，到中国来究竟为什么打仗，毫无所知。他说日本兵士都是受军阀的虚伪宣传和反动教育欺骗下来华的，倘若他们知道了战争的意义时，谁都不愿意打仗。



山本说：我来是跟大队长饲马，不知道战争还在继续着。

中日战争的结局最终是怎样呢？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他们一致感觉是日本不会取得胜利。

据山本说，战争的支持，在日本是不容易的。到中国来以后，看到中国国土这样广大，人口这样众多，物产这样富饶，更感到战争胜利的渺茫了。后藤等人的意见是：日本今天还是强，但是要打三四年，日本的力量是支持不下去的，它会变弱。速战速决对日本是最有利的。战事一延长，中国这样大的领土，能够占领一大部分也守不住，在中国游击队活动下，日本要想以掠夺占领区的物产来支持对华战争也很困难。

对战争的厌恶，对战争将来信心的动摇，这恐怕已成为日军普遍的现象了。他们四个人的话，反映出大部分日本军士的心理。

侵略战争害了日本人民

据刚来的俘虏山本讲，国内来信说，物价普遍飞涨，最起码要比战前高出二倍。他担忧他那孤儿寡女，不知怎样挨得过日子。他还说，象军用的白手套，从前只卖五六分钱一双，现在贵到四五角钱一双了。

征兵更是一个使日本人民颤栗的魔鬼。据他们四个人所说，征兵已征到四十岁以上的人身上去了。只要儿子或丈夫一出征，家庭的生活便象空中的浮丝，毫无保障。

军人的生活也是困难万分，平常一二等兵每月薪饷是五元五角，出征虽然加到八元八角，但是八元八角钱够什么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士兵写信到本国去，要可怜的老家寄钱来用。战争的残酷和遥无止期，家庭生活的艰难，个人生活的痛苦，这一切使日本士兵产生了浓厚的厌战反战情绪。



他们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后藤很亲切地告诉我：日本士兵，十个中间有七八个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却一向轻视中国兵的无知识。他到新四军后，看见这里官兵都有教育，真是出人意外。对官兵的平等精神和这样对待俘虏，感到说不出的佩服，认为在日本军中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他还说，不仅军队对他们很好，老百姓们对他们也很和气，虽然口里有时叫“日本鬼子”，但是实际上是同亲兄弟一般看待他们的。他听说八路军很好，可是没有看到过。

田畑也表示新四军对“敌人”这种亲切的态度，是日本军队所做不到的。香河、山本都点头表示同意田畑的话。可是只有香河这一小资产阶级出身，带着顽皮孩子气的人，表示新四军中有女人当兵，女人的劳动太厉害，他觉得不应该。他的话引起了满场的笑声。但是当我们反问他日本的贫困阶级的女人，不是天天为生活而劳动着吗？他没有话可以回答，一笑完了。

据林部长告诉我，他曾将××的和平村讲给他们听，他们首先问那边是否行动自由？林部长真实地告诉他们，那边也很优待你们，生活很好，只是行动恐怕不能象在这里那样自由。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希望长住在新四军，我们不愿到和平村去。

自由终究是最可贵的，但是谁使他们失去了自由的呢？！在新四军生活了短短一段时间后，由于对他们的教育，他们很清楚地认识了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阀。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踊跃地自愿写告日本士兵书，劝他们与中国军队携手，打倒共同的敌人。

在结尾，我请他们为《新华日报》题词，他们终于接受了请求。顽皮的香河还对我说：“有没有稿费？”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四日《新华日报》）



陈毅将军访问记

一、新四军怎样进入苏南的？

是一个春雨如丝的上半，我们二三个人围着一盆炉火。在一间幽明的小屋子里，陈毅将军安详地同我们开始了谈话：

南京、镇江、金坛、溧水等地区，是在茅山山脉周围的一个平原，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便捷的交通，它是敌人沿长江西进的后方最主要的战略据点。所以摆在坚持敌后打击日寇的新四军战士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苏南这块狭长的地区，北面是滚滚的长江，限制着我们向北活动，除了饮马长江之外，对游击战争是一大障碍。京沪铁路与长江平行，更缩小了我北面活动的地区。在东西南三面，四个大湖，运河、小湖泊、公路网，交织如蛛网，每一条小河浜都可以通上海。在这样一个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带，又加上这是敌人咽喉，因此成为两军势必争夺的所在。客观环境如此困难，但是我们勇敢地担任了这一神圣的任务。

陈毅将军以强有力的词句这样说：“一般人认为游击战争是不能在这困难地区进行的，但我们不同意，我们要反对这种地形拜物教的观点。我们始终认为：游击战主要条件是人力，地形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是其次的，人力可以战胜地形条件的不利。而且江南虽然地形条件困难，但是日寇的滥烧滥杀已激起了千万



大众的仇恨，南京撤退时散布在乡村中××万支长短枪，更给我们很多战斗武器。日寇侵略我们，我们有人山人海来作保障，使敌人如陷孤岛。这人山人海，便是战胜敌人的基础。”

新四军团结支队初到苏南地区时，有的人看不起他们：“上十万的大军都要撤退，靠你们少数的人枪有什么用？”还有比较忠厚老成的人告诉陈毅将军说：“陈司令，你的司令部只有七支枪，怎样能够抗日呢？日寇一包围来，你们是逃不掉的。我劝你们改换服装，穿便衣吧！”但是我们堂堂的国家正规军，怎能脱下军装改换便衣？尤其在苏南一般民众抗敌情绪比较消沉时，我们更不能够穿便衣。我们谢绝了老百姓的劝告，就在这样情况下，开始了我们的战斗。

二、我们是怎样战斗着的？

抽完了一支烟，沉默了一会，陈毅将军继续讲下去：

我们初进入这样一个困难的地区作战，主观的力量又是这样的贫弱，但是我们全支队指战员抗战的情绪和信心都是非常高涨和坚定的，没有一个被这当前的困难所压倒。我当时首先指出，一切当前的困难，都可以由战争的胜利来解决，而且也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解决。我们武器不够，但是可以通过战争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我们人力物力困难，但是战争的胜利，可以提高人民抗战信心，他们就会踊跃参战和慰劳援助我们。所以，我当时提出以战争的不断胜利来配合全国战局，特别提出在江南创造一模范抗敌根据地的任务。

自去年六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这两个月中，我们与敌作战三十余次，捷报如雪片一样飞来。从此以后，敌人不敢轻易下乡了，保持了苏南一片干净土地。在这几个月中间比较大的战斗有：

第一是新丰车站的夜袭，把六十八个鬼子兵全部烧死在车站



内，缴获了二十余枝枪。这一次战斗震动了苏南，民众对新四军的信仰，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都提高了。

第二是去年“八一三”攻入句容城。城内的二百余名敌军在城门口就被我击毙三十余，城内伪维持会完全烧毁，烧死汉奸武装和日寇很多，残部狼狈逃出。这一次战斗后，句容城的居民纷纷迁往乡下，感觉到城内不安全了。

第三次战斗是在高资车站。有七十余名伪军和五十余名日寇同住街上，我们以迅速袭击，将伪军全部歼灭，日寇死伤很多。自此以后，周围二十里内敌军都逃往南京，汉奸部队大大动摇，日寇组织伪军利用伪军遭到很大打击。

第四次与×××军一部配合，在丹阳珥陵消灭下乡敌军一连人。从此以后，不仅敌军二三人不敢轻易下乡，就是比较大的队伍，亦不敢轻易下乡了。

第五是动员了十七万民众，在很短期间把镇江到句容，丹阳到句容，金坛到丹阳，镇江到江阴的四条公路彻底破坏了，使敌人仅仅能够保持京沪铁道和溧武公路而已。

敌人在屡次遭我痛击之后，便在去年九月以后改变了战略，采取了封锁战术：（一）积极修复公路，并且为保护公路每隔二里就在公路桥梁旁都造好据点。由南京到武进这样长的路程，敌人不惜工本，到处构筑据点，使我破坏交通发生困难，往来游击遭到妨害。（二）是积极修筑新公路，象棋盘格子一样，将地区划分为几小块，以谋缩小我活动地盘。（三）在每一小棋盘格中，又布置梅花点般的小据点，用少数兵力靠坚固工事固守，使我活动更加困难。（四）最后便是敌预先布置机动兵力，一发现我军，便疾驰包抄。

这是敌人新的军事进攻，虽然增加我游击战的困难，然而敌人决不能将我赶走。陈毅将军以辩证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

“敌人虽然把我们的弱点看清楚了，用这种办法来打击我们，但



是他要乘我们的弱点，消灭我的长处，而他自己又暴露了新的弱点。第一，敌据点星罗棋布，把集中的兵力分散了。在战略上讲是挨打战术，而且兵力分散，一切运送子弹给养交通都感不便；第二，少数敌兵固守据点，他是外来民族，不能不与我民众发生关系，因此我又可乘机袭击他。

“由于这二个弱点的暴露，从九月以后，我经常地乘敌不备消灭他守备比较疏忽的盘据点。时常袭击他运输子弹给养的队伍，经常出其不意刺死敌人酋长。敌人已感到，现在用‘梅花桩’式的据点不能战胜我们了。

“今年二月初东湾的伟大战斗，我毙敌八十余人，攻入敌据点，并且击溃了三百余增援的敌军，这是我们给敌人‘梅花桩’式战术的最有力的答复。经我全支队同志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已战胜了敌人新的军事进攻了。”

陈毅将军最后指出：“今后敌人的企图，将可能以更大的兵力来‘扫荡’我军，而把许多小据点放弃，改守大据点。但是这是敌人快要打出的最后一张牌了。”

三、我们怎样粉碎日寇的政治进攻？

日寇竭力鼓动民众反对游击队，对苏南老百姓说：“游击队是土匪，专门与老百姓作对。他们不是抗日的，如果他们真抗日，他们若有真本领，可以到九江到徐州去打（当时徐州、九江未失陷），假如他们能把我们‘皇军’主力打败，我们自然会退，何必到后方来捣乱。”新四军一开到，敌人更竭力宣传说什么共产军要赤化苏南，想借此动摇上层分子，但是新四军战争的胜利，纪律的严明，粉碎了敌寇的反宣传。日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说：“新四军现在对你们好，可是将来是靠不住的。”

团结支队一开入苏南，首先以很大的注意力来运用统一战线，调解地方内部的内讧。陈毅将军告诉记者：当他驻扎某地



时，一个绅士来看他，正谈着话，一个参谋跑进来，私下告诉他：“与这位绅士同村的另一绅士，已组织一批人要杀这个绅士了。”他听了很惊奇，马上差人去把那位绅士请来，问他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那位绅士承认是要杀那绅士，说那绅士是汉奸。陈毅将军当面指出这种举动的不对，晓以大义，使两人杯酒言和，结果那两位绅士都感动了，安然回去。象这种事实是很多的。团结支队一到苏南，许多地方的绅士想利用军事力量来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多方包围，请客，到处送来互相攻击，互指汉奸的函件，请军队惩办，更有暗示可以奉送金钱的。在这复杂的情形下，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内部斗争，而且是日寇的一种阴谋诡计所造成的现象，所以各方调解，决不偏袒。由于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地方民众的团结一天天巩固起来了。

新四军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帮助地方游击队整顿训练，帮助枪枝，不干涉他们的用人行政，不把他们改编为正式军队，保留地方性。由于这一正确的策略的运用，地方游击队已有很大成绩。象丹阳地方的游击队，已有独立与日寇作战三十次以上的成绩了。

汉奸和两面派开始动摇，而且有的已帮助我抗战了。各地的汉奸，因为新四军的坚持抗战，开始动摇，金坛、溧水等城里的大汉奸，时常有派人送些情报来的情形。江南最多两面派，这种人为了保持生命财产而对敌敷衍。他们流行着这样的口头语：“明保曹操，暗保刘备”哩！“身在日本，心在中国”哩！“大丈夫能屈能伸”哩！等等。这种人并非死心塌地要做汉奸，对这种人的争取也有成绩了，民众组织也发展了。

苏南地方行政组织象保甲、乡、镇、区、会所县政府，渐都恢复了。敌人的经济掠夺受到打击。现在广大的苏南乡村，不仅敌人不能抽壮丁，而且也不能收田赋。一般人民的抗日情绪提高了，敌人不但没能在政治上分化我们，我们却更团结更进步了。



这完全是由于战士的英勇，革命军队纪律的优良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力量。

四、克服困难的道路

我们坚持在苏南顽强战斗是有些成绩的，但是这成绩还不太大，还要创造更大的成绩。我们的面前也存在着许多创造更大胜利的困难。

陈将军以坚决的语气说，在这敌人将施用大量兵力来“扫荡”我们的时候，我认为是有办法克服这许多困难，而且战胜敌人新的进攻的。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指出，今天困难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即是健全游击区的行政机构问题。这个问题能解决，我可以大胆地肯定说，在第二阶段战争中，我们可以使敌人放弃一切乡村、小城市，退守铁路线和大城市，造成真正相持的局面。

五、一个重要的意见

我们被陈将军的话震动了，所以特别提出游击区行政机构这个问题，请他作比较详细的解说，并请他根据实际情形，发表意见。陈将军也不厌谈话时间的过长，继续侃侃谈下去。

“在今天来说，游击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的作用只是使用力量，消耗力量；民众则是担负着供给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池。怎样来准备乃至充实这力量以供运用？这任务落在行政机构身上，所以行政机构是一个枢纽。

“我们不可否认，今天整个江南游击队作战是有成绩的，民众是奋起了，但是行政机构表现得还是非常无力。如战区中组织壮丁武装民众，优待出征战士家属，侦察汉奸，援助军队作战，这一切做到的成绩还是很少。主要的原因在于今天游击区的行政机构还是抗战以前的老作风。在平时，弊病还可马虎过去，但在



战时，就不行了。为了适应战争紧迫的要求，任何一件事的决定和实行，都需要当机立断，假若还是老文章在敌人后方送到数千里路外去等待上级政府批准，则已失掉时效，而且远处敌后的上级对当地情形，也不能十分清楚。所以，游击区的行政今天特别需要独立性，创造性，在最高国策原则下，发挥这种机构的长处。可是今天是缺乏的，正因为这样，许多重要的有关军事的行政，地方政府都谄为无上峰命令轻轻搁置了。

“今天的游击区，需要新的适合战争客观需要的施政纲领，需要健全行政机构，需要党政军民协同的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动员组织，更需要有新的财政经济政策，这是保证游击战更大胜利的基本条件。”

差不多三小时的谈话，至此结束了。陈将军最后很谦虚地说：“半年多来的战斗，我们总算在敌人种种进攻下尝到了各种的考验。我们一个支队虽然仅仅获得击毙敌人二千余，缴枪二、三千支的很小成绩，但是我们总算试验成功，我们没有被敌人赶出苏南，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国人的。倘若今天有人以我们不能打一个象台儿庄一样的胜仗来责备我们，这是过分的，他没有认识我们今天坚持江南战争政治上的意义。”话说到这里又转回来，他说：“倘若政治能进一步与军事打成一片，我们想那时候‘关门捉鬼’并非难事。”

在感动和愉快的心情中，记者告别了这位精明强悍的江南卫星。一个豪爽英武健谈的影子，长期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五——六日《新华日报》）

注：团结支队，即是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同志是司令员。

——作者



越过江南敌人封锁线

在夏溪镇

记者为了深入敌后，作一番比较切实的观察，决定从湟里北行，经夏溪镇穿越溧武路再越运河京沪路，到敌人封锁区内作一考察。二十日经湟里出发，步行二十里即至夏溪，再前行十八里便达公路了。夏溪虽时有敌人前来，但市面繁盛，状甚安乐，到此已入丹阳境。遇公路北地区丹阳地方游击队副司令陈先生，他也于今午要穿公路回去，喜得同伴，放心不少。陈先生坚留我等在夏溪吃中饭。在一饭馆中，两块钱的和菜我们五六个人都吃不完，鸡、鱼、肉样样具备，想起后方生活程度之高，看此价廉物美的菜肴，惊奇之至。

大概是陈先生是司令的关系吧，地方上的上层分子，一个个上楼来作陪。江南人的客气，真使记者感到难以应酬，一个人走了进来，首先便是拿出一盒美丽牌烟，不管你吃不吃，也不管你手里是否正拿着烟卷，总是每人面前放下二支，然后拿起茶壶到每人茶杯里斟上一些，如此才坐下说些今天天气之类。片刻第二个人跑进来又是这么一套，第三个第四个，没有多少时候记者面前的台面上已放下近十支的烟卷了。

据陪客的本地绅士说，在这里有个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米价大涨。过去五六块钱一担，现在已涨到十多块钱一担，现在还是



春季已经如此，再过几月到青黄不接时期，将要发生意料不到的严重现象。所以会在这著名产米地带闹成如此严重现象，一方面是敌人的大量收买，另一方面则是禁粮出口已成弃髦，地方有力者只要有钱可拿，随便多少粮食都可自由出口，政府禁令虽然很好，但在这一带恰成为有力者发财机会。言下颇表失望。

穿过溧武路

在夏溪吃完中饭，找好挑夫，记者与三位武装同志偕同陈先生等向北出发。行十六里至东港村，此地距公路线黄塘敌据点仅一二里许，因天色尚早，我等决定在东港暂留，待天色将晚时出发。当记者等四个穿军衣同伴走进东港村时，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误为敌军下乡肆虐，相率离屋逃避，及近方知是国军，始陆续归来。记者等在一停止营业的悦来茶店小憩，村民围观者极众，问询之下，方知在此带公路线附近，敌军不时下乡搜鸡，村民每见敌寇前来，相率躲避，直到敌寇去后方敢归来。长受敌人祸害，见我等抗日军人，自表十分亲爱。

天色将晚，陈先生嘱我等动身，并在东港请一向导。记者等一行六七人，在薄暮时穿过许多阡陌，村庄犬吠声四起，陈先生不时遥指前面对我等说，那庙即是敌据点。行二里许达公路，平坦的公路横在眼前，四望并无敌踪，只沿路架有敌军军用电话线。记者偕同行诸伴在公路上稍停片刻，闻隐约有汽车声，即穿越而过，复前行二里许，到张堰镇吃晚饭。至此已踏入敌封锁圈内了。

昏黑中到张堰，幸陈先生为本地游击队领袖，故一到即导至保长家稍坐。时保长与几青年正在传阅新四军挺进支队的二件油印命令，是关于保障救亡工作青年安全的，阅后即以火焚毁，使我忆起秘密工作环境的情景。据保长说，此镇因近公路，敌军时来，多数拿老头票或军用票来饮酒购物，村民在彼淫威下，不敢



不予使用，但伪币以及敌军用票之类，我民众间无一人使用，敌亦无可奈何。晚饭后动身，行十余里，晚宿大华村，大家和衣睡在稻草上。

导墅桥的半日

昨夜至大华，因我游击部队经常流动，陈先生遍找新四军与彼所统率之地方游击队，都没有找到。又闻奔牛吕城一带，今日开到敌军近千人，恐有大举下乡搜乡的可能。我等好象海中孤舟，模糊不清，一切皆象寄托在陈先生身上。假使没有陈先生，我们四个穿军服的人黑夜在敌封锁圈内跑是很困难的。今晨起来，悉此地游击队姜司令正在导墅桥，我等即随陈先生往访（陈是姜部副司令）。大华至导墅桥仅五六里，江南人口稠密，村落甚多，所过村庄居民见有穿军衣者过，相率出门观望，连野犬看见，也狂吠我等不止。度此情形，谅系在敌封锁圈内，我游击队作战经常昼伏夜出，居民不易看见我军白天行走的缘故。到导墅桥镇边，见二公路路基已修竣，惟路面桥梁皆未动工。此乃敌人欲贯通京沪铁路与溧武公路的交通线，在军事上等于一种棋盘战术，藉公路行军的方便，硬将我游击区域划成几小块，以利他的进攻。并且每一公路路旁挖有一深沟，江南道路尽是田塍小路，不仅难走，而且容易走错。所以敌军每次到导墅桥皆沿公路而来，每一遇警即躲入路旁深沟内，据沟顽抗，用意固极阴险。

据陈先生告诉记者，敌人筑路极迅速，原因是每一路线确定沿线两边五里以内，所有村庄农民都须一律前来义务作工，否则以烧杀相威胁。人民惧敌烧杀，只得前往筑路。敌据导墅桥二月，旋即退去，但敌去数月，而此未修成的公路仍未丝毫加以破坏，记者特将此事询问陈先生，“为什么我们不趁机将它破坏，免资敌用？”陈喟然作叹，语记者，“自国军西撤，丹阳久无县政府，人民既无领导，缺组织，近来省府虽派有县长，但偏住夏溪



惶里，与此地等于无关；敌寇可以威胁民众筑路，而我等实无法动员民众破坏公路。”陈先生此语，更使记者感到加强游击区行政机构与组织民众之重要，以及军政统一运用的必要了。

到导墅桥晤见姜司令，彼乃农民出身，现有部队××人，曾几次配合新四军作战，颇有成绩。近来更因部队请新四军派人训练，战斗能力也有提高。一般人民对他们感情还好。据姜司令语记者，目前游击队最大困难是经济问题。彼等过去饷给，全靠铁路以南溧武路以北以导墅桥为中心的丹阳地区之田亩捐，每亩一角五分，半年一期，但因导墅桥几度被敌侵入，影响原来预定的税收，再加最近新县长就任，虽未见北来，可是根据省令游击区免田赋的规定，严禁游击队征税，前途更感困难了。记者认为对于这种纪律较好而且有抗敌成绩的地方游击队，政府应该予以帮助和发挥其作用。

在姜司令处吃完午饭，即准备北行，记者的目的地是要到铁路以北的访仙桥孟河一带去访问。同行的三个伙伴是要到那边去工作的，姜司令特地派二个带武装的便衣侦察员给我们带路，护送过运河铁路。找好挑夫，我们便告辞了姜、陈两司令出发了。

黑夜越过运河铁路

由导墅桥出发，至距运河二里许的一个小村中休息，因运河北岸敌军放哨甚严，我等决定在此小村中吃晚饭，待天色昏黑敌寇躲入据点内时过运河，越铁路，渡过这二道封锁线，便平安无事了。同行的新四军三个同志，负有押解军用品到铁路以北部队中去的任务，所以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又在此小村中请了三个伙子挑担，民众爱国情绪甚高，对挑担慨然允诺，毫无惊惧之色。

同行护送我们的二位青年侦察员，都很有趣。黄昏时从小村出发，我等为了提防意外，皆荷枪实弹穿田蹊路向运河渡口前去，村庄内的人民一齐送出村外，好象我们是在完成一种艰重的



任务。行二里到运河渡口，见对岸临河小镇已露出灯光，岸边适有一渡船，我等一行八九人匆匆渡过，至村庄即有数人与两便衣侦察员低声私语，谅系侦察员去打听运河北岸与铁路线敌人行动。在那小镇中，白天时常有敌军据守到下午五时撤回。

我们在小镇没有多久的停留，便继续前进，天色黑得只有疏疏落落几颗星星，田塍路是分外的难走。由运河到铁路线，相距有三里路，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区域，倘若在这里给敌人发觉，后有大河，前有铁路线上密密的据点，要想飞渡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二个侦察员在先，三个挑夫在中间，我们四个穿军服的人断后，各有二丈的间隔，大家凝神静气，放开脚步前进。两旁村庄中的家犬，好象特别要同我们为难似的，到处发出狂吠声。靠近沿铁路线的那高大的水泥电杆，密密的电线挂在上面，一阵阵风吹过，呼呼作响。再前行数步，眼底下呈现出整齐的路轨，啊！这就是阔别将近二年的京沪路了，我这时心里不知怎的，特别对它发生爱恋，我真想躺在它的枕木上睡一个痛快。然而我恋恋不舍地匆匆穿过去了，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

到访仙桥的途中

穿过了二道封锁线，同行的几个挑夫，好象松了一口气，谈起话来了。“中国人毕竟是帮助中国人的”，这是他们的感触。两个护送我们的侦察员，因任务完毕，也在黑暗中要告辞回铁路南边去。对这二位农民出身的侦察员，记者感到他们的意识中，存在不少豪情杰意，记者在十分感激的心情下，同他们话别，继续前进。

两个侦察员回去后，在黑夜里我们只有靠着三个挑夫给我们带路。没有民众的帮助，在游击区里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就在记者这一次旅行中已深深的感觉到民众给予我们的帮助是如何的重大。今晚我们行程是要赶到距铁路线十八里的访仙桥，要在



那里才能找到我们要到达的军队的关系。我们沿途不作停留，走了十多里，距访仙桥五六里许的所在，迎面来了二个人。这时已快要九点钟了，村中的人皆已入睡，此时在路上行走的，恐非善类，因此同伴中有人高喊“是谁”，对面的一人闻声匆匆向田中逃去，我们更起疑惑，即厉声制止，并说不站住我们即开枪了。另一人无法只好站着不动，我等走近前去，细看是一老百姓模样，询问之下，方知彼等皆夜间由访仙桥逃出，因敌人五六百名，于下午五时入据访仙桥，到处搜集麻绳，闻将大举搜乡捕人，彼等闻风外避。我等至此方知访仙桥不能去，但前有敌人，后有铁道运河，至此人地生疏之境，一时颇感进退维谷。这时我们一面好好安慰二个老百姓，送他们走，一面商讨我们的行止，最后决定在附近找一比较偏僻小村暂住一宵，等明天的情形如何变化再作道理。

计议决定，即在近旁找一小村。农民早已入睡，我们为了方便计，托他们本地人三个挑夫向农家叩门，省得他们听见我等外乡人口音害怕。岂料挑夫再三喊叫，农民坚不肯开，相持几达半小时。无奈，记者即在门外告诉他们，我们是新四军因公事到此，知访仙桥有敌军，特来借宿一宵，请他见谅开门。经记者这样说，果然不到一刻钟他们起来了，开了门迎我们入内，替我们烧茶，我们再三道谢。主人十分殷勤明理，至为可感，并且一再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在此多住几天都不要紧，鬼子到不了此地。再谈了片刻，才知道此地房主人的二个弟弟都是参加游击队的，一个弟弟是机关枪手，最近袭击敌人受了伤。我们胡乱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知道访仙桥敌人已撤退，我们便到访仙桥，找到了军队的关系，我们达到了目的地。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群众》周刊第三卷第四期）



地方游击队是怎样产生的

——记丹阳游击队

记者这一次从溧阳越过敌军封锁线，到京沪路迤北地域，主要的目的是去访问在铁路线以北，长江以南，丹阳、镇江、武进三县境内作战的地方武装。这一地方游击队是由一个先进的知识青年管文蔚先生率领的。这一游击队产生至今将近一年半的历史，人数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现在已有×千余人了。他们因为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利，加上自得战区司令长官允许改编成为新四军挺进支队后，经新四军方面派遣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参加部队工作，军事技术、政治认识，及军纪都飞速进步。记者这次到达×××附近的那一晚，正值敌军动员镇江、丹阳、武进、金坛，以及沿铁路线奔牛陵口、吕城一带所有敌军三千余人，配备一部钢炮、一架飞机，分六路围攻倪山游击队根据地。敌军搜索埋伏布置非常精密，到处搜集麻绳，企图一举荡平我游击队，把活捉的游击战士用麻绳捆回去。可是由于我游击队事先作好准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使敌寇数千大军劳碌了整天一天一晚，结果是空手回去。游击队之不能战胜，这一次给敌人一个很好的教训。

记者于三月二十二日晤见了管文蔚司令，在那里逗留了三天，除了与负责的同志详谈情况外，并略略参观了部队，得到了许多新鲜的知识。记者在此愿将所见所闻，笔录下来，以供后方爱国同胞以及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志士参考。



一、沦陷后的丹阳是一幅人间地狱的缩影

前年十一月间丹阳失陷，长江北岸敌军便侵入扬州，我军陆续向西撤退。在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战争环境中，丹阳乡间的人民，恐慌到了极点，行政组织全部瓦解了，汉奸土匪蜂起，你只要登高一望，便可以看见遍地火光，老百姓扶老携幼逃亡于途，络绎不绝。丹阳沦陷后，经过七日，敌机械化部队沿镇澄公路源源西侵，毫无阻挡地侵入镇江，龟山炮台旋告失守。敌人遂即分队下乡搜索，大摇大摆，凡遇老百姓即随便打死，路上碰到女人，即使光天化日之下，随便奸淫。真是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无所不为。

老百姓这时的痛苦，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白天怕日寇，晚间又怕土匪抢劫。那时期的老百姓每天只在家烧一顿饭，到处潜逃，不敢在家居住。过了一个月，敌军搜索队过去，除了在城镇交通线据点各驻一部敌军外，大队敌军向前推进，乡村的骚扰减少了一些。虽然日寇还不时下乡要花姑娘、打鸡子，可是一般比起来，缓和了一些。老百姓在这时也陆续回来了一部分。然而敌军少了，汉奸土匪却格外地猖獗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过去乡间的统治者是豪绅地主，现在代之而起的却是地痞流氓，士绅多数被绑票勒索。当时土匪的猖獗，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土匪将各村镇未婚的妇女都加以登记，收纳定洋，数十块钱便可向土匪去买一个老婆。土匪指示你家姑娘要嫁与谁，就得遵从。要是女家不肯，便白天强抢去与人结婚，不仅如此，就是已出嫁妇女，土匪流氓也要强抓来卖，当时路上时常可以看见流氓抢来的妇女，哭哭啼啼被迫嫁人。沦陷后的丹阳人民在这样一种人间地狱中挣扎着。



二、游击队是怎样产生的？

管文蔚先生这时住在倪山家里，正是病后初愈。三兄弟准备了大概一千块钱，本来计划要到内地工作，看到民众太痛苦了，便将离乡的念头打消，将准备作川资的一千块钱拿出来充组织武装之用。江南人民向来以文弱著名，民间一条枪支也没有。好在国军西撤时，铁路沿线散留有一些枪支，当时以十多块钱一条，买到了十几条长短枪，少数手榴弹，编成了十二人的一个特务队，这便是游击队的前身。

管文蔚先生分析当时的环境，认为民众最迫切需要的是生命的保障，其次是财产的保障，再次是家庭保障，即是对父母妻子儿女的保护。管氏就根据民众这三个迫切要求，提出肃清土匪保卫家乡的正确口号，因此民众闻风而动。管自任总团长，凡四十五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人都可参加，组织以村为单位，十个人成一分队，三个分队组成一中队，三个中队组成一大队，每三个大队组成一团队，每一团队受总团长的指挥。不到一两个月，就连三两户人家的村庄都有自卫团队的组织了。每一自卫团最低限度有三百壮丁，最低限度出钱买十支枪组一特务队，凡遇土匪汉奸皆可格杀不论。晚间每一乡村都由自卫队派人放哨，凡没有口令者绝不允行走。这样一来，土匪汉奸顿时几无活动余地。

管氏所组织的特务队力量渐渐增加，但仍感到实力还不胜任剿灭当时的土匪，乃故意放出有五六百人枪的空气，使匪徒畏惧，紧接着则与他们接洽收编。土匪既害怕管部实力，答允收编一部，还有一部分始终不肯归诚。后来，管利用封建收徒弟的办法，将土匪收为徒弟，结果土匪几乎全部被收编，实力因此更增。

那时候村庄怕匪，都要管氏派武装去保护。管一方面将改编的队伍分散，驻防各村庄，另行更积极设法将特务队的实力加强。



土匪的匪性难驯，管虽加以许多训话，要他们保护百姓，但土匪仍抢劫如故。无可奈何，最后是枪毙了主犯七名，另一部全体缴械，地方秩序由此大定。

土匪肃清了，地方秩序恢复了，汉奸无法活动了，民众组织起来了，游击队的力量也一天天在增强。到了去年的春天，壮丁组织了十多万，管部所统率的特务队也有四五百人了。这时候管部派遣他的特务队到倪山以北地区孟河皋城一带去，肃清了该地区的大股汉奸土匪队伍。由于在民众间建立了威信，到这时候才正式揭起抗日的旗帜。去年三月间，管部特务队出动至孟河一带，破坏镇澄公路（由镇江到江阴），并决定肃清郑俊豪、何济清等股汉奸土匪队伍。结果获胜，还缴了不少的枪支。到五六月间，长江北岸土匪乘隙大股侵入江南，无恶不作，民众恨之人骨。管部派特务大队，并将各自卫团特务队集中编成三大队配合作战，将其逐回江北，由此整个长江以南铁道线以北区域局势大定，管部力量也更为雄厚了。

三、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从去年四月间第一次破坏镇澄公路获得胜利以后，五月间在孟河敌据点外与敌作战，打死了二个敌军，这是他们的处女战，而且得到了小胜，鼓舞起战士们的战斗热情。但是地方组织起来的农民游击队，战斗经验与战斗能力是很弱的，有一次敌军数百进占访仙桥，管部与敌对战二小时，力量渐感不支（本来长时间与敌硬战是游击战术所不取的），管连忙再派一连人抄到敌人后方去，结果总算解围，敌我双方都死伤了十余人。经过这一次作战，战士们懂得了在作战中包抄的用途。

七月间，在镇江东面三十里处，管部伏击敌百余人，战士作战很英勇，但因战斗力弱些，结果敌我双方各死了七、八人。八月底打新丰车站，将铁轨截去一段，敌巡路手摇车不知，有一列



车在那里翻车，车厢里坐着三十多个敌军官和装有大批军用品，可惜当时管部埋伏距离铁道太远了一些，等到士兵冲锋过去，敌已有准备，作战二小时，敌从各据点抽来的援兵也到了，因此管部且战且退，全部撤回。总计这一次击毙敌寇十余人，伤十余名。我方也牺牲了七、八个人，军用车上的大批军用品也无法缴回。就从这时候开始，管文蔚便派人与新四军接洽，由新四军派遣不少军政干部前去，经过短时期的休息整顿，军纪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进步。从去年七、八月起到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记者去拜访时止，敌人四五百，五六百，千余人，二三千余人，一连六次对倪山围攻，都扑了空回去。镇澄公路也在该部顽强战斗下，至今未能修复通车。用数目字来表示便是：作战四十余次，毙敌二百数十名，我伤亡九十余名，保全了丹阳、镇江、武进三县的一大部分土地的完整，汉奸无法活动，伪组织不能产生。

记者最近采访了管部的战士生活。战士的战斗热情很高，大家没有饷发只有饭吃也都愿意干下去。每一连队都有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相当强，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切切实实在教育着全体战士，军纪也做到了不扰民的地步，所以民众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在四面受敌的地区坚持下去。最难能可贵的是战士们的高度英勇牺牲精神，今年三月九日，营部派四十余战士到丹徒镇附近伏击敌军军用汽车，因被敌发觉，被二百余敌军包围。他们坚决顽强抵抗，机关枪手一个被打死，另一个顶上去，最后大队长亲自进入机枪阵地作战。敌军高喊缴械，但无一人动摇。最后冲出重围，虽然一天一夜不曾合眼，可是战士杀敌情绪仍然高涨。这种情形，真可钦敬。

四、经费的来源

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没有饷银，尚不要紧，但是没有饭吃是不行的。因此，经费问题，是一个游击队发展的重要问题。自从



丹阳、镇江相继沦陷，地方政府负责人员已经不在，在管氏组织游击队后，买枪乃至伙食费的支出，依靠少数过去省政府所颁布的营业税和田亩捐。他们规定五亩以上的业主每亩抽一角五分，一年收一季，比过去当然轻了许多，而且受害区域不征税，因此农民也乐于出钱。最近自各区公所乡镇公所恢复后，所有自治经费也从此项收入中支出。一般讲来，经费是很困难的，幸而他们还能做到公开和平等的程度，所以并不严重。

还有一种办法是他们组织了一种统一战线的团体，定为江苏互助社，所有乡间人民不分阶层，只要是抗日分子都可加入。这一组织相当发展，平时调解民众间的磨擦，战士也都加入互助社，因此该队经费方面，可得到富有的帮助不少，伤兵也能得到互助社的救济。现在这一组织已有社员八千余人。这一组织不仅在经济上给军队以帮助，就是放哨侦察等方面，社员也很努力，据管文蔚说，在有一次被敌四面包围中，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自动一夜不睡在外放哨，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五、民众自卫组织的成效

上面讲过民众自卫团的组织在防匪维持乡村治安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而且成为游击队发展的源泉。自卫团的组织采取三三制，一个团有正副团长，是由团员选举出来的，义务职，没有公费，由总团部加以委任。团部有一个文书二个政治指导员，几个教官，二个通讯员，一个侦察员，这些都是支給薄薪的，人选都是本地的知识青年和有军事知识的分子。政治指导员上课，讲些抗战形势、历代民族英雄故事之类，教官则教课。团部每星期开会一次，由团长任主席，职员都参加，或报告或检讨并布置各种工作。

大队部有正副大队长，一个文书，一个政治指导员，每人一



律十块钱的薪水，每星期开队务会议一次，中队长以上参加。中队部也一星期开会一次，分队长以上参加。分队长则每星期召开队员大会一次。他们的汇报时间，每天上午八点多钟大队长到团部汇报，接受指示，九点半中队长赴大队部汇报，十点半分队长赴中队部汇报，因此上下层的联络是很密切的。

有了这样的组织，队伍的确生气勃勃。晚间要是没有总团部的通行证，绝对不能走出乡村一步。有一个无锡的绸贩，由倪山晚间到访仙桥去，在十几里路中间，连被扣了三四次。更有一次，丹阳一个姓金的汉奸出城，伪装成小贩，到访仙桥来探听消息，出城不到三里即被捕。到现在为止，捉了一百六十多个汉奸。有一次，动员了七万多人挖公路。

自卫团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大的作用，照记者的观察，主要的原因，第一他是真正的群众自动的抗敌组织，由保卫家乡防土匪到防卫汉奸抵抗敌人，这一发展是很自然的。第二是自卫团是军事和行政的统一组织，所以力量更能发挥。

可是，最近省政府坚令恢复保甲制度，因为是省令而加上这种组织重复，所以一方面帮助保甲还乡组织的建立，另一方面便自动将自卫团工作取消了。也正因为如此，民众的组织 and 情绪已不若过去的严密热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据记者考察的结果，自卫团的组织是抗敌组织，所以敌人只有仇恨而无法利用。在目前江南游击区内，敌人企图利用中国原来的保甲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有许多地方还利用原来的保甲长做伪村长、乡董之类。为什么有些保甲长会被利用呢？因为保甲制一向看作地方行政机构，任务限于供应民伕之类，许多保甲长幻想保全地方，是会向敌人献殷勤的。

六、几点经验教训

丹阳的地方游击队，从几杆枪发展到现在成为敌人眼中的一



只巨钉，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有几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部队是从民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所以特别纯洁英勇。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决不能用过去招兵买马的办法，只有从斗争中产生的游击队，才能真正担负敌后艰苦作战的任务。

第二，答复了人民不能抗日的谰言。问题不在人民能不能抗日，而是领导者能否领导得正确。比如说，在丹阳假使领导者首先高唱抗日，而不注意到首先肃清土匪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象现在这样壮大的抗日部队是不容易产生的。

第三，有人说游击队是土匪（汉奸日寇的反宣传），其实恰恰相反，游击队是从肃清土匪中产生出来的。

第四、平原地带困难的地形条件，不能替悲观分子的不能发动游击战争的空论作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平原交通发达地区，仍然可以开展游击战，这将鼓励全国在敌后奋斗的志士们增强信心。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一日《新华日报》）



较场口事件目击记

有组织暴徒藉势逞凶捣乱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未能举行

本市消息 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昨天上午九时许，在较场口的大广场上就站满了近万的群众。来得稍缓的队伍，站在较后的地方。从他们整齐的行列和鲜明的旗帜上，看出是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劳动协会、全国邮务总工会、陪都青年联谊会、新华日报、国立艺专、育才学校、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等民主团体，也有许多没有排队伍的市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站在那里，静候开会。在主席台上则坐着政协代表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曾琦、陈启天，还有马寅初先生。其他政协代表邵力子、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勱等也曾先后到达会场。主席团还有王葆真、章乃器、阎宝航、李公朴、施复亮、李德全、刘清扬、史良、曹孟君等人。当还未到开会时间，主席台四周的一些人就大声吵闹起来，要求迅速开会，同时台上挤满了不知来意也不明来历的人。这些人为首的自称是重庆市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随身带来了乐队、宣言和大会口号，一面夺占了播音器，一面占据了主席台，就宣布奏乐开会。为首的这个人还从口袋中掏出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自行挂在胸前，并把一位自称代表着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名叫刘野樵的推出致词，他的讲话引起台下人群一片表



示不欢迎的声音。当原来大会筹备会决定的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及主席团章乃器先生和施复亮先生上前交涉，并提出大家应好好协商，不应妨碍原定的大会程序的进行时，突然有人高喊：

“他们扰乱秩序”，于是台上台下喊打声相应而起。早在台上站着的十几个特务暴徒围起李公朴先生，一面打，一面拖下台去，李先生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先生和原来主席团的一些人去拦阻，也都被打，郭先生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上，胸部亦被踢。施复亮先生更被一群特务暴徒拖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先生也被打了，准备下午为人证婚穿的马褂及长衫被特务暴徒抢去。沈钧儒老先生亦被一群暴徒包围，因有不少青年护送，始免被殴。主席台上这些人的殴打，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此时留在台上的还有数十个特务暴徒，一部分就一跃而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分留在台上的暴徒则把台上的许多长条木凳举起向人群中乱掷。据记者所见掷木凳的一个暴徒穿黑大衣并缀有银色小证章，打完就跳下主席台，装做没事人混入人群。这批特务身藏铁器及小石头，用以乱打手无寸铁的人民，当时情况惨毒残忍之至。有几位新闻记者，在台上目击惨状，想去劝阻，也被殴打。这些特务暴徒在台下继续到处蛮横行凶，冲向各团体原来排得很整齐的行列，劳动协会的一位职员和三位工友被打重伤。这时邵力子先生刚刚来到，他听到会场被破坏及发生血案情形，亦表示没有办法，旋即离去。莫德惠先生也是迟到，看了这情景很难过，对人说：“难道庆祝政协的成功也要反对吗？”这时主席台上为首指挥行凶的几个人反而含血喷人地宣布：“‘中国劳动协会’和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打人，破坏秩序！”一面又说还要继续开会。台下的群众目睹特务逞凶，蛮横暴戾，都悲愤不已；有的更是叹息不止，说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得了。随即大部散去，只剩下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和二三百特务暴徒。这个变了质的大会在刚打完了人的一群特务暴徒的稀稀落



落的掌声中，又开了下去，没有人演讲，从台下拉上一个人来讲，说了很久的话，要点是在于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反对修改宪草。散会时，又盗窃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散会后又又在百龄餐厅招待记者，报告“大会被李公朴指使的‘特务’及育才学校和中国劳动协会破坏扰乱”的经过，随即在该处大排筵席午餐。

在主席台上活动的人中，做主席的刘野樵是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此外还有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总工会理事长谭国森和李森荣、李克愚，还有国民党市党部的宣传科长庞仪山等人。

（原载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新华日报》）



陪都又一大暴行大血案

暴徒行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

本市消息 昨天沙磁区万余学生为东北问题举行游行，于行过民生路本报门市部后二十分钟，即有大批事先守候本报门市部两侧的特务百余人，乘机捣毁本报营业部。所有书报、椅、桌、窗、柜、自行车及同人衣被箱子用具等，全被捣毁。本报工作人员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及徐君曼、管佑民等，均遭殴打，伤势甚重。兹将经过情形，记述如下：上午十一时半左右，游行队伍经过后，人群中的特务分子，即向本报门市部蜂拥而来，当时站在门前维持秩序的仅四五个徒手警察，都是对面四分局派来的。特务们在本报门市部前咆哮叫嚣，谩骂侮辱，并投掷石子，击碎门窗玻璃，一场暴行从此开始。本报门市部工作同志十余人，因遵前日市警察局长唐毅之亲自通知，谓可能有人前来肇事，务须不要刺激，故始终未出大门一步。见暴徒冲入即退至二楼，暴徒即将门市部所有生财器具，全部捣毁，书籍撕破，抛掷街头。特务破门而入之先，在本报营业部对面小食店里，一个穿青色呢中山装，佩中央战干团九一一号证章的人，站在条凳上大呼一声“打”，下面齐声附和，于是一个身着棉军装，佩着“特”字和青天白日臂章的军人，同另一个穿长袍的人分从左右两边打烂了的窗口中跳入，踢开大门，指挥十来个苦力模样的人，冲了进去。



暴徒将第一层楼捣毁后，犹不肯罢手，又冲上二楼、三楼、四楼。暴徒们把贵重轻便的东西抢劫收藏，而把一捆捆的书籍、文具、桌椅、被褥、箱子、自行车等由楼窗抛出，书籍满天飘飞，落到地上被行人践踏，箱笼物件摔得稀烂，衣衫褂裤挂在电线上，全部生财器具，门窗招牌无一幸免。损失不下数千万元（准确数字正统计中）。本报同人十余人始终镇静沉着，没有动手，由铺面退至二楼，由二楼遂后退至四楼（顶层），至此退无可退。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同志，乃命一部分同人攀屋出走，仅留下图书课副主任徐君曼同志，图书课职员管佑民、潘培新同志，洗衣女佣及杨黎原同志本人共五人，应付危局。暴徒们冲上顶层，一面侮骂，一面拳打脚踢，并将之押到二楼，遍身搜查，搜去现款数万元。这时来了十余名警士，将本报同人及暴徒数人一并捆绑，本报同人说明系新华日报职员后，警士们便连暴徒们一并松绑了。但第二批暴徒十余人紧接冲上楼来，不顾警士在场，即以杠子木板等硬器猛击本报同人。一阵暴殴后，杨黎原同志头顶被击破，当即流血不止，重伤晕倒。徐君曼同志满脸流血，被拉到街上，又遭一顿毒打后，由警士送至对门四分局。记者见其行经街心时面孔上鲜血流注不止，身被捆绑，但徐君曼同志仍昂首挺胸而过。管佑民同志亦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被警察护送至四分局。潘培新同志因已混杂在第一批暴徒中离去，未受重伤。这一场暴行历时二小时。暴徒们从容施虐，从容逃逸。

暴行停止后，晕倒的杨黎原同志在纸堆里被人翻出来。由警局抬送至市民医院医治。当记者在探视他的时候，他已稍为苏醒，满脸血污，手掩头顶，嘴里还含糊地念着：“君曼呢？小管小潘在哪里？快去找呀！”徐君曼、管佑民两同志带着重伤，在警察四分局耽了将近一点钟，直到本报派人去交涉，才送至市民医院医治。兹将三同志伤情记述如后：



杨黎原：患可疑似脑震荡及长约十公分之头皮裂伤一处。

徐君曼：头顶部有长四公分及五公分之裂伤各一处，二侧肩胛骨处及左侧前臂及肘部，各有皮下淤血一处。

管佑民：前额有裂伤一处，长半公分，右眼眶部及右臂各有皮下血肿二块，大腿外侧有一·五×一公分之擦伤一处。此外尚有轻伤潘培新等六人。

当打得最剧烈的时候，一位过路人说：“啊呀打得这样厉害，为何没有人制止？”在七星岗一个人力车夫说：“为什么要打新华日报呀，他们时常替我们穷人说话的。”到医院慰问者有郭沫若、于立群、杜守素、冯雪峰、吴藻溪、聂绀弩、骆宾基等先生，送慰问信者更不绝于途，对于特务分子这种暴行都很愤慨。本报同人前日即已分函各治安机关，请求保护，昨日暴徒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达二小时并殴打维持秩序之徒手警士数人，可谓横蛮之至。人民身体居住自由缺乏保障如此，令人不胜悲愤。

又讯：本报记者昨往访警察局长唐毅氏，据唐局长称：他对本报被捣毁，人员被殴打，在职责上表示遗憾。他认为这次打新华日报，决非学生所为，事情发生于学生游行过后，唐局长赶至出事地点，并指挥警局将本报受伤同人送往医院。

（原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



中共代表团招待记者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

▲本报特讯 中共代表团于昨天下午九时半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外记者四十余人。首由石西民同志报告本报被捣毁经过，继由周恩来同志对此次事件发表如下声明：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希望今后政治问题的解决，应当动口不动手，现在陪都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城市来，这是很遗憾的事。中国停止了内战就是为了求得和平民主建设，政协的一切协议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本此精神，虽然中午发生不幸事件，今天下午我们还去出席军事三人会议，用政治方法去解决军队问题，这证明中共在国家的问题上丝毫不动感情，但这些挑衅的反动分子却企图在军事协商就要完成时来加以破坏。中共始终坚决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奋斗，也许在这过程中，民主人士还要流血，但中共决不受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或因此而退却，这也许会使挑拨者失望的。

事情发展到今天，应指出这次事件的真实内容。

第一，应该把爱国与排外分开。对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到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在有些情况还未弄清时，应该弄清，把爱国运动引到相反的方向上去是与全国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举例来说：这次马歇尔将军就参



加了中国停战的谈判和军事三人小组，如仅仅形式上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实际上，这样做，显然是有助于中国和平民主问题的解决，而且符合于国际合作的原则。可见爱国不能与排外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欢迎马歇尔将军参加停战与整编军队的商谈。

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甚至特工人员中许多都是无辜被逼的，这些人值得怜悯。因此，应该把他们与阴谋头子分开。

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种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一方面想制造事件来破坏政府和蒋主席的威信，另方面想挑起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的忿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尤其在这几天，蒋主席不在这里，较场口事件还没有结束，军事小组快到成功结束的阶段时，故意来制造这种事件。但是这种企图，只能使问题发生波折和顿挫，而不能取消中国的民主事业。我可断言，这种事件今后还可能发生。只要这种阴谋分子不受到舆论的批评，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事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还会制造出更大的阴谋。但不管怎样，也许还要流民主分子的血，但中国还是要和世界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走民主与团结的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这点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懂得怎样不受欺骗和挑拨，我们懂得怎样为国家民族努力，我们懂得怎样绕过暗礁。

但最后要说明，政府对这事件，事前未能防止，临时又未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制止，因而自沧白堂事件以来，这类事情有日渐扩大之势，这使政府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失，同时使民主事业也遭受到很大的困难。打新华日报和较场口事件，沧白堂的捣乱都是



一个来源。这点政府不是不知道的，而是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负责的处置。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在这件事上是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不然大家怎能共聚一堂讲道理，而不仗势欺人！？现在也是考验国民党和政府是否有控制国民党内反动派和政府内阴谋分子的能力。在我们这方面，已经是尽量容忍，并且丝毫未松懈对国家民族的努力，以达到军事小组的成功。在政府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表示自己的态度，负责处理此事，这就是我要向诸位朋友的声明，一切都凭诸位秉公判断，我们只是把此事诉诸公正的舆论。

（原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



在 法 庭 上

——较场口血案听审记

本报特讯 较场口暴徒破坏政协成功庆祝大会，打伤筹备会负责人李公朴、施复亮及参加大会的郭沫若等人的血案，距今已一个多月。在蒋主席宣布四项诺言之后不久，重庆出现了这一丑剧，已令人愤慨。尤其是那批暴徒打手们居然恬不知耻，打了别人硬说别人打他；破坏了会场，反咬筹备会的负责人破坏会场；高举什么“伸张正义”之旗，并向法院诬告。一个月来叫嚣不已，弄得是非颠倒，邪气大张，正义人士痛心不已。

法庭一瞥

重庆地方法院宣布昨晨开庭，并且因为双方都提出自诉，又决定了并案审理。开庭的时间是上午十时，旁听的人与新闻记者，从七点多钟就陆续到来，未到九时，把第六庭挤得水泄不通，窗户外面也站满了人。原告被告双方到的是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陈培志、冉瑞武、梁永恩及刘野樵、谢雅南等，吴人初称病未到，两造律师也进了庭，证人沈钧儒也到了。

旁听的拥挤，真可说“盛况空前”，空气显得紧张。有人说笑话：倘若这时石块丢进法庭来，可无处逃躲呀！许多曾经目击较场口惨案的旁听者，看看窗外似曾相识的人头挤动，也不由人不心动一下。



“轰！哗！”一声巨响起自法庭以外，大家心头又是一阵紧张。原来后到的旁听者人数太多，把进门的阶沿石栏杆挤垮了。人群中一位法院警士，顿时大呼“捉起来！捉起来！”他以为是有人再来一套较场口把戏。事实弄明之后，一场虚惊也就过去了。

正义的申诉

庭长龚尊一宣布开庭，一一传问两案原被告。李公朴先生伤愈不久，一脸焦黄，沉静地叙述控告刘野樵吴人初等妨害秩序妨害集会罪及伤害罪的案情。他说明筹备该会的经过，刘野樵等如何霸占会场以及他本人当时被打，从台上打到台下的经过。他说当时心里很气愤，但决定宁死不还手。李公朴先生最后沉痛地说：“刘野樵等事先布置，乱打人，打了我还告我打人，真不知这是一个什么世界。”

施复亮先生说：“筹备发起庆祝会的有廿四个团体，总主席问题应由筹备各团体协商决定。我当时听见周德侯独自提刘野樵为总主席，而刘马上宣布开会，才知有人想霸占，心里很愤慨。我提议要李公朴先生报告筹备经过，李先生去扩音器前要报告，刘野樵周德侯就推他，我说应该讲理，这时周德侯就说破坏会场秩序，台上台下暴徒就随声喊打，我就被追打，一直打到一小店里面。……”

劳协职员陈培志说明了谢雅南率领打手冲入劳协队伍打人的经过。年轻的工人梁永思说：“我们工人参加庆祝会，为的是工人也要晓得晓得政协成功。一到会场看见台上在闹，很奇怪，就有人冲来打陈培志，我说不要打，就打我。我们工人不怕打，他们又把我抓住，说我捣乱会场，要送我到卫戍部，³后来有一外国记者来拍照，抓我的人赶紧把我放了。”他说得很率真，引起大家笑了。



暴徒的脸谱

庭长转而传审刘野樵，他以说书姿态说道：“台下‘民众’要马上开会，台上有人说总主席要协商，我就说有什么可协商的！有人推举我，台下一片掌声。”说到这里旁听席上有人忍不住发出一阵笑声。接着他又说：“我义不容辞，任了大会主席。这时李公朴脱掉短大衣，连跳过四条凳子一把把我抓住，施复亮就在台上连声喊打，朱学范在台下右角把帽子一扬，陶行知这时就指挥育才学生上台就打……把我打走了。”刘野樵的说书本领真不错，一口气讲完这一段有声有色的谎言。真有“说时迟那时快”的描写手法，可惜大概是情急了一点，赢得的只是旁听席上一阵哄笑。

庭长又传审谢雅南，谢雅南穿一件蓝长衫，自称是下力的，但是出场气派却掩藏不住他那真正的身份。开口同志闭口同志，庭长一传他，马上回答“有！”这实在不是下力的工人派头。

庭长问：较场口打架时，你在台上还是台下？

谢答：我不在台上，也不在台下。

庭长：你在什么地方？

谢答：在马路上。

庭长：你为什么告朱学范、易礼容？

谢答：朱学范在台上左角乐队旁指挥打人。易礼容在马路上指挥。

这时庭长又传朱、易两先生询问。朱学范先生说：我那天根本未入会场，更未上主席台，刘野樵说我在台下右角指挥，谢雅南又说我在台上左角指挥，已自相矛盾。易礼容先生也说：那天是星期，我整天在家未出。



三种态度

审问到这里庭长说话了：“本案是政治上重要，法律上轻，论法律伤害罪至多判三年，妨害罪至多二年。本人认为双方都是社会知名人士，大可不必对簿公庭，听说外面有人调解，可否双方在外和解？本案进行调查也很麻烦，法律也解决不了，是否政治解决？”庭长的本意不坏，也说明了真理一面。可是在法庭上讲，总令人增一层感慨！在政治不上轨道的中国，法的尊严从何提起！？

李公朴先生对庭长的答复是：“本案应明是非，尤其在今天要争取身体集会自由之时。今天我们身体集会自由受妨害，反被诬告，念之非常痛心；这非个人荣辱得失问题，我与刘野樵毫无个人恩怨。刘野樵今天讲出这样许多话，实在不敢相信他居然讲得出口，希望庭长明鉴。本人不能代表全体，对庭长好意无法回答。”刘野樵的答复：“事关强奸民意，他们不能自居征服者，把我们重庆当殖民地，非坚持到底不可。个人对和解无所谓，要打我几次更好，但今天是强奸民意。”……刘野樵愈说愈不成话了，庭长几次制止，才停了口。

庭长、李公朴、刘野樵三人的问答，代表了三种态度，很值得回味。

证人与具结

由于两造未答应在外和解，庭长就传审证人。被传的第一名是中央社记者颜瑞生。

庭长说：见证人说话，要对国家负责，不能随便，应据实说来，你能具结吗？要是具了结，将来发现违证罪，那是要判七年徒刑的。经庭长这么一说，颜瑞生就表示不愿具结，态度显得拘谨，连开会时间，与会人数的估计，也迟迟不愿回答。幽默的庭



长说：你是新闻记者，不带表吗？平时新闻记者不估计会场人数？这幽默的询问与证人的拘谨局促，又引起旁听者一阵欢笑。

时间已快到正午十二时，庭长问完了颜瑞生就宣布下午二时继续开庭。但是下午二时，当旁听者象买平价米一般排队等候，好不容易挤入时，庭长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前晚会议决定排解本案，故本案先进行排解，将来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

（原载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下关惨案的经过

一 早有布置

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严重关头，每一个不愿让内战毁灭民族生机的善良人民，已到了不能不行动起来的时候，阻止这万恶的内战的爆发，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上海各界促进和平联合会的代表马叙伦、黄廷芳、盛丕华、胡厥文、包达三、张纲伯、阎宝航、雷洁琼、胡子婴诸先生及上海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两先生一行十余人，六月廿三日，在上海七万市民学生的热烈欢送下，怀着满腔热诚，搭车来京请愿，向蒋主席马歇尔及中共三方面呼吁和平，转达上海市民反对内战的民意。

国民党当局却仇视这批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人民代表。当上海请愿代表即将来京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当局就开始了组织破坏工作。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很早就下令给南京各报馆，不准登载马叙伦等先生来京的消息，国民党的党报开始了辱骂与攻击。廿三日下午七时，和平代表们乘车抵京。就在堂堂首都的下关车站，在“以警治国”的南京，在军警森严的情形下，这批和平使者遭受了好战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包围殴打，其时间延续达六小时之久。



二 惨剧经过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左右，南京下关火车站上来了少数几位迎接上海前来的和平使者的欢迎者。四点十分钟的快车到站，没有看到请愿团的影子，但由上海驶来的火车车皮上却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反对内战”，“和平协商”等标语，由此可见上海欢送的热烈。

从上海来京的最后一班快车，终于载了十位代表，在傍晚七时到达下关车站，这时少数去迎接的亲友，已发现事态的不正常了。他们请红帽子（车站的搬行李伙）去搬行李，一个个被人阻止了，他们去雇汽车，一家家车行受了警告，一概拒绝了。

当列车驶进车站，旅客纷纷下车时，突然有二位身着绸短衫裤，脚穿纹皮皮鞋，腰上凸出一眼便知是手枪的“难民”代表，迎上月台，把几位呼吁和平的老先生拦住，出言不逊地说：“你们既然是民众代表，就请带我们去见周恩来，我们要还乡呀！”代表团秘书胡子婴先生答复说：只要国内战争停止了，离家难民就可回乡过安定的生活。这时旅客渐渐出站，车站涌进了千多个内着制服外穿长衫的“难民”，一片高喊声：“打共产党代表”！

“叫姓马的站出来说话”！喊打与鼓掌助威之声，嘈杂一团，站上军警坐视旁观，听任叫嚣。当马叙伦先生步出月台时，彪形黑色大汉一声喊打，一群特务遂拥上去举拳就打。马先生旁边的另一代表雷洁琼女士，赶紧用身护住马老先生，暴徒们的拳头如雨点般的打下，马先生雷先生及其他几位代表被打伤了。这时车站上的暴徒已达二千人，代表团被挤进了候车室。暴徒们群趋候车室门口，当时还有几位宪兵阻止凶手冲入，他们便围在室外叫嚣不已，大嚷大叫：“找姓马的出来问话！”“看打马歇尔呵！”

（雇来的打手把马先生的名字错成了马歇尔了，可笑！）“打周恩来！打共产党！”马老先生因旅途劳顿，在镇江时，且曾被暴



徒嚣叫烦扰一次，下车又被殴打，精神疲惫不堪，躺在沙发上闭目叹气，就由阎宝航先生出去。阎先生站在凳上向围得密密层层
的暴徒诚恳地说明此次来京请愿的目的。但是两句话尚未说完，
一片喊打之声，已使他无法继续讲话。暴徒们竟高喊“共产党！
跪下！”要阎宝航先生下跪。阎先生凛然回答：“我与日本人打
了多少年仗，不曾下跪，我要为中国人保留一点面子，你们枪毙
我好了。”

这时暴徒们的狰狞残忍的面目，已放肆发挥，在站的几位新
闻记者一见形势恶劣，相率离去。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女记
者浦熙修正准备离站，却被暴徒挡住，不让出站。他们再三说明
是新闻记者，暴徒们也不理睬，一时拳脚交加，被打入候车室
内。有几十个自称三民主义青年团职员的“难民”代表追入室
内，拍桌大骂不已，户外则是一片“打共产党”的吼声。有的
说：“周恩来捉到了”，“马歇尔也捉到了”！于是一片鼓掌、
狂呼。

相持至下午九时许，几位新闻记者在所谓“难民”代表的同
意之下出站，但甫出候车室又被暴徒殴打，第二次又退回候车
室。晚十时半，南京市政府新闻专员钱江潮前来与暴徒代表讲
了不少好话，负责证明三位（大公报高集、新民报浦熙修、益世报
徐斌）是新闻记者，应让他们回家，终算得到了同意。谁知一出
车站，又是一片喊打声，鼓掌声，殴打又开始了。先是围成一团
打，旋又分开一个个打，暴徒们竟残忍到扭住女记者浦熙修的
头发，拳打脚踢，浑身衣服扯破，这样又被打回到候车室。

记者们三次遭打，代表们一次遭打，皆困处在一间斗室之
中，其他记者们这时也陆续前去采访消息，在窗外往室内探视，
见到每人虽被殴辱，精神疲惫，但神色泰然，一种威武不能屈的
气概，令人钦敬。

时间已到午夜十一时半，遭难的人民代表与新闻记者仍毫无



希望离此险境。正在这时，国民党治安当局竟不负责任，撤去所有宪警，这就是明明白白的表示让特务暴徒更痛快的发泄兽性。果然，宪警撤退以后，大批暴徒从车站外拥入站内，高喊“打倒共产党”，为首的特务更高喊“打死不要紧，我负责”！汽水瓶、皮鞋、椅子皆成暴徒武器，七八个老弱男女代表及记者别无办法，只好不加抵御地让这批疯狗乱打。马叙伦老先生在暴徒冲入时，静坐躺椅上闭目不动。雷洁琼女士面部被打伤流血，暴徒犹不满足，她的胸部，背部，腿部全被打伤，血流满身，衣服上印了一个个皮鞋脚印，晕厥在沙发上。女记者浦熙修头部被打，也晕倒在雷洁琼女士身上，背部受了重伤。大公报记者高集，被打得眼眶隆肿，后脑部出血，背脊受伤。其他阎宝航先生等也无不被打得鲜血淋漓，尤其残忍的是把民主同盟去迎接的叶笃义先生打得呕血不止。学生代表（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内伤最重。一位女士全身衣裤都被剥得精光，暴徒们引为笑乐（她后来借了车站女佣的衣服，才得离去）。

在这疯狂乱打中，暴徒开始了抢劫，把所有代表及记者们的钞票、手表、皮包、钢笔等等一概抢去，这无耻残忍贪婪的一群野兽！

正在暴徒自由行凶之际，五六位外国记者赶到车站，拥进暴徒群，目睹了这残忍凶惨的一幕，无不愤慨。这时已经打完了，此响斯应，军警又复出现，来“驱散”这批“难民”了。候车室内桌椅尽毁，血流满地，这批为和平而遭难的战士皆已倒在室内不省人事，不能动弹。一直到二十四日晨一点半，警备司令部派来了卡车，将这批受伤者拖上汽车，押往警备司令部，经抗议及外国记者乘吉普车紧随不放，这才送进城内太平路中央医院。到了医院内还无人过问，甚至有人说出：“你伤我没伤！”这种非人类所能说出口的话。



三 营救·慰问

暴徒将请愿代表包围在车站之后，中共代表团、民主同盟代表团及正义人士漏夜奔走营救。民盟罗隆基先生打电话给马歇尔呼吁，年老的梁漱溟先生闻讯，半夜从床上披衣起来，出外奔走，冯玉祥、李济深先生亦为之焦急异常，纷纷打电话给邵力子先生请其从速营救。许多新闻记者为同业被难亦纷纷打电话给邵先生请其营救。但是营救者是无权无势的人，整夜奔忙，无济于事，从下午七时到次晨一时半，暴徒逞凶七小时，直至他们任务完成，始由军警来收拾完场。

遭难的和平代表与记者，血淋淋的躺在陆军医院水门汀上，已经是二十四日晨三时了。慰问者络绎不绝的前来。郭沫若先生到得早，走得最迟，从他的神态可看出他的悲愤。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等及民盟代表罗隆基先生纷纷赶往医院慰问。此外还有一大群记者。

记者于二十四日晨往中央医院探视，马叙伦先生因头部、腰部、胸部均受重伤，呼吸困难，精神不佳，记者不愿多打扰，未与交谈。学生代表陈震中昏迷不醒，雷洁琼女士则慨叹暴徒凶殴的残忍，并称“我衣上脚印血迹，将永远保存”。

堂堂国民党的首都所在地，竟发生如此残凶暴殴的惨剧，这已震动了南京市民，愤懑的火在他们胸中燃烧！刺刀是统治不了人民的意志的！以共产党的帽子硬戴在工商界的耆宿、大学教授头上，这只是更证明腐烂的统治者的更加无耻和众叛亲离。正象一位被难者所说：“国民党就这样把社会上的好人都归入共产党，把流氓打手引为忠实同志，这究竟是谁的损失？”

不错！真正爱护国民党的国民党人士应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原载《群众》第十一卷第九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南 京 谈 判

——南京通讯——

《南京通讯》以及《南京一周》各篇通讯，是用怀南的笔名，发表在《群众》周刊上的。同类性质的四篇，《时局的激流》、《“拖”“骗”已到尾声了》、《南京之秋》、《和平——已经死掉了》，则是以明石的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

怀南是石西民与鲁明两同志当时共用的一个笔名，这里收集的通讯，大部分是石西民写的。由于时间隔得很久，要分清哪一篇是谁的手笔，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这些通讯完整地记录了国共谈判时的一部分珍贵资料，也不宜加以分割。因此，我们全部选用了，特此作一说明。——编者

南京的限期谈判，到六月三十日暂时告一“未结束的结束”了。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的特殊形式的公告，虽然掩饰了南京谈判所以未有结果的真实原因，却也暴露了当局准备随时开火的企图与借口。

在十五天的休战谈判和八天的延期休战谈判中，全国人民的心情可以说都紧张到了极点。因为这一有“限期”的谈判，预伏着很大的危机，万一在“限期”内谈不好，时局就可能恶化下来。全国人民所一致憎恶的内战，就会驾临广大人民的头上。在



谈判中，除好战分子外，各党派的政治代表人物在南京的紧张活动，辛苦工作，就是广大人民心理的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张一弛，也与南京谈判息息相关。

由蒋介石六月六日所发布的东北停战命令而开始的南京谈判，并不是国民政府还都以来时局好转的象征，而是今年二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后逆转了的局势之新的发展。由于中共坚持和平民主方针，全国人民之反对内战，第三方面人士之奔走，及马歇尔将军之继续努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有限期的休战谈判。但国民党内好战分子的企图，在于假谈判来达成一定的无理由的政治军事目的，并利用时间完成内战准备，而不在真正谋取和平。所以不论中共如何让步，第三方面如何调处，人民如何请愿，马歇尔将军如何努力，仍然不能使谈判有结果。

尽管停止东北内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然而好战派之所以暂停东北内战，除上述原因外，更由东北军事形势所决定。如果东北始终保持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民主联军由四平街长春撤退时的情况，没有二十五日以后七个整团被民主联军歼灭（零星的还不算）以及云南军队潘朔端师长的反内战起义等，那就不会有东北休战。为了稳定开始转入不利的东北军事形势，同时为了利用人民和平愿望，所以用“东北休战”的烟幕，在短短的限期内，希望用谈判方式来得到更大的政治军事利益，并为以后的内战取得更有利的阵地。只有这样才能懂得熊式辉将军所谓“谈判没有失败与成功问题，而只有接收方式问题”这话的意义。

好战分子不是以谈判谋和平，所以贯穿整个二十三天的谈判，精神上愈说愈远。

首先，这次谈判就不是以平等协商精神来进行的。单方面的“命令”代替了和谐的联合公告。谈判也单方面“限期”，使中共和全国人民在极大的“威胁”下来进行谈判。因为谁都会设想，如果在“限期内”不能达成协议，就必然爆发大规模内战。



如果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怕内战，就只好在限期内接受好战派的无理要求。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平”地达到目的。

其次，谈判的内容也是单独指定的。此次不谈政治，只谈军事。而所谓“军事”，乃是好战分子单方面的战略要求，“东北停战”则要求继续“接收”，“恢复交通”则要求单纯恢复铁路交通，并把它交给国民党军队和由戴笠系武装特务组成的护路队去控制；“整军”则系要求中共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山东半岛、苏北及一切铁路线，而且不只是撤退军队，还须撤去地方政权，以便国民党军自由进入，消灭当地一切民主机构，并使八路军、新四军退至被国民党军队分割与包围的农村中，以遂其各个消灭之目的。

在谈判中，还提出一个有辱国格的要求，即承认美方的“最后决定权”。好战分子公开主张将中国内争的“最后决定权”交给美国人，想以此来争取美政府的支持。经中共婉言拒绝之后，仍坚持再三，不仅出之于口，而且公然载之于谈判文件，实为中国历史上稀有之先例。以后自知理屈，在宣传上故意说是“仲裁权”与“公断权”等，但在谈判中并未变更。

谈判中官方的宣传攻势，异乎寻常。六月六日停战命令一发表，国民党宣传机关，就说是给中共以“最后觉悟的机会”，这全不是谈判的态度。七日周恩来将军发表谈话，申明长期和全面谈判之愿望，并指出十五天限期过短，因为谈判中必然涉及东北乃至全国的政治问题，但仍欢迎这一休战谈判。而国民党报纸又说这是故意牵连太广，使问题不易解决，说这是“无诚意”。九日周将军由延安回京，表示愿“先易后难”与“就事论事”来进行谈判，以迁就国民党之指定式的谈判，则又被说成是“避重就轻”，“有意拖延”。中共不同意把“最后决定权”交给外国人，他们就各方面喧嚷中共“反美”。总之，他们不是在找寻妥协点，而是故意制造分歧。



中共在谈判中不断作巨大让步。首先是迁就国方意见，只谈军事不谈政治，虽明知这不合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与全国人民军事政治平行解决之主张。就恢复交通而言，中共也在全面恢复交通与全面拆除碉堡这两个已定原则上让步，而同意首先恢复解放区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三铁路，平毁碉堡亦同意政府方面极大之保留。关于整军问题上，中共已同意在东北军队比例和关内外驻军地点上作极大之让步。关于最后决定权问题，中共在原则上虽不同意，但在调处执行部，尤其执行小组中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给美方代表以较大之职权和便利。然而这一些让步，并未能使谈判成功。因为好战分子之目的在于控制关内外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与交通要道，以造成以后内战的有利形势。这个目的不达到，当然不能满足。

十五天谈判到紧要关头时，六月十四日美国继续军事援华的消息，给好战派以很大的鼓励。八天延期休战谈判将结束时，美国国务院的几次声明，对于中国好战分子都起了支持作用。因此国民党目前宣传中心之一，是歪曲中共主席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挑拨中国与美国人民的友谊，企图使美政府中帝国主义分子更加支援好战分子。谈判时期中一再谣传中共进攻青岛，也是这一用意。

二十三日的下关惨案，则说明好战分子的决心。对上海人民团体之和平请愿代表“无情的打击”，谁也知道不是“难民”偶然的行为，而是有长期的周密的组织领导的计划与行动。这是发生在八天休战谈判的一日，这说明好战分子对延期休战的态度。八天谈判在恢复交通与停止东北冲突等问题上，已有些议协，而仍不能签字，也就是这个道理。原来好战分子把一切问题扣在整军问题的无理要求上，要中共在此要求面前屈服，让他们达到和平消灭解放区的目的，否则谈判不得任何结果，以便委罪于中共，而他们则有随时借口发动内战之自由。



三十日彭学沛的公告，是在这样矛盾情形下产生的。一方面，二十三天的限期谈判过去了，和平消灭解放区的目的没有达到，军事进攻的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发动，所以国民党中常会中，主战派压倒一切，不少人主张公开下令讨伐。但是另一方面，武力消灭解放区没有把握，人民反内战力量日渐强大，国民党区域财政经济濒于破产，以及国际条件之复杂，使好战派不能不有所顾虑。不敢公开的全面的打，暂时局部的打，以待局势的发展，同时不断绝谈判，以掩饰他们的打，以配合他们的打，以蒙蔽中外人士的耳目。所以二十三天限期未满就已下令歼灭中原军区第五师，而限期刚满，就在胶济路发动军事进攻。至于打的借口，将因地区不同，或为“自卫”，或为“恢复交通”，或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在彭学沛的公告中，已经明明白白写出来了。看吧，中原军区和胶济线的战火，还会在苏北和热河以至其他地方烧起来的。因为彭学沛的公告，实际是一种变形的讨伐令。

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三十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这个危险的形势，彭学沛公告所掩盖的内战实质，将使中国时局走回到一月十日停战命令前的旧观。苟听其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这就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作伟大的努力。

（原载《群众》第十一卷第十期，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出版）



南 京 一 周

（自七月八日至十七日，这“一周”
多三天，下一周从十八日起）

一 疯狂与卑劣

六月三十日彭学沛公告中的含糊词句，这十天内，一步一步地露骨表现出来了。

对中原军区，“驱除”已经很有“成绩”了！不仅占了宣化店，正在剿除，而且把李先念将军所部驱到汉水上游，四面堵追，还说李部到处发动“攻势”。

所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十五日拂晓，国民党军已对苏北南线全面攻击了。而三天以前，南京就发布苏北共军“全面出击”的消息，官方报纸都编在头条地位，乃象真有其事。

好些有政治经验的人，看了八日彭学沛在上海记者会上的谈话，就对新的战争预感很深。十四日蒋介石飞牯岭，很多人都估计会有更大的不辜事件发生。果然，“苏北难民”（？）开始“武装还乡”（？）了！不仅有近五十万的陆军作战，而且海空军也配合起来了。

山东山西内战的野火也在“交通”烟幕下燃烧。

总之，内战正在全面化。今年一月停战以来的暂时和平局面已经基本动摇了。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他们也至少怀疑



内战胜利的把握。但是有些发了疯的人说：“抗战又有什么把握呢？然而终于胜利了。内战打下去，也许会有把握的。”当然，他们所谓“把握”，是寄托在美国的大量军事支持上面。也有人主张过要下“讨伐令”，据说因为怕解放区另外成立政府影响国际形势与国内观听，才停了下来。

连续两次的昆明政治暗杀，把南京社会激动了。十一日李公朴先生被刺，官方有些人说：“少一个无业游民，倒可节省一些口粮。”好象李先生早就该死。较场口那一顿打，显然尚未如当局们的意，打得太轻了！李先生被叫做“无业游民”，大概因为他没有做过官。只有周佛海、任援道、罗君强这批人，作过汪记国民党政府的院长、部长、总司令、市长等要职者，才算“有业”，才值得当局的爱护。有些善心肠的南京人，对于李公朴的被刺，还不相信是政治性质，四天以后又发生闻一多先生被刺案，连最忠厚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是政治暗杀了。刺李系用无声手枪，而刺闻却用普通手枪，更加肆无忌惮了。闻案继李案而来，好多人都一时惊呆了。觉得这是什么世界呢？有些对现状尚存一些希望的人，在南京还勤勤恳恳作些社会文化事业，到这时也都废然太息，都想撒手不干了。

龙云先生的次子龙绳祖师长自己到南京国防部来报到，也曾被宪兵司令部在下关车站根据“手令”逮捕，没有宣布任何理由。

法西斯派的疯狂和卑劣是分不开的。中国法西斯派尤其如此。

二 不尽如意

按法西斯的哲学，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他们造的。但世界并不照着法西斯的愿望发展，它有自己的道路。

中国法西斯派一再鼓励喽罗们勇气的最基本根据，是“美国



会支持我们的”。然而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完全等于中国法西斯派，彼此的利害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何况美国人民与美政府中的民主人士的意见，对于美国政府政策不是没有影响的呢！

联总九日宣布对华一部分物资停运，并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于救济工作之无能与不公。这个决定没有先和国民党政府商量，而且这个决定同时通知国共双方。这对于南京昏然自大的人们刺激不小。国民党发表这一文告时，把平行通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将军一句话删去，而外国记者却很重视这个问题。

七月初，南京官方制造了欢迎魏特迈将军的空气。他们希望魏氏能作美驻中国大使，甚至于代马歇尔作特使，他们希望马歇尔早日回去。但是，随巴黎外长会议美苏关系的妥协，十日上午旧金山传来了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的消息。这消息使南京官场为之感到“突然”。外交大员说，事先不晓得；中央日报说，完全是“意外”。这样“突然”了两天，他们似乎还要等等杜鲁门的“提名”，是否能为国会所通过。后来事情证实了。中央日报于是满口“和平民主”地发表了一篇表示欢迎的社论。如果单看那篇社论，不明白内幕的人，会怀疑自己看错了报纸。司徒雷登大使讲得很明白，他之作大使，不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变更，而是方式上会有些变化。换句话说，可能采用些“民主方式”。问题就在于，中国法西斯派不愿意这样，连任何“民主方式”也不愿意呀！

三 愤怒的人心

十天来的谈判，事实上已经停顿了。国民党不愿在谈判中解决任何问题，而企图在内战、暗杀与欺骗的宣传中解决问题。

蒋主席十四日飞庐山，也邀约马歇尔将军上庐山。许多善意的中外新闻记者，总是设想着国民党已经在庐山为中共代表团预



备好了进行谈判必要的物质条件。

但是新闻记者的愿望亦止于愿望而已。

“内战”！“暗杀”！把人逼急了。有些平时觉得中共态度过于强硬的人，现在却反过来问中共：“你们还老是让下去吗？”

“你们就永远只能消极抵抗吗？”

周恩来将军在南京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非常悲愤地抗议昆明暗杀。坚决表示，中共代表团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随时准备好了接受李公朴闻一多同样的命运。要怕就不敢来谈判，来了就不怕。暗杀绝对不能阻止我们为中国之和平民主而斗争。

本来希望不久将来离开实际政治，致力学术研究的民盟留京代表梁漱溟先生，在李案发生后，他首先觉得不能不干下去了。他要坚决向国民党抗议，他要坚决主张“取消特务”，他已决心等待“第三颗子弹”！

看吧！看中国法西斯派能横行到几时吧！

（原载《群众》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只打不谈的一周（南京一周）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这一周来，内战的炮声，代替了和平的商谈。尤其是江北的内战，窒息了南京人的呼吸。因为江北与南京一江之隔，而且经济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战争的胜败，消息传得很快，要封锁也封锁不了。江北战争才开始，南京人已经感到，猪肉、鸡、蛋、食油等来源减少了。

为了要放手打内战，并且要推卸内战的责任，在遍地烽火的时候，庐山便变成了修道场，马歇尔十八日也被请了去。好象那里只有奇峰异谷，山庄茂林，无关江北等地的狼烟！在血腥遍中国的时候，连绵不绝的庐山的郊野宴，不仅是有背先忧后乐之古训，简直是站在尸骸上跳舞。

周恩来将军在南京无“判”可“谈”，只好利用时间去上海、开封，解决解放区救济工作和黄河等问题了。

不幸的内战是一天一天的向全国扩大了。而江北就成为目前内战的中心。内战正按着过去二十五天谈判中国国民党代表所强求而未遂的地区进行，他们在这些地区都使用了他们可能调动的兵力。以江北的南线而论，他们第一线就有五个军（第五，第二十五，第一百军，第六十五，第四十九），而在第二线者还有三个军（第九十九，第二十一，第七十四）。从七月十五日起，他们开始全线的“驱除”了。其第一步计划，东面标志着如皋，中路



标志着高邮，西路标志着天长。两翼先动，中路正等着时机，突击进行。虽然好战派对如皋一路出师不利，第一百军和四十九军都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在后继援军还有的情形下，进攻当然还不会停止。

这一次的内战，无论如何不会受人欢迎的，因此好战派在宣传上比过去都下了更多工夫。正如他们对于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案的布置上，就有“鱼目混珠”、“嫁祸于人”这些手法，企图使人真假不分，且有一箭双雕之“妙计”。他们在三四月前就开始把“苏北难民”问题夸大宣传，埋伏下了一大堆文章，用此可以对付京沪一带的和平民主运动。下关打上海和平请愿代表，不过试试“苏北难民”这一把“宝刀”而已；这次大规模发动苏北内战，才是“苏北难民”这一武器大显神通。“苏北难民”这个资本之外，第二个资本是“自卫”。这一周来宣传苏北共军如何如何“进攻”，如何如何“威胁”京沪，如何如何上海戒严，如何如何下关兵舰脱了炮衣。而把他们真正的进攻，则说是“反击”。这个“反击”可以活用无穷，小之可适用于如皋高邮天长，进一步则可以用之于淮阴淮安，再进一步对任何解放区都可以“反击”了。

宣传离开了事实，就没有力量，而且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南京外籍记者一周来曾两次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允其赴江北前线，实地看看中共军队如何“进攻”，然而他们都被拒绝了。他们很了解国民党的“自卫”为什么怕新闻记者参观。这就暴露了不可见人的“自卫”秘密。

这一周国民党系报纸以南京中央日报为首所阐扬的陈立夫先生“割盲肠”的理论，倒也有“坦白”可取之处。因为公开把共产党看成“盲肠”，根本就把国民党有时也挂挂的“民主”假招牌，赤裸裸地拆穿了。因为既然是“盲肠”，随时都可以“割”，如何谈得上党派平等合法、民主团结？这个理论不正是谁发动内



战的最好说明吗？陈立夫先生后来对此虽手忙脚乱有所辩白，但他并不根本否认“割盲肠”的理论，不过，加上“要得病人同意”的掩盖，更加多一个漏洞而已。

另外一个妙论，是七月二十日申报载潘公展先生的谈话，他说“翻开中国二十四史看，只有平内乱。所谓内战只有美国南北战争方可称之。”在内战正紧的现在，潘先生在他主持的申报上发表这个见解，当然是和“割盲肠”一样为内战辩护的。既然是“平”内乱，谁打谁不就更明白吗？潘先生此语不知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置于何地？反袁世凯的战争置于何地？孙先生召开非常国会，开府广州等，岂不都是“内乱”，应当由清皇帝和袁世凯来“平”吗？

内战责任是很明显的。这里随便抄一段国民党报纸公布的材料，就足以说明所谓“自卫”的内容。下面是开封中国时报七月三日一个广告：“铭谢商邱六十七后方医院。伤者系河南省保安队豫东总指挥奉令扫荡（注意系“扫荡”——记者）河南太康一带奸匪……”这总不能说是中共一贯“造谣”吧！

再举一例子。七月二十日上海侨声报消息，宪警于十七日清晨在复旦大学捕学生，有人质问他们为什么捉人？他们答道：“因为他们（指被捕二学生——记者）是反对内战的！”那只有拥护内战、主张“平内乱”的人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了。

国民党好战派一面放手打内战，一面又摆出要主动“还政于民”的样子。说他们早就要“实行民主”，都是因为共产党捣乱，所以不要再和共产党谈判，不要再和民主党派协商，国民党单独办就好了。当司徒雷登大使十八日与马歇尔将军同飞庐山以后，十九日中央社就传出时局“二三日内有重要发展”的消息。也就是风传一时的所谓蒋主席将发表重要文告。这个文告到现在（二十四日）还没有发表，而就新闻界所传官方非正式透露消息，以及南京中央日报“敬告司徒雷登大使”这些社论的论点看



来，大概不过这些意见：（一）共产党问题仍用“政治方式”（？）解决，（二）扩大政府范围，（三）召开国民大会，（四）制定宪法等。不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同意不同意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决定要单独“行”的。假如这些内容不过如此，那么不过等于正在猛烈射击的机关枪上，蒙上一张美丽的桌布，欺骗中外老百姓而已。老实说，抛开了政治协商的方式，企图在专制独裁的实质上穿上一件民主宪政的外衣，摆几个非国民党人做“民主的花瓶”，这不但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而且更促成中国之分裂。这种所谓“主动性”是会给国民党自己造成严重后果的。

马歇尔将军二十二日返京。有些人希望以马歇尔为桥梁的谈判能早日恢复，希望能从谈判中谈出些道理来。但是南京的权威观察家们却把注意力放在另外的因素上面了。首先是苏联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发言到什么程度？如二十二日莫斯科电台广播表示：“苏维埃共和国之一致意见，认为切实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此其时矣。”是不是苏联从此有进一步的外交行动？第二，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在美丽的外交辞令里面，有些具体的促进中国和平民主的有效行动？第三，被美国武装起来了的好战派已经发动起来了的内战，是否能如如皋战役一样连续受到有力的真正的反击？第四，人民和平民主运动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如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二十二日对新闻界发表的震动国内外与国民党内外的谈话，是否有广泛之共鸣？如果没有这些有力因素的推动，内战只有扩大，不会停止。内战不停，一切谈判都是徒然的。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



渺茫的庐山（南京一周）

（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路透社记者坎培尔Campbell先生访问周恩来将军，问“中国的政治气象如何？”周将军笑应曰：“请你去问庐山气象台。”

的确，这一周来，中外观察家都眼望着庐山，二十几个中国记者死守着庐山，有些外国记者也追随着外交人物的来往，仆仆于京牯之间，总以为会有什么结果。有些人则揣测时局会像一九三七年抗战高潮到来一样，蒋主席又会顺应时势，发出和平建国宣言。有些人总幻想着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的皮包，以为一定有什么他们所希望的方案，只要在牯岭几度“郊游”与“拜访”之后，就会有惊人的成就。

今年庐山气候变化特别大，忽晴忽雨，司徒大使病了，蒋主席也伤了风。从南京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庐山的政治气象台一时也作不出“天气良好”的报告。因为有几股飓风吹向庐山，使庐山一时不易晴朗。

首先是以苏北为中心的內战之风，越吹越大。美国“援华”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锐利武器，已经全武行出马。单以飞机来说，南京中外人士每天看到南京大校场飞机场起飞的飞机，装备了机枪子弹和炸弹出发，到苏北的城市和乡村投弹扫射自己的同胞，然后空着肚子回来。苏北好多城市，每天要遭几次轰炸。官方虽然不宣布这些“英勇”的作战成绩，而知道的人也逐渐多了起



来。有些空军人员也怀疑起来：“这是干什么呢？”很多美国人也反问起自己来了：“这就是援助中国的目的吗？”美国人民的舆论，开始对于这些事情哗然了。“内战之风”这一周简直是放肆的吹，正照着彭学沛先生二十七日在上海谈话所规定的方向，逐步吹遍华中华北和东北。

第二是以昆明李闻惨案为标志，是疯狂的暗杀之风。这股风势太大，使昆明美国领事馆不得不作为临时的避难所。虽然这个案子还没有经国民政府发表调查结果，与此案有关的委员们纷纷上庐山研究，可见风势不小。照昆明市原来流行的“谣言”，说李公朴由渝带昆有四十名特务，携活动费四万万元；闻一多为暗杀团团长；李公朴被命名为“李公朴夫”，闻一多为“闻一多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又一流言说：杀闻一多者奖洋五百万元。以及杀李后，从坐吉普车的“群众”在四处散放的传单上所谓“杀李公朴者为共产党”等看来，好象这笔账本来打算写在中共账上。忽然风势一转，这一周又紧紧吹在云南地方人士身上。经过南京某个民营报纸首先透露这个“消息”，于是中外新闻机关就辗转刊布评论起来，绘声绘影，似乎案情相当“复杂”了。逼得军事参议院龙云院长发表声明“静候政府调查”，采取了保留态度。这对于有枪和无枪的云南人，都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调查结果发表后，这并不是一件影响很小的事情。有人说，被捕的杨立德已受过电刑。而民盟的调查代表梁漱溟先生等被拒绝参加政府调查之后，只好准备单独去调查，现正待机出发。这股风吹得如何结果，是非同小可的。有一位美国很有名的学者，最近很想去昆明走走，而当局却只同意他到重庆和成都去，大概就是昆明风势太大，恐怕不是久经锻炼的军政要员们所能受得了。

庐山天气不好的另一原因，是北美洲吹来的风势不正，最近几天，虽多了些和风，但暴风也不少。这种风和前两种风混在一



起吹，当然还吹不出好天气来。这股“美风”本来的力量很大，可以左右中国的气候，可惜和风未占上风，尚不能有助于中国天气的澄清。

到底现在不是闭关主义的时代了。中国的局势和世界的和平不可分割。全世界都和平了，只有中国还在内战，这个局势恐不能为和平的世界所能容忍。二十九日在巴黎已开幕的和平会议，虽然规定只讨论几个轴心附庸国问题，但是世界的视线不会逐渐移向中国来吗？

为了蒙蔽世界的耳目，这次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国民党政府当局以不诚实的方法，拒绝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他们说：这次和会不是邀请各国代表团，而只是由每国一个人出席。现在证明完全是扯谎！中国在巴黎不是已正式成立代表团吗？这样的欺骗方法，能得到国内外的同情吗？

庐山的温度低于南京。应当有助于冷静思考这些南京普通人所能想到的问题。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二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出版）



“等”时间（南京一周）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六日）

国民党当局对于目前时局的真正态度，我看再没有比本月二日彭学沛在庐山对记者们的简短谈话说得真实了。他说话的基本要点是蒋主席对于国内问题仍用“政治解决”，而要执行“政治解决”，需要给蒋主席以“更多的时间”。他要大家不要急，要“等待”。这和蒋主席劝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忍耐”一样，很有象征的意义。

国民党当局“等”什么呢？他们说等“政治解决”。但是如果分析分析国民党当局的实际行动，则知道他们不是等待什么“政治解决”，而是等待相反的东西；他们希望有充分时间，来实现他们的计划，把中共从所有铁路线及苏北、承德、哈尔滨、安东等地区赶走。

七月二十九日发生的安平事件，明明是美军巡逻队侵入解放区，责任本来很明白，从国家主权上说，国民党政府应向美政府提出抗议，而国民党当局不此之图，反而兴风作浪，惟恐事件不扩大。许多人对此不了解，其实，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分子正是这类事件的挑衅人，他们企图以此挑起美军和他们一起来向我冀东进攻，鼓励美国正式牵入内战漩涡。美国人如不警惕，还会要上当的。自己大打还不够，还企图拖美国下水，这算是希望“政治解决”吗？



从军事上看，这一周来不但中原、晋南与苏北战事日益扩大，山东南部又于三日发动了六个军的大进攻，热河大战亦已爆发。二日竟至轰炸延安朱德将军司令部。这就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这不是与“政治解决”背道而驰吗？

从宣传上看，庐山力行日报三十日所发表的社论“纠正大公报的卑怯心理与荒谬论调”一文，是不平凡的。这篇社论是批评大公报七月二十七日“国际干涉之渐”那一篇社论，公开表示反对三国公告。读者想必记得，三国公告是接着杜鲁门总统声明之后发布的，其基本精神都是要中国结束内战，实行民主，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马歇尔特使便是来到中国执行三国公告与杜鲁门声明的。中共一向表示拥护与欢迎；国民党一向对杜鲁门声明加以曲解，而对三国公告默不作声，现在公开表示要反对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力行日报的这篇社论，是经过蒋主席亲自审阅过的！

这就很明白，国民党当局仍然决心进行“军事解决”，他们不惜以一切代价，换得美国对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的支持，而反对根据三国公告精神的调解。他们要以内战来彻底解决国内问题，也就是要以内战来阻止国家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大势，要把中国保留在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之下。但是对反动派不幸的，是他们处在和平民主的时代，国际与国内强大的和平民主力量，使他们不能不预感到长期内战的危险，因此，他们特别需要“时间”。

“时间”诚然是中国好战派所要求的重要东西，然而在全中国烽火、内战绵连、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全国人民度日如年、急需和平的时候，好战派如果一定要坚持内战下去，全国人民对反动派仇恨的程度，也将随“时间”而增加，更将动摇反动派的基础。所以“时间”对于中国反动派不一定有利。

反动派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在没有明确的无条件全面停战



前，他们一切的“外交谈判，也都是为了掩盖他们制造内战”，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进行内战的时间。读者需要把表象与实际分别来看，才不至上当。

六日美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变，而且为美军驻华的理由，添了个新根据，说是为了“保护交通”。这个新理由的运用就广泛了！这说明美国军队不想走，他们也在等“时间”！

为中国人民计，为世界和平计，中国内战的局面必须早日澄清，不能拖，不能等。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太多了。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三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出版）



时 局 的 激 流

马歇尔特使与司徒大使联合声明的发表，正是周恩来访晤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亦在座）之后三小时。这一联合声明的出现，震动了中国期望和平的忧心忡忡的广大人士。虽然近来这一严重而危险的局势，已经愈来愈令人们忧惧，但马歇尔司徒大使联合声明之突然出现，像一阵骤雨，打碎了人们的一线希望。

马司联合声明 庐山不感惊讶

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之出现，是来得出人意料之外的，但是只有庐山的反应是：“并不感到惊讶”。还有那位曾经落水与汪精卫合伙过的陶总主笔希圣，真不愧为“圣”，而且是稀有之“圣”了。他在牯岭向记者表示：“更严重的声明，还在后面”。究竟这更严重的声明是个什么？谁也无从测料，盛传马歇尔特使将来一安平事件声明，可是尚未出现。今天出现了的却是蒋主席的赫然文告。这位汪家班老伙计在牯岭羽扇纶巾，究竟他指的是其中那一个，当然更无人能知道。然而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马司声明发表后，人们普遍存在的那焦灼疑虑与悬测的不安情绪，在牯岭，似乎是已经早有所料，因之就无啥惊讶而坦然得很。

时局的激流，流向何方？今天已经毫无怀疑余地。蒋主席已决心为“和平”而作战，为“遵守”并令中共“遵守”一月十日



停战协定而作战了。战局将更要蔓延扩大，政治上的分裂将更向前迈步前进，蒋主席已宣告：国民大会一定要如期召开。

时局的激流流向全面内战，全面政治分裂。马司联合声明正是这一局势的必然产物，同时，因与果本来不能细分，马司声明可说是这一时局激流之果，也可以说是这一时局激流之因。

新方案搁了浅 旧账还要先算

从“因”来分析，六月的紧张谈判，由于中共的一再让步，谈判的一大部分，有关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及整编军队都已达成协议，但最后在整军问题中的驻地及地方行政权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要求已达协议的先签字实行，遭国民党拒绝。而这时马歇尔特使的调停却也日夜奔忙，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困难何在，他提的折衷案被蒋主席拒绝之后，他是失败了。深知政局的人，则为马歇尔特使惋惜，认为无论如何不应使谈得这么久，而又大部分达成协议的一次谈判，如此轻易弄得全功尽弃。但失败是已经无可挽回了。这一僵局之形成，测量了美国调解人的地位已渐渐减少了作用，马歇尔特使渐渐变为一个传达双方条件的绿衣使者了。

七月初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这是魏德迈已在整装要来华履新时的突然事件。这象征着马歇尔特使行将在幽谷绝处另辟蹊径。司徒大使离平前向人表示，他很有兴趣于促成联合政府的出现。人们沉重的心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七月底司徒邀晤了周恩来，马歇尔往庐山前亦约晤了周恩来，敏感的观察家，判断有新的道路在拟议。尽管谈判的各方面当事人是那样守口如瓶，然而从中共代表团人们的口气，也可推断出中共方面是在期望着马歇尔司徒大使的下山来京。

马歇尔司徒大使可能有新的方案带往庐山征求蒋主席的同意，这一推断是不错的。报纸上盛传司徒大使将以停止冲突改组



政府为新方案的中心，南京的新闻记者是很厉害的，我们相信这决非捕风捉影之谈。老老实实，照客观事态发展来说，也只有这一可能。因为密迹南京的苏北正打得激烈，任何调停，停止战争是第一步，所以停战决不会不提。其次，六月谈判的僵局，主要僵在中共不驻兵区域地方行政权问题上，这显然已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就是一个再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的头脑，也会想到从改组政府着手，是打开这一难题的一条道路。据说司徒计划中曾有一项，如能照这方案来做，则产生一个国共美三方的小组来详细商定实行办法。这虽是传闻，但按之重开政协为国民党所厌恶的事实，美方谅也可能提出这一办法。

上述的方案，一到庐山就起了阻碍。蒋主席回答司徒大使的是：一切可以照办，停战也可以，改组政府也行，但有三个前提，五项条件，如这三项五条为中共所接受，则皆不成问题。五项条件是什么呢？各报已有披露，即是中共退出苏北、热河、胶济路，东北先退出黑龙江、兴安两省加延吉之外一切地区，同时退出六月七日后中共所占地区以及恢复交通等等。换句话说，就是把六月底谈不拢的，被中共认为无法接受的军事要求政权撤退连本加利一起提出，作为停战的前提条件。这一要求苦恼了司徒大使，因为他的计划（当然在马歇尔指导下）原先是求绕一个弯来打开僵局，而蒋主席所提的前提条件，却是依然要把旧账拿来先算。

令人惊异的不是蒋主席会仍然坚持他的要求不变，而是司徒大使能带着（连马歇尔都已经在六月间打不开的难题）这样三项五条下山来南京与周恩来进行商谈。其次，令人惊异的不在中共之坚决拒绝，因为中共早已拒绝了，如果中共能够忍受的话，六月底的谈判，不至僵化了；而在随司徒大使返京与中共代表谈商已僵之后，马歇尔特使由牯岭飞返南京，也是毫无其它表示。听说马歇尔司徒大使发表联合声明的那天上午，周恩来第二次拒绝



了这五条苛刻的要求。这是惊人的发展，这像是进一步说明：调停者实际上成为庐山来使，尽管调停者并未有丝毫表示。调停者的态度正如联合声明中之态度，只是说明了局势，而无是非的评判与主见了。不仅如此，照客观形势是“要末接受五条，要末失败，没有其他道路”。说来，又近乎把压力向中共的头上压下来了。

国民党的反动派，早已看准了这形势，他们觉得打下去，打得更大，也不会有人干涉。力行日报不是早已痛骂了“国际干涉之渐”而以英雄姿态说出“革命者不怕干涉”了吗！？

调人地位低落 大打形势已定

马歇尔司徒的联合声明，也是这一时局的“果”。

马歇尔司徒联合声明发表以后，许多人认为马歇尔特使将在表示了僵局难以打开之后走了。外国记者更是肯定地说：留下的问题只是乘船归国还是乘飞机的问题了。在这内战扩大的情势底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二条路，或者改变现行政策，那就是彻底的撤兵，停止军火进华，表示不干预中国内战。或者不撤兵，不停止援助，但却静观时机，让这局面拖下去再说。照目前情形看，美国务院已宣布“美国政策绝对不变”，那就是说绝不撤兵，绝不停止援助国民党，绝对不放弃独霸中国，何况从国际关系上说，美国更不愿承认调解失败，中国的事情美国今天绝不愿他国也来过问。因此，不论马歇尔回国不回国，他的调停地位确是很困难了。联合声明之不论是非，不谈美国态度，不说是否继续调处，凡此种种，都是证明。因此，联合声明之出现，又可说是目前局势之“果”。

但是不论是因是果，马歇尔司徒大使这声明，客观上的作用，已大大鼓励了好战派了。为什么？因为马歇尔（美国）已再不会对他们内战的“伟业”有所指摘或批评了。假若马歇尔果真



一旦在上述情况下回国，那末反动派就更兴奋了。他们可以大打出手，而无所顾忌，只要马歇尔不在中国，连马歇尔的面子问题也解决了。大打的形势确定了，政治的流，又是如何流法呢？

一股反动逆流 流向政治分裂

“美国对华政策绝对不变”，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实质说是不撤兵，继续支持国民党不变，这就客观上助长了大打。从表面上说，美国还是要重弹实行杜鲁门声明，要促成中国一个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府的调子。不改变的美国政策如此，国民党的政策亦然，实质上是大打分裂，表面上不改口地说一定是“政治解决”不变。这是东西遥相呼应。

因此，在短期内，许多人都不相信对解放区的进攻，会堂堂皇皇地下令讨伐。这正如今天美国反动派，决不能堂堂皇皇说要公开参加剿共。

政治分裂如何做？今天已经很明显的是片面改组政府，召开国民大会，这是国民党宣传机关“自动实行政协决议”，“主动实行宪政”的一贯方针。但是从目前情况走到改组政府和国大，好象还需要一桥梁，特别是在对付中共及要求民主的其他党派和人民，还需要有一套手法。譬如说，宪草就未曾修改呀！因此所谓百人座谈会、庐山谈话会就纷纷提议了。最可笑的是潘公展一手包办的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社论，真是开口人民，闭口无党无派，要求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庐山谈话会。他是那样的慷慨，而这正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大阴谋。据说庐山已在具体计划召“民间代表”去座谈了。

经过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的会议走向一党包办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分裂的道路，这是政治逆流的方向。

反动的逆流流向扩大内战，流向政治分裂。击退这逆流，今



天唯一可靠的力量，是人民自己。道路曲折而艰巨，但是逆流是一定要打退的。

（原载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新华日报》）



恶化的局势（南京一周）

（八月七日至十五日）

这一周，是中国政治局势更加恶化的开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马司声明，二、蒋介石文告，三、陈立夫曾琦等“人物”的活跃。

马司声明为一老练的外交文件，引起了南京人士许多方面不同的揣测。但有一点却极端重要，就是它与去年十二月杜鲁门声明不同，表示美国对于中国的内战局面，故作试探性的谈话。从美国对华外交文献讲，这是杜鲁门声明后一个很大的变化。事实上，自马歇尔将军第二次来华以来，美国两面政策的运用已开始离开其公正立场，而且这种转变已被国民党好战派所了解与利用，肆意破坏政协决议与放胆进行内战。马司声明中说到中国内战形势，已有“不能控制”之势。实际上，美国的“调处”，在其“援助”政策下，对于国民党好战派，当然不能控制，或者也不愿控制。美国对华的两面政策，被国民党好战派拖着一面倒，泥足愈陷愈深，去年十二月杜鲁门声明是光辉耀目，曾受全中国人民的欢迎。马歇尔第一次来华，对于执行杜鲁门政策，作得有声有色。等到马歇尔第二次来华，杜鲁门声明的运用就偏于一面了。马歇尔的调处成为无用，不再坚持政协决议与停战、整军等协定。对马司声明，许多人认为是美国公开表示，今后美国对中国内争，形式上为隔岸观火。据合众社北平十四日消息，司徒大



使曾表示，今后国共问题，应由国共自己解决。

是不是美国从此就不干预中国内政呢？不是的！马司声明还不明说美国从此就停止对蒋氏之援助，而真正让国共自己来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美国仍继续驻军中国，仍继续以大批物资支持蒋氏。这将造成什么结果呢？唯一的结果，是中国好战派可以更大胆放手地进行内战。

马司声明对于十四日蒋介石的文告是一大鼓励。蒋介石的文告，文章虽然长、好听的名词也不少，但他的中心意思却只有四点：第一是内战不愿停止；第二是专制独裁不能放弃；第三是不惜分裂国家；第四是愚民政策。

蒋介石看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弱点，他已有放手内战的机会，他就要准备内战的政治资本。所以文告的前一段把他自己统治下一切黑暗罪过，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照他那样说法，共产党非“打”不可了。可惜他用心虽苦，总是难以自圆其说。难道所有收复区都弄得乌烟瘴气，也是共产党搅的吗？层出不穷的大贪污案，也是共产党干的吗？滥发钞票、通货无限膨胀，使物价飞涨，也是共产党来印的钞票吗？听任美货倾销，使中国工商业纷纷倒闭，也是共产党做的吗？这些“理由”恐怕除了顽固分子及头脑糊涂者外，不会有人相信。然而他内战方针已定，信不信由你，他总算有了“借口”了。这是第一点。

“召开国大”，“扩大政府”，“实施政协决议”，这些都是好听的。问题在于国民党当局今后将用这些好听名词，来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法统，而继续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国民党当局所谓“革命法统”，就是“一党专政”的法统。所谓“不能动摇的国家之根本”，就是国民党当权派少数人的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其所谓“国大”，只能是“御用国大”。其所谓“宪法”，只能是“钦定宪法”。其所谓“扩大”之“政府”，只能添几个“民主”的“花瓶”。其所实施之政协决议，只能是等于



希特勒口中之和平。这些将全无丝毫实际意义，而且必然与民主背道而驰，这是第二点。

第三，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曾使中国走向团结。不用政治协商方式，就无法获致中国之和平与统一，历史事实已不止一次证明这一经验。蒋介石此次不从政治协商中求统一，而必欲片面强迫中共放弃其有功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军队，还认为是“对共党最低之要求”。那么，普通的要求就应该是消灭共产党了。这显然不是团结的方针，而是分裂的方针。

最后一点，所谓同胞努力方面，全是离开全国大多数人民迫切的现实要求，而发表一贯的伪善的空论，用来愚弄人民。这一套曾国藩式的手法，在抗战八年后的今天，对于战争中洗炼过的人民，是不能适用了。

所以蒋氏文告发表后，南京中外人士的普遍感觉，是中国时局更加严重了。蒋氏的文告，实质上是一个内战宣言，它指明了和平的政治协商之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武力统一”的悲剧。

时局第三个方面，是陈立夫曾琦等“人物”之活跃。陈立夫这样顽固的反民主反共的头子，在时局好转时，是一向放在背后，比较闲散的。只有时局最坏时，才是他飞扬跋扈的时候。一个月来，他亲自到上海指挥特务工作，阴谋分化民主同盟，想拉几个人来“扩大”政府基础。七日他那一篇谈话，真是锋芒十足，杀气腾腾。在陈立夫策动下，青年党曾琦等就发出了“狮子吼”（？）了。在上海销不到千份的中华时报，忽然在十一日发表召开所谓“息争谈话会”的主张，而十二日南京中央日报立刻加以响应。曾琦先生很快就奉召赴庐山，青年党在庐山的办事处也成立了。曾琦先生俨然一变而为时局之中心人物，所谓“教育部长”之说，已见之于官方报纸了。近来京沪报上纷传南京出现了青年党第二中央，想不会妨害作为“扩大政府基础”的重要



“脚色”罢。

有人放火，有人火上加油，有人来当啦啦队，大局当然愈弄愈糟了。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四、五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打，骗，拖！（南京一周）

（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从八月十日马司声明及十四日蒋介石文告之后，时局是“坏”定了！不幸的内战是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了！同时经过八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发表“评马司声明”，十六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后，从国民党当局以及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看来，时局的特点，除了“打”是基本之外，还有“骗”与“拖”。不过，“骗”与“拖”都是为了“打”。因为有“骗”与“拖”掩护着“打”，就使得许多人眼花缭乱，不知是真打还是假打，是大打还是小打了。

这一周多的经过，是内战越打越大的过程。二百万以上的陆军，全部的空军，部分的海军都开到了内战前线，所有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甚至于化学兵种都一齐搬出来了。两位好战的打手陈诚和胡宗南都亲自到内战前线指挥。胡宗南于十七日飞山西运城，而陈诚则于十九日亲自到郑州、开封、徐州、济南、青岛各地“巡视”，其余象傅作义、杜聿明、李默庵这些打手，也在飞来飞去，调兵遣将，内战的烽火已在广大中国领土上燃烧起来。陈诚、白崇禧和邓文仪等也公开出来承认内战这一事实，而居然夸耀他们“戡乱”能力与进行内战之“好看”了。不仅前方大打，后方也在加紧压迫，国民党政府刚下了保护党派人士的命令，十八日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又在成都被打了。



从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当局发动苏北内战到八月十五日一个月中，单以苏北一个战场而论，国民党军即被消灭了六个师（现改为旅），大批美国武器到了新四军手中。好战派预定四个礼拜打下苏北，然而四个礼拜过去了，好战派的头目还只在苏北的外围兜圈子，苏北坚如磐石的军民，却已赢得了胜利。八路军在陇海路上战役迂回的胜利，立刻搅乱了国民党军在山东与苏北的内战步骤。山西我军对同蒲南段的与正太路的阻击，迟滞了胡宗南由晋南北上的内战之师。这都说明国民党军在大规模内战中，并不如他们自己理想那样顺利。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陆军次官彼得生等又来南京，接洽将太平洋美军大量剩余物资，卖给南京政府。这个谈判的本身，就是对于国民党好战派一种极大鼓励，似乎美国有一批人，唯恐国民党当局内战决心不够坚决似的，总是在紧要关头来为好战派撑腰。蒋介石因为已有五十七个美械师以及日本投降后所得美方大批作战物资，所以才敢打这样空前大内战，如果再给以大批作战物资，内战的火焰，必然烧得更大了。

到底现在是民主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内战到底是丑劣的罪行，无论“放火者”和“加油者”，都不能对于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也就是广大人民的公意，毫无顾忌。因此总不能光明正大地“打”，不能不使用些遮眼法，把好战派的丑恶掩盖起来。而且在国际与中国国内都有强大民主势力存在的今天，“打内战一定有把握”这样的肯定结论，恐怕好战派的头子自己也不易说出口来。因此，在“打”的同时，不能不留一条失败时的退路，因此，与“打”并行的是“骗”与“拖”。

“骗”与“拖”就是八月下半月一切谈判的本质。

蒋的“八·一四”文告，其表面文字，大部都为骗人与拖延时间而发。八月十四日之后，牯岭也好，南京也好，官方都不断放出乐观空气。八月初官方宣传甚力的“庐山谈话会”，本来声势赫赫，似不惜分裂，准备以曾琦之流为骨干来“民主”一番。



后来看看各方坚决反对，开起会来不过弄些国民党员来听训，以及让曾琦之流多发表几篇又酸又臭的文章，因此也就顺水推舟，不了了之。接着，便搬出所谓“改组政府”的花样。

马歇尔将军十五日四上庐山之后，廿日与司徒大使同时返京。各方纷传蒋已有新方案，可以先谈改组政府问题。于是“国府委员会”等，又争传各报。等到真正具体谈判时，连谈好改组政府，是否立即停战，以及是否不再提“五项要求”这些基本问题，国民党都支吾闪烁。证明这套“改组政府”花样，又只是“骗”与“拖”的改头换面而已。马歇尔将军不能不于廿三日五上庐山。

马歇尔将军四上庐山后，即传宋子文氏将参加谈判，果然二十二日宋子文先生约周恩来将军会面了。一般人以为宋氏身为行政院长，等于外国的内阁总理，他来谈判，表示国民党当局要解决问题，正如六月谈判失败后，七月初的五人会谈中，陈诚将军参加谈判，对外也标榜“要解决问题”一样，给人以很大的幻想。谁知在实际上，宋氏乃以私人资格，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他（行政院长！）并非政府正式代表，而只来随便谈谈。而南京中央日报却在第一条新闻上大字标题为“时局将有大开展”了。

马歇尔将军已于二十七日返南京了。看下面一着是什么新花样吧！

骗来骗去，当然可以“拖”一个时候，让广大人民把希望都寄托在无内容、无结果的“谈判”上，以便利好战派的内战。但是，世界无永久可骗人之事，也无永久可骗之人民。内战打得如此厉害，要拖着，敷衍也敷衍不了。周恩来将军二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就揭穿了时局的真象，也鲜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今后将是谈判的其他方面表明真正态度的时候了。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六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绝 路（南京一周）

（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

在南京这个政治舞台上，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这一周来正加速推动自己走上不通之路。

南京政治界近来普遍流行一个神乎其技的政治寓言。凡是听到这故事的人，几乎没有不从心灵深处放声大笑的。即使是当事人，也不能不会心地微笑。故事是这样：美英中苏法五强打麻将，前四圈美国“做梦”，中国大输。第二个四圈，中国做梦，美国恰好大赢，于是中国分了些梦钱，颇为满意。第三个四圈，美中两国都上桌，美国作中国上手，美国因已赢得不少，自己不想和牌，于是不顾一切，放牌给下手中国，以图收买中国。但无论美国如何放牌，中国总是和不了，仍然输得很凶。后来上手美国急了，把中国的牌翻开来看，原来中国在作清一色！

问题就在于中国政府不顾一切，埋头作“清一色”，而美国政府的政策，虽明知国民党在作清一色，而且也知道清一色一定不会成功，而仍然拚命放牌。国民党看准了上手总归会放牌，也就更加决心作“清一色”。

国民党当局所作的清一色，当然就是少数人的独裁专制。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问题，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就是一切为了“清一色”。单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愿意谈“改组政府”了，好象并不想作“清一色”。也有些人以为改组政府是一剂万应灵



药，只要改组政府谈好了，一切都可以解决了。这些人却没有很好想想，为什么国民党不肯公开保证，在谈好改组政府之后，下令停战和放弃五项要求？假如不停战，试问“政府”如何“改组”法？是不是想骗“异党”的领袖们到南京，以便一网打尽呢？既然愿意改组政府了，当然不能反对和平建国纲领，当然不能反对地方自治，当然就不能反对国共两党军队同时都要整编与统编，那么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坚持五项要求呢？有些人认为中共又坚持条件，不错，为了真正能解决问题，中共不能不坚持上述的条件。而且我们一向如此坚持，并不是今日才发生的所谓“枝节”。

国民党当局这次对“非正式五人小组”特别热心，而对于正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却拒之如毒蛇猛兽。政府代表之一的张厉生先生把他平时坚持警管区制的态度换了满口“和谐”“融洽”的面孔，而吴铁城先生一面宣称“只等通知开会”，一面却对中央社声明只奉命谈改组政府问题，而不及其他。美国大使馆方面，也一再声称“只等周先生来开会”，而却忘去了周恩来将军在讨论司徒雷登大使的非正式小组建议时即已再三强调提出的停战保证问题。这是政治上的健忘病呢？还是美蒋两方面有计划的政治欺骗呢？

少数人独裁专制，无论如何办不好事情。南京十二家报纸联合停刊一日也正说明这一点。国民党最大的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对于南京各报也正在作“清一色”。中央日报公开宣布在一年之后，南京各报已纷纷合并，而中央日报自己则已“用五架飞机送报”；为了打击各报，就不肯参加南京各报联合会，不肯受这个会的约束；又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乘物价飞涨，各报困难之际，实行了高工薪政策，各报一再要求调整，也置之不理。因此引起十二家报纸的共同抗议。这十二家中大半是官报及半官报纸，但是照中央日报的清一色梦，不但对民间报纸不能相容，就是对于这些官报和半官报，也要把他们并掉。



中央日报一周来的言论，表现国民党当局走的路，越走越窄。中央社捏造了一个所谓“解放区工作大纲”，于是中央日报连做了几篇社论，大骂共产党，公然称共产党是“敌人”，是中华民族以外的政治集团。把他们捏造的“大纲”说成是“侵华计划”，说成是“田中奏折第二”。这不是存心分裂中华民族，杜绝团结之门吗？

美国政府及其在中国的代表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在这一周中，声誉损失甚大。西太平洋美军剩余物资价值共达八万万二千五百万美元之大借款，就是美方给自己画的丑恶像。因为内战正日益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好战派在军事上初步受到打击的时候，这笔大借款，对于中国内战当然是很大的鼓励。彼得生来华后，中共曾向美方严重抗议，但毫无效果。这就使普通人也不得不怀疑，马歇尔将军与司徒大使是否真正是调人了。

美国政府露骨的一面倒的政策，必然使得美国驻华军队等更加暴露其横蛮性、征服性。此类事证，各处皆有，毋庸举例。

今年“九三”胜利纪念日，和去年相比，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差。近百万人的南京城，在今年的“九三”庆祝会上，只到了寥寥几百人，而汽车却摆了一大片，为了装装门面，主席台上叫到会群众“站稀些”。但是偌大一个公共体育场，无论把几百人如何安排，总是太“稀”了。这不过一个例子，却充分说明广大人民对于国民党当局和美方十分失望。

停止内战与停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南京各报的“九三”征文中，也表现为大多数人的要求。

九月四、五两日，周恩来将军与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举行重要会晤，虽在上周末马歇尔将军六上庐山之前，周曾郑重告以中共停止内战的意见，而此次会谈后竟毫无结果。时局现已不能发现任何乐观迹象了。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出版）



“拖” “骗” 已到尾声了

国民党当局的“以谈来拖，拖中大打”的谋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在几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把它揭露了。

从八月十日马司联合声明发表，十四日蒋介石文告出现以后，全世界全中国爱好和平人士已对中国的和平丧失了希望。但是尽管在人们看来谈判已是山穷水尽，可是似乎绝处逢生，经过司徒大使的提议，改组政府的谈商又蹊径别开，谈判的前景好象又开朗了。“大局微妙”，这是沪上某报的标题，这种极微妙的演变，确令局外人士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但是仔细一想，道理也很简单，这只能怪人们对“拖字”诀仍然了解不够。由国共美三方组一非正式五人小组来商谈改组政府的具体问题，这是司徒大使的提议。八月二十日周恩来与司徒大使会晤，在司徒大使热心而充满希望的渲染了商谈改组政府问题的乐观论调之后，听说周恩来向司徒大使表示说：政府并无诚意解决问题，不过中共为了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对这一个明知道没有解决问题希望的商谈，仍愿参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的是使人们知道中共是坚定不移希望和平。同时又听说周恩来当时并向司徒大使表示，中共要求在谈判改组政府问题以前，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谈好了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放弃五条，不再提出？二是谈好了改组政府之后，国民党能否保证立即停战？假若这二点没有保证，那末谈政府改组将是气力白费，仅仅便利于国民党的“拖”，



这就毫无意义。

八月二十三日马歇尔五登牯岭。牯岭传来消息：马歇尔特使正与蒋介石磋商改组政府的问题，但也有消息传来马歇尔特使是主要为剩余军用物资出售事，去与蒋介石谈这笔生意经的。事后判断两样任务都包括其中。

八月二十七日马歇尔特使从牯岭返京，据说他已说服了蒋介石来商谈改组政府，而且已由蒋函告宋子文，推选出席的代表。二十八日晚间国民党中央会也推出吴铁城张厉生为非正式小组的代表。但是周恩来所最关心的两项保证呢？没有下文。而国民党负责者的态度却愈来愈明显了。廿八日外籍记者招待会上，彭学沛宣布：“所谓五条要求，既非条件，亦非要求，而是需要；所谓停战，一月十日已颁停战令，只要中共不打，就不会有战事，故无须再颁停战令”。这样，彭学沛象一个非洲沙漠王国的哲学家又兼中国市井赖皮的双重性格，回答了中共两个保证的要求。而且彭学沛这一点宣布，是二十七日晚庐山专机带来的指示。据我们知道，彭学沛在头一天尚打算对此两难题用含糊语句搪塞的，由此更可知牯岭的气候。

二十九日马周见面，周恩来不放松的提出这两个保证问题，他列举事实来证明国民党存心不放弃五条件也不停战，表示不取得这两保证，谈判一定无结果，即使有结果也起不了作用。周恩来将军要求马歇尔特使从蒋介石处获得对此两题的明确意见。廿九日马周的会谈尚未谈完，卅日马歇尔特使又六飞牯岭。国民党的两员代表也飞牯岭请示去了。周恩来将军卅日晚上又去访了司徒大使，又一次表示了对停战保证的必需。

国民党吴张两位代表九月二日由牯返京，停战保证的消息还是杳然。在牯岭时，吴铁诚和张厉生对记者说：他们只谈改组政府，不谈其它条件。回到南京告诉记者也说：只谈改组政府，不涉及其它。这两位代表的唱做功夫很到家，整天唱着“和谐”“诚



意”，九月三号下午又冒炎热亲登梅园新村访周恩来、董必武，但是谈到停战保证，则诿为“只奉命谈改组政府，军事问题未在权限之内”，轻轻避开了。四日下午陈诚招待记者，又回答记者说：“停战吗？一月十日已下命令了，只要共产党不打，就停了，何必再来一套命令”？又是唱的彭学沛从牯岭带来的老调。“五个要求吗？没有要求，政府从未提什么条件”，又是老套。

不论彭学沛或陈诚的道白，不论吴铁城张厉生的动人唱做，在人民面前，只能再一次证明国民党无意停战，唱改组政府这台戏乃是打诨，拖延时间。周恩来将军早已指出，国民党是企图以谈判的和平烟幕，来掩护其内战，获取美国的帮助。尽管嗓音与做功不好，然而不肯停战的调子，实在是令观众刺耳，愈唱反感也愈大了。

以谈判来掩盖内战，获取美国帮助的事实，无情的证实了。八月三十一日八亿五千万美元的剩余军用物资转让，签字了。周恩来将军九月一日赶到上海，在机场上看到柏德逊的专机正于买卖成功后振翼起飞。这件事大大引起周恩来将军的愤慨。在这次改组政府的商谈中，美国调停者，满口和平的辞句，在这无情事实之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究竟是要中国和平，还是内战？已经到不能不问问清楚的时候，含含糊糊这样“拖”，中共不愿再上其当。

周恩来将军三日下午飞返南京。这时的南京，由司徒大使安排正在“张灯结彩”，要开“谐和”“诚意”的五人小组会。吴张更是早已练了不少时间嗓子，南京的新闻记者们忙得满头大汗，在采访五人小组的消息。他们不知道，这台戏并不容易唱，因为中共不是来唱戏的，中共是要解决问题。停战既无保证，美国又一下给国民党投入可供内战三年的物资援助（据联合社消息），不弄清楚，中共是不愿再上当了。中国人民也岂愿见这无谓的表演？！



但是从司徒大使到国方代表都已作粉墨登台的准备了。三日下午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去访问司徒大使，据说司徒大使象一个慈祥的圣诞老人对待小孩子一般，表示说：政府已暂不提五条了，停战吗？只要改组政府一谈好，一定可以停的。美国物资吗？联合政府一成立，岂非中共也可分享了吗？这个慈祥老人的话是很甜的，只可惜整个华中、华北的原野，已被二百万手拿美国武器的“英雄们”搅得血流盈野了。这决非“暂时不提”，“一定可以”能救他们的燃眉之急啊！

那个被称为中国的外国顾问之顾问的傅泾波先生，在九月二三两日，还是兴致洋洋的。他以自得的神气，告诉往访的新闻记者说：五人小组会的程序我已排好了。然而到了四日，形势不同了。他埋怨南京的记者们老是去追问中共所提“停战保证”怎么办，他说：你们别再问这个了，愈问愈使中共态度强硬。

马歇尔又回到南京了。这次未与司徒大使谋面的周恩来将军，四日下午四时，又出现在宁海路马帅行馆。周恩来要问的，大概仍是停战保证与美国真正意愿吧！四日傍晚，一个外籍记者说：中国今后五年的命运，决定于今日马周的见面，决定于马歇尔特使能否从蒋主席处携回停战的保证。没有这个，中国悲惨得不堪想象。

四日晚上，许多新闻记者参加了刚从各线指挥作战归来的陈诚将军的招待会，听了陈将军战事将蔓延张家口的“和平”福音回来，皆出现在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探问马周会晤的消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宣布：“局势异常严重，商谈仍无结果”。

看这样子，国民党既不愿停战，而中共却也不愿被牵着来演戏，大局真正到了应该明朗化的时候了。无意义的演戏，实在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这台戏唱来唱去，中国人民的灾难还是丝毫减轻不了呀！

（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新华日报》）



歧 途（南京一周）

（九月五日至十一日）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将军与马歇尔将军晤谈后，许多人所幻想的马将军七上庐山的神秘，已完全不存在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此次马周会谈后之公告谓：“停战仍无保证，局势依然严重”！的确，中国局势，由于国民党法西斯派之一意孤行与美国之错误政策，中共与中国人民不能不被迫考虑最后的决策了。

这一周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八月六日周马司三人校正关于“非正式五人小组”问题的谈话记录，表示谈判过程中新的性质。即中共已看清“太极拳”式的谈判，只是国民党当局的“拖”与“骗”，而不能解决任何迫切问题，因而中共已表示不能再行无限度的忍耐，而要求谈判的有关方面表示明白的态度了。

国民党法西斯派对于和平谈判，早已是敷衍，而重点在于拖美国下水：第一步以自己大打内战拖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第二步拖美国经过中国内战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自己腐败老朽的统治，寄希望在美苏战争中，在美国卵翼下，求得其奴才式的出路。为了要勾引美国下水，美国要求海陆空各种权利，固然“慷慨”贡献，就是美国不要的，也要揣摩意旨，殷勤奉承。在他们头脑里面，“美国等于一切”，“有了美国就有了一切”。比如十一日京沪国民党报纸有不少夸耀着中秋节（十日）京沪商场没



有发生大的倒闭风潮；就是因为有了美国八亿美元以上的所谓“剩余物资”借款。国家银行因此敢于放出法币一百亿以上的贷款，给中秋节日大批风雨飘摇的工商业，暂渡难关。这一个观点就形成了国民党敢于放胆打内战的基础，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盲目相信国民党好战派能够打下去的根据。好战派看到中共于八月二十八日放弃承德，又看到大同之战将近两周还没有结束，于是更加相信美式装备的“力量”。

当着好战派迷信着“美国装备”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希望以谈判来真正解决什么问题。

国民党报纸近来宣传的中心，更加集中在挑拨美苏关系，而挑拨的重点又在中共与苏联关系上面。他们极力要“制造”许多“证据”（如所谓东北局秘密文件之类），证明中共不是从中国人民中生长出来的，不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而是受苏联指示，为苏联之利益而活动的。这些话很能令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听得进。

美国对中国的两面政策，越来越露骨而只顾一面了。除了八月三十一日签字的所谓剩余物资让予合同外，三日美陆长柏德逊公然说：“美军驻华，甚为正当。”美驻华舰队司令柯克少将九日在平表示：“美海军留华任务，在于训练中国海军。”这就等于说无限期地驻扎中国了。

七月二十九日安平事件，美方还未等调查完毕，即大叫大闹，而八月三十日承认小组被国民党飞机扫射，美方亦有死伤，却未闻美国方面有何意见。这些事实使人不能不对于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的调处使命难于了解。六日延安发言人公开质问马歇尔将军和司徒大使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未见美方的公开答复。

很显然，美国还企图保持有利的调人地位，而放弃了原来公开宣布的调处原则。这一个调人地位，能使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



在中国有更便利的条件，来扩张其势力。

当着美国的政策益加偏于支持国民党这一方面时，美国已准备如何推掉调处失败责任的步骤。马司声明与非正式五人小组就是有这样的意义。

中国人民已经到了要问清楚谈判三方面的态度的时候了。

中共始终坚持立即无条件停战，至少首先取得停战的保证，然后谈其他。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绝对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这是最入情人理，实事求是，诚心诚意想解决问题的意见。但这却绝对不是怯弱的表现，中共和全体解放区军民有绝对信心，可以粉碎任何好战派对解放区的进攻。

远的不必说，即以一周内所得消息而论，冀鲁豫边定陶曹县考城一带，三日国民党军第三师赵锡田部两个旅以及六日第四十一师及四十七师又两个旅全部被八路军歼灭，尚有一旅被包围中。赵锡田已被俘。这些“旅”都是过去的“师”，即等于消灭了过去的两个“军”。薛岳和刘峙联合指挥的“菏泽攻势”，基本上已被打垮一个钳头了。如果从七月十五日起，各个解放区自卫战场上，被解放区军民歼灭、俘虏与放下武器者，已有二十二万人！即等于国民党全部兵力约十分之一以上。

热察绥之自卫战，事实上才开始。八路军于八月二十八日撤离承德，正如叶剑英将军所说：“除了承德街上的破草鞋外，国民党军一无所获。”这一有计划的撤退，在军事上使热河八路军能机动作战，使热河国民党军更加被动，更加分散兵力。这不是表示“美式装备”之“无敌于天下”，而是表示更有利的自卫态势之安排。

平绥路之战，也是属于初期阶段，傅作义部宣称已到集宁，即可南下以解大同之围。对这一套宣传攻势，张家口广播电台十一日晚时事评论员说得好：“等几天你们看吧！”

此次自卫战争的胜负最后决定于“有生力量”之多寡，而不



决定于初期少数城市之得失。当国民党军被消灭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内战就不能不被停止了。

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道路，才是通路，其他任何主观的愿望，终久走不通的。南京一般人对时局十分苦闷，当然这种苦闷并不限于南京。然而推进时局之基本力量，仍在中国人民自己。英大使斯蒂文森八日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讲：“除中国人民外，无人能制止中国内战。”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最后与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美国对内战加油，中国人民的努力当更容易有成就。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八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出版）



西洋镜快拆穿了（南京一周）

（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南京谈判所牵涉并且为南京谈判所掩盖的政治军事外交秘密，这一周可以说已到不能不完全揭开的边缘了。虽然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还想尽一切可能欺骗下去，但是中国人民没有永远被蒙在鼓里的义务，而却有要求弄清楚是非的权利。

南京谈判已经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来中国时局越弄越糟，解放区人民早已挺而自卫外，国民党地区的人民期待和平的心情，也已经由烦躁到失望。周恩来将军九月十五日向马歇尔将军送达重要备忘录，以及十六日离京飞上海，即表示南京的西洋镜，即最能忍耐的中共也不愿再看了。

马歇尔将军一周来的表现，更加暗晦了。他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一落千丈，中国报纸上对马歇尔将军有关新闻之地位，也由头等新闻转入二三等新闻上去了。

马歇尔将军一向不大发表意见，这对于他增加了不少神秘性，但是他所作的“调处工作”，让人不能不失望。人们对于他不断奔走南京牯岭间，原来还有些期待，但是现在很少人再热诚地关心他的行踪了。因为很显然 he 现在是执行着美国政府内反动派独霸中国的政策，不是促进中国和平民主的政策。他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正如七月十四日美国国庆日他在南京美大使馆鸡尾酒会上对中外来宾公开演说中表明的：“菲律宾是人类解



放的榜样。”很显然他希望而且在“调处”的名义下逐渐把中国变为菲律宾。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对华政策不变，事实上内容老早“变”了，同是一个马歇尔将军，他的作法，也变了。这在华莱士十三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演说发表以前，还有许多美国人甚至于连马歇尔将军自己也曾否认美国对华政策之实际的变更，但是有了华莱士的演说，美国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暴露无遗。全世界人民都曾看到贝尔纳斯等在巴黎之狼狈，中国人民也不难想象马歇尔将军在牯岭所受的影响。

如果不从美国政府的反动外交政策出发，绝对不能了解在大多数美国人民厌恶国民党“坏政府”的基础之上，而美国政府能对国民党政府这样慷慨“援助”。同样也不能了解以马歇尔将军这样世界上有数的军事家，会不知道片面借给国民党军火物资贷款等会助长中国的内战。

从世界和平的利益讲，美国不应促进中国内战，美国尤不应在“调处”的掩护下加强中国内战。要真正调处就应当首先停战！因此在内战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周恩来将军不能不要求马歇尔将军注意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与责任。九月十一日周将军正式向马歇尔将军口头提出重开军事三人会议，讨论如何停止内战。十二日周将军在与司徒大使晤面时，也重申这个迫切的意见。但是周将军未得到肯定的答复，十五日周将军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资格，正式向根据停战命令合法组织之军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要求召开三人会议之备忘录。马歇尔将军十七日回南京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对周将军如何答复。

周恩来将军十六日飞上海，有些人分析不仅是为了群众周刊被无理干涉事，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周将军是中共“和平谈判”代表，而不是“欺骗谈判”的对象，在谈判已毫无意义的时候，他没有永留南京的必要。只要三人会议能重开，停战能有保证，周将军当然愿意早日恢复谈判。



国民党好战派的二号头子陈诚将军一周来飞遍华北东北各重要内战司令部，他看看各地的美国装备、美式服装的国民党官兵，自己坐着美国飞机，陪伴着一些美国顾问，他又看到集宁战局和淮阴战局暂时有利于国民党的变化；更重要的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取得了蒋介石的最大的军事实权，许多比他资格老的将领，今天都做了他的部下；在牯岭三青团二全大会中，他又与蒋经国合作排斥了陈氏弟兄、政学系、胡宗南康泽等势力，而独霸三青团。现在是他有生以来最“得意”也是最“忘形”的时候。他在北平公开主张内战，主张“用武力解决来得简单”。他觉得林彪在四平街一役，已“溃不成军”，贺龙大败于集宁，已“不堪一击”，刘伯承已在陇海线“损失甚重”，陈毅已“狼狽不支”。总之，中共军队是“外强中干”，是“色厉内荏”。好一个好战的“内战英雄”，他赤裸裸地宣布了好战派那种骄横的血腥的姿态。国民党宣传机关几个月来昧着良心所说的“自卫”“反击”等借口，被陈诚自己毫无保留的捅破了。

狡猾的厚颜的国民党好战派，在放手大打的同时，又在南京放出“政治妥协”的烟幕。不但对于“非正式五人小组”还始终坚持，欲拿“改组政府”这个空口号来骗民主党派上钩，而且在“非正式五人小组”阴谋被揭穿之后，又放出“政协综合小组”的大烟幕。好象国民党真打算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的法统，与各方和衷共济，解决国是。但是这些烟幕却掩盖不住漫天烽火的前大内战。中共、民盟及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的“停战”，国民党却不能给以明确答复，而一味躲躲闪闪唱“政治解决”的空调。这很显然，在积极方面，国民党企图以“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为饵，欺骗国人，以便在大打能有若干胜利之时，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改组政府和召开国大，使其专制独裁合法化。在消极方面，则准备其内战不利时，先布置好一条退路，蒋介石三邀张君勱先生上庐山，就是这个用心。



南京官场正在发疯，他们正在疯狂地夸耀内战的成果，“和平使者”也正在欣赏内战疯狗血肉淋漓的狂噬。这一周中只有华莱士的晴天霹雳，才把他们骇了一跳。贝尔纳斯这般人又占上风之后，南京中央日报之流才放下卑屈的奴才之心，庆幸“美国对华政策不变”。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怒吼，将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整个粉碎好战派及其加油者的迷梦。

（原载《群众》第十二卷第九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南 京 之 秋

中秋节后，南京真正已是秋天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晕黄的阳光不再象炎夏时际的逼人；高爽的晴空，白云朵朵，迎面吹来的微风，亦带来凉意；片片黄叶在你脚跟前迎风回舞，处处都在示意：秋意是日深了。

秋天带给南京平民的是一片萧瑟、凄凉与沉重，把南京城的丑恶愈衬托得明显。南京的人口据说已超过八十万，这八十万人口中有多少是无以为生的，谁也说不出一个数目。假使你不是整天躲在家里，你会看到大公司屋檐下深夜踉伏着的蓬首垢面的人们，在寒风中打战。你也可以在城墙上的小圆形堡垒中看到蛰伏着的无告的人们，这些人当然是在八十万市民之外的，他们的生活谁也不去管。但是为了整顿市容，尤其是为了军事戒备，这批南京市的可怜虫，都被驱逐得连屋檐下，残破的小堡垒也不允许容身。

南京是一公务员的城市，从九月开始，各机关充斥一片裁员声浪，据说十万人已陷入失业的悲惨命运。自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因裁员而引起轩然大波，暴发了打狗运动以来，请愿的行动与惶恐的心理，弥漫着整个城里的小公务员们。天气是凉了，物价随之而涨，失业的痛苦，愈来愈令人无法忍受。还有那些长期被“等因奉此”的办公桌生活折磨得半死的人们，怎么办？茫茫前途，何处是归宿？！

“反美国即是反祖国”这是官方宣传的警句。今天打开中央



日报一看又是赫然大字“大公报反美的居心”。这又令人想起，蒋主席在牯岭下手令禁止看大公报的故事。在南京尽管也不断发生美兵车撞死人，美兵强奸妇女等事件，且也曾引起市民围住责骂美兵等事件，但是反美即是反祖国，一切也就压平下去了。宪兵队长可以有礼貌到等待美兵奸淫华妇后，将可怜的受辱者亲送回家了事。南京又曾发生三个新疆籍学生深夜出城被宪兵初则敬礼（把他们错认为美国兵），继则痛殴的怪现象（这是当宪兵发觉他们并非美国兵之后）。美国兵在南京深夜打门找姑娘，弄得邻闾不安，曾经发生过有一名好心肠的警察去制止而被一个小军官大骂“干你屁事”，几乎动武。南京的官方真是做到了美国人比中国人高出一筹的德政。偶尔小报上露出了一点美国兵横行的消息，但在中央日报上是一辈子找不到的。“反美国即是反祖国”，这个不能了解的问题，最近我已渐渐了解了。一天，为了采访行政院例会的消息，老远跑到中山北路去，行政院前一排小汽车静静躺着，象征着会议未散。我在石阶前无聊地散着步，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工役不断地迎面走过，手里拿着一罐罐美国剩余食物，屋子里尚传出为分配罐头的一阵喧嚣。我这时的心头陡然出现一阵不舒服：这是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这里的人们正为分配我们“盟友”的一点残余在喧嚣。我看到巍峨的行政院官舍，那一个个拿着罐头踱出大门的人，忽然想起这有如一座大庙宇，走出来的象是沿街托钵的一个个叫化子，我心里充满了耻辱感。但从这里我开始了解“反美国即是反祖国”的真正意义了。

南京的十万以上公务员，现在享受着每周化二千数百元代价配给美国剩余罐头的权利；留美的风气沉醉着不少公务员们，据说许多达官要人们的子弟，借新闻记者名义向国民党中宣部请求出国的已有百多人之众了。前几天，下关热河路强迫拆棚户，当然是为了市容，贫民请愿不生效果。下关一个在执行整顿市容的小工说：“美国人说的，五年以后，他们要把南京建设得比上



海还要热闹”。这虽然是市井之言，但也反映了美国狂的空气。在这种环境下，哪能不是“反美国即是反祖国”呢？因为形势已到“无美国即无‘祖国’”了呀！

秋天是更显得南京有一股杀气的了。在最热闹的新街口，宪兵司令部政治部的大壁报，已用图画画出共产党的“可怕的狰狞”面貌，最后一幅是一个兵拿枪上刺刀刺入共军肚内收场，这当然是鼓吹杀共产党的。天空中更是机声不断，一队队北飞轰炸扫射苏北解放区。报纸上大字登载“国军推进”“收复××”等字样。一个星期前，官方报纸与要人谈话，还是在说“共军进攻被迫反击”，陈诚对记者也这样说过：“只要共军不攻击国军，战事就停了”，但现在这些谎话也听不见了，就老老实实把“推进”“攻击”“收复”等字眼推出来了。今天某报还说“空军并未滥炸平民，而是为了毁灭共军主力”，这只是说不论解放区的前后方皆在轰炸扫射之列。由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不久以前，徐州的徐报曾因编者不小心做了一个“国军三路出击”的标题，那一粗心的编者几乎被捉去关禁闭。徐州绥署说：“我们是只能说反击的，如何能说出击？说出击岂不是变成我方主动了吗？”真是曾几何时，他们已不需要此一骗术了，老老实地说在进攻、追击了。从这里也可测度时局的变化。

南京的和平谈判，已经到了尾声，一方面要求停战，一方面打得正兴高采烈。调停者据说因中共一面批评一面又要他们调处，已感到不能忍受了。可是这“中立”的“公正”的调停者并未去探究一下中共的心境，中共却忍受了一面装中立调停，一面送枪炮给一边打中共的现象直到现在了！

南京已没有和平的空气。除了火药味，仅仅只有召开国大的活动。中国真正大悲剧的帷幕，在这秋深的时候，正在揭开。南京市民的灾难，中国人民的灾难正有加无已。

（原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



和平——已经死掉了！

时局的快板

从九月二十九日国民党的军队正式进攻张家口之战揭开以来，九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向马歇尔及国民政协代表提出严正的警告：政府如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十月二日，国民党当局发表声明，提出二项迫使中共作城下之盟的无理条件；六日，马司提出所谓“新建议”，暂时停攻张家口十天，来执行蒋主席二项主张；八日，中共拒绝马司不公正的建议，随之马司发表联合声明。这一连串进攻和谈判交织的时局快板，早已预告了和平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一个巨大的不堪想象的死亡的阴影，已经在人们心底沉重地生根了。

从十月头一天起，时局确实严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九月份在三五之争中过去了，停战这个根本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国民党当局早已决定了军事解决政治分裂的政策：蒋主席七月离京就是苏北大打，接着是战火四起。国民党的反动派，他们的计划是：在双十节以前打通关内七条铁路线，占领关内中共管辖下的大城市，以便这一天舒舒服服地颁布国大召集令。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把一切的希望全部放在军事胜利的赌注上。谁也看得很清楚，九月份马司的调处，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玩弄了一个拖延时



间的把戏，充当了帮闲的角色而已。到了十月六日，马司新建议提出，调停者一面倒的面貌是愈益暴露。就是这样：国民党坚持内战，调停者乘机压迫中共接受投降条件，而中共则坚决为政协停战协定奋斗到底，三角关系变成两方对峙，局势走到了绝路。

难为了第三者

在这一几近绝望的情况之下，参加政协的第三方面人士，发乎衷心，不忘大局糜烂，纷纷起而作最后的努力。这精神是可钦可感的。

在南京，参加政协的第三方面代表，除做了官的王云五之外，只剩下梁漱溟老先生一人。从八号晚上起他经过了再三考虑，怀了一个调停的腹稿去访司徒大使，司徒大使希望他去试试，并建议他与政府方面的人先交换意见。九日上午，梁先生跑到参政会，会见了雷震先生，邵力子王世杰诸先生都开会去了，谈起他的腹稿，雷震先生特地写了一便条替他约晤王世杰。中午梁王会晤，王雪艇先生也鼓励他一试，但声明自己不便参加。下午青年党的李璜先生也到了南京，梁先生来了一个奔走的帮手。为了挽救这垂危的和平，九日下午梁老先生又访司徒大使，并邀傅泾波先生同赴上海，与第三方面人士共策进行，晚上又访晤了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

梁先生的奔波，引起了新闻记者的注意和期待。在这样恶劣的局势底下，确也是一片乌云中仅露的一线希望了。蓝家庄民盟代表团宿舍，在九、十两天，是空前的车马声喧。一群群新闻记者想从他老先生嘴里探听一些时局的消息，尤其是王世杰对记者说梁先生有一妙计之后，新闻记者更是紧追不放。

九日下午的蓝家庄会客室里，一群男女记者围着一领长袍穿着一双双梁布鞋、面容瘦弱清癯的梁先生。虽然梁先生一再不愿回答他打开僵局的腹稿内容，但是从他甘地似的面貌上所表现的



沉重神色，也回答了这是多么艰巨的一项工程。

九日的晚上梁漱溟先生接到了美大使馆傅泾波先生的电话，很简单地告诉他：“马歇尔特使已去上海回来，我决定不去上海了。”这未始不是一小挫折。但梁先生不灰心，还是决心去上海，跟第三方面代表一起，来作最后一次努力。十日的下午，邵力子先生特地替他买好了晚车票，怂恿他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政协第三方面人士，也在作最后的尝试。九日，周恩来先生根据政协停战整军三协定所提的三项加八点主张，也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他们认为张家口之战尚未判定，国大召集令未颁布，这一时机再不能错过了。他们——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钱新之、郭沫若、陈启天、左舜生、胡政之等经过了数度聚商，也提出了三项打开僵局办法：一、全面停战；二、一切根据政协决议解决；三、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

从南京到上海的梁漱溟先生，十一日一到就忙碌异常。上午就在交通银行参加了第三方面代表的聚会，大家交换了意见，梁先生的主张也拿出来了，他就是主张停战命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宣布。他说这是时局紧迫，先得设法结婚，再谈恋爱，这样经多方商议，更决心一试。第三方面人士一齐又分别往访了孙科与周恩来。为了事不宜迟，又催促梁老先生当夜乘车返京，当时相约，请梁先生一到南京就向政府交涉一架飞机，将他们接来南京。临走时，黄炎培先生更告诉梁先生说：倘能做到政府来一欢迎的电报，我们一定连周恩来先生也一起邀来。

谁知道，梁老先生两晚车厢中的劳顿，当他十二日清晨，步出下关车站时，已经形势全非。不仅国民党已攻占了张家口，并颁布了国大召集令。一切努力，付诸流水。梁老先生这时在李璜寓所，一语不发，呆坐了半天。



两扇门一齐关闭

不顾中共一再对进攻张家口的警告，国民党悍然于十一日下午二时攻占了张家口，军事商谈的门关了。十一日下午五时，突然地蒋主席又宣布颁布国大召集令，这样，政治商谈的门也关了。和平之门，紧紧地关了，千秋万世，历史会注明这一责任。不仅民主人士对于国大召集令的颁布感到突然，就是国民党内的某一部分重要官员，也是同样感到突然。十一日的上下午，国大筹备处秘书长洪兰友尚在对往访新闻记者说，国大召集令，政府为了顾全大局，决定暂缓颁布。但是他料不到蒋主席于接获陈诚从北平来的电话，告诉攻克张家口消息之后，临时召集了陈立夫、张厉生、吴铁城等立即决定了颁布召集令。忙得洪兰友半夜尚在向各报馆打电话，更正他的‘过时’的谈话。

同样的，某一新闻记者十一日晚七时，打电话将国大事询问邵力子，邵力子尚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惊异不止。据事后所知，本星期三（九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国大召集令是否颁布时，只有陈立夫张厉生坚持十二日必须颁发，其他很多人默不作声，后来决定下星期三再讨论。岂知“领袖”作主，并不需要讨论了，怎不令人惊异！

和平的死亡

局面已无可挽救了。十二日，记者往访梁漱溟先生，一记者问：局势严重尚有转机吗？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现在已不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了，象一个病人，病况再严重，尚留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是死了。

和平已经死了。据说李璜先生十一日下午四时尚听吴鼎昌表示尽力去说千万勿下国大召集令，匆匆赶往参加五点钟蒋主席的临时会晤。谁知就在这一会晤中，形势完全变了，一切苦口婆



心，皆付流水。人们怎会不愤怒？这样一件关系国家百年大计的制宪会议的决定，竟能以张家口之得失作为依据，这样轻率，这样儿戏，这样作践有正义有良心人们的愿望，还有什么话说！

和平已经死了，一切已无话说。中共代表团已不说话了。第三方面人士的热心，受了致命的打击，也沉默了。这是可怕的沉寂，中国人民已被内战媚外独裁者逼上争民主和平独立的疆场。胜利一年，政治商谈一年，而结果是：黑幕已降。光明的战士，要为揭去这黑幕，展开历史新阶段而苦斗。好战独裁者的猖狂，只有增加人民的愤慨与勇气。历史不能走回头路，光明终要来临的！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段悍然不顾一切的分裂内战者的罪恶。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新华日报》）



日 本 研 究



与敌国内反战的人民团结起来

—

抗战六个月来，国内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一次战争的性质。他们不了解，这一次的中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求得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反对没落的反动的力量的斗争。这一战争，表面上是中日两大民族、两个国家的对立作战，然而实际上，中国今日的敌人不是日本全民族而是日本少数统治者金融寡头和法西斯军阀。同样，日本广大民众今日的敌人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本国少数统治者。中日广大的人民，不仅不是仇敌，而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同志。

目前，在舆论界有三种错误的观察与认识，是由于不了解中日战争的性质而产生的。第一种是有人把这一次中日战争，看作是中日两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搏斗，强烈地煽起民族仇恨；第二种是在估计敌人的时候，认为日本国民在“忠君爱国”的共同观念之下，对外作战，步调一致，力量集中；第三种是日本民族有野蛮的好杀好斗的民族性，所以侵略中国，特别勇敢好战，这是他们“武士道”的本色。

应该指出，上面三种错误的观察，在客观上，对我们民族解放战争是有很坏的影响的。假使强调了上面三点，就会影响到一般较落后的同胞，感到敌人的力量的巨大。在艰苦长期的战斗



中，一遇挫折，便会消沉奋斗的勇气，动摇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强调上面的说法，盲目地仇视日本民族，便不能机动地争取广大的敌国内部的战友，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

国内少数人观察错误的原因，大概是从两方面发生的。一方面他们看到日本国内浓厚的战争空气和欢送出征的热烈，便想起了日俄战争时代日本军人“视死如归”，奋勇肉搏的精神，就以为现在还是一样。的确，在日俄战争时代，日本的妇人送她的儿子出征时，都拿着“祈战死”的小旗，以战死为无上荣耀。但是他们不知道，日俄战争与目前的中日战争，性质上已经发生变化，而客观形势也完全不同了。日俄战争时代，日本正是走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时期，那时候日本国内的阶级对立，没有今天的厉害；但是在目前，敌人侵略中国战争的目的，虽然还是在拯救没落的资本主义，可是日本广大的工农大众，从非人生活的困苦中，已丧失对资本主义的热忱，所以结果是自敲丧钟，自掘坟墓。正因为这样，在去年芦沟桥事变以来，敌人一次次派兵来华的当儿，东京驿虽然还是一次次挤满“欢送出征”的人群，但是，送行的家属的脸上，已不见日俄战争时代“祈战死”的悲壮气概，而是代以悲惨的痛哭。街头上挤着的妇女不再鼓励出征，而在求人缝千人针和索夫索子团的请愿了。尽管日本法西斯统治者镇压人民反战，强迫国内人民强颜欢笑，但是今日日本广大的人民厌战反战的情绪是无法遏制的。

二

日本人民为什么会普遍的厌战呢？惟一的原因，是目前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给予日本劳苦大众的，只是生活的日趋悲惨，只是生命的无谓牺牲，而没有旁的。

据苏联《真理报》记载，抗战六个月来敌人侵略中国的结果，所受的损失程度，已超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之



战。这一次侵略战争，敌人在中国前线的军队五十万人，伤亡者已达十万人，而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在前线全部军队仅有四十三万人，作战十九个月，不过牺牲二十万人，现在日本对华作战，每天需要战费五百万美元，而日俄之战时，³每日仅为三百六十万美元。十万人的牺牲，是日本工业大众的血祭，每天五百万美元的战费，皆是下层人民的血汗。

日本全国不到六千万人，国内资源又极贫弱，严格说起来，根本没有准备大战的国力。然而日本的法西斯军阀和金融寡头们，为了独霸东亚，不顾一切的进行扩军。近几年来，在准战时经济的口号之下，军需工业畸形膨胀，日常工业用品产量减少，加以扩军的结果，预算膨胀，苛杂繁多，国际贸易恶化，失业者增加，物价逐日高涨，国民经济日趋崩溃，人民在扩军狂涛之下，生活一天天困苦。因此农民的骚动和工人的罢工怠业，逐年的增多，逐年的严重。以上还仅仅是拿芦沟桥事变以前的情形来说的。到了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军费大增特增，去年连所谓“华北事件费”和“中国事件费”，公债发行了二十五亿元以上；今年为了长期进行侵略战争，海陆空军估计要四十亿到五十亿的军费。这庞大的军费，从什么地方来呢？只有二条出路，一是增加大众课税，一是发行公债，客观上依然是向下层人民榨取。

六个月来，日本一般物价比平时已增高百分之二十以上，因为战争的关系，中国市场的破坏，国际间抵制日货的普遍，一向以对外贸易为国民经济重心的日本，贸易是一落千丈。据日本报纸所载，去年日本海外贸易减少数目的比率较前年超过十倍，损失在八千万至一万万之间。在这贸易衰落的里面，是工厂关门，工人普遍失业。战争赐予一般人民的是苛重的负担，物价的高涨和失业，他们已经明了战争赐予他们的不是“光荣”而是“饥谨”。在备战与战争进行之间，只有三菱、三井、大仓等财阀控制下的军需工业获得了最大的厚利，日本的人民已很清楚地看



到，侵略战争是为了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

日本广大的人民从实际生活的困苦中觉悟了，所以在日本的国际主义者和人民领袖号召之下，反战的怒潮汹涌澎湃，惊破了统治者的胆魂。从去年八月起，日本法西斯统治者用拘禁来镇压人民的反战。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东京大阪等地逮捕左倾分子及人民阵线领袖四百余人；今年二月一日，又捕去三十余人，其中有东京帝国大学的助教有泽广已及协村义太郎，法政大学助教南金次，社会大众党的渡边物藏和其他许多有名的人物。日本统治阶级虽然一再严酷镇压，但东京的学生发动了两次停战请愿。他们不怕流血不怕监禁地斗争着。不仅如此，在前线日本士兵身上已发现不少反战的传单，严正指出他们的敌人是军部，是国内金融寡头而不是中国弟兄。号召他们打倒军部，与中国团结起来，铲除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东亚永远的和平。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欣喜和鼓舞的事情！

三

我们决不能片刻的迟疑，赶快伸出我们的手与敌国内部的战友热烈地紧紧地握起手来。日本的弟兄们，虽然处于法西斯统治者血腥的镇压与长期麻醉之下，但是他们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胸襟。他们拨开一切包围他们的毒雾，英勇地参加到我们的战斗中来。我们回想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里东北吉林省宁安县一个日本的无名英雄，他运输一汽车的子弹和炸弹，开到我们义勇军的游击区域，接济我们义勇军，最后因日军的追击而自杀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证明了，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神圣使命，也是日本劳苦大众共同的事业。

抗日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广大人民的共同事业，而且也是在日本奴役下的朝鲜、台湾人民的共同事业，最近台湾矿工的武装抗日斗争，“九一八”以来，朝鲜成千成万优秀的战士在吉林伊兰



一带与我国义勇军协力与敌人血战，这都是很好的证明。所以在目前抗战最重要的关头，我们应加紧来号召团结中、日、韩广大反帝的人民，结成坚强的反日阵线。为了要达到这目的，我们必须从下面四项工作开始：

第一、广泛教育全国的同胞，纠正一部分人民族复仇的偏狭错误观点，认清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辨明敌友。

第二、扩大对敌国内工农大众的反战宣传，运用各种可能，使我们的宣传，能够冲破敌人法西斯统治者的封锁，传到他们耳鼓里去。并派遣有国际声望的党派或其它团体的领袖，到海外去，联络敌人国内的战友，共同一致地完成抗日反帝使命。

第三、竭力扶植韩、台革命团体，优待和保护韩、台逃亡的革命分子，帮助他们推动韩、台人民再接再厉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使前线士兵明白日本士兵是被法西斯军阀强迫征调前来的劳苦大众。因此，我们要优待俘虏，耐心地说服和教育俘虏，并且要加紧对前线敌军士兵的反战宣传，以达到瓦解敌人军队的目的。

上面四项，尤其是第四项，最为重要。一般地说，我们过去六个月来作战，就缺乏这种教育，这种宣传和工作。鉴于欧战将结束时俄国军队在前线和德国军队联欢的历史，更鉴于敌军内部反战思潮的散布，瓦解敌军联合敌军中的弟兄，是有十足的可能性，而且必须立即从这一目标努力的。

八路军最近在作战时，就已很注意到对敌人宣传和进行瓦解敌人的工作了。不过起初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敌方士兵长期受军阀的麻醉，说中国对待俘虏是如何残暴，使敌军士兵发生仇恨中国民族的心理，所以往往有时少数被我包围的敌人，至死不肯屈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原因，耐心地去说服工作，我们相信到了相当时候，一定可以收到很大效果。等到中日



两国在疆场上的弟兄，一旦携起手来，日本的统治者，法西斯军阀，便会在这坚强的团结下倒下地去，东亚真正的和平便会从此实现了。

（原载《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出版）



清算一年来的日寇

一九三九年又匆匆地过去了。我们回顾这一年来日寇国内种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演变，在坚持抗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上，是有很重要意义的。这一年来，日寇内 阁更迭，由近卫、平沼以迄阿部；国内财阀军部官僚层间明争暗斗；外交困难，国民经济日趋破产，反战运动普遍爆发，诸如此类，象万花筒一样，呈现复杂变幻之奇观。穷其所以如此的根源，很显然的是由于日寇的泥脚陷入中国长期抗战的深渊，无法超拔所至。中日战争，现在延长两年有半，日寇动员人数近达三百万，军费消耗已达二百五十亿以上，损兵折将数逾百万，国小民贫的日寇，要支持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自然无怪乎其国内支离破碎，纠纷迭兴。我们从这一中心去剖析日寇一年来政局的沧桑变幻，尽管事态千变万化，也不难了然于怀了。

一、平沼内阁从产生到倒塌

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继近卫组阁。一月二十日，他发表上台演说，高唱“日‘满’‘支’三国提携”以确立“东亚新秩序体制”，在未完成此目前，“事变绝不终结”。平沼所说的，总括起来看，未脱近卫的灭华三原则。我们现在且不论三原则对华的影响如何，主要的且看平沼究以何法来实现其目的。平沼上台之初以“事变收拾内阁”自许，在侵华战争延长一年又半，



“速战速决”已成幻想，而国内支持战争又感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加强政治进攻，来达到其诱降的“速和速结”阴谋，自然是平沼内阁的主要使命。然而平沼的“收拾事变”，在政治上诱降，除了与汪逆订一个所谓“平沼汪协定”之外，毫无办法。侵华军事上，他高唱“以战养战”的口号，加紧所谓游击区的“扫荡”战。但是一败于豫南鄂北，再败于晋察冀边区，冀中“扫荡”又告失利，中条山十战十败。三月间敌侵南昌，自鸣胜利，可是我军迄今仍活跃在南昌近郊。军事上的失败和诱降的无成，使平沼的地位，每日在风雨飘摇之中。

平沼是一个法西斯“国本社”的巨头，当他上台之初，有许多人猜测日寇政治将更趋法西斯化。可是我们知道，在日寇国内财阀与军部对立的局面之下，平沼“国本社”时代的气魄，早已在军财夹攻中消失了。平沼既不敢开罪于财阀，同时他又害怕军部，因此在他八个月的内阁生活中，常在相克夹板中度日。少壮军阀为了掩饰对华侵略的失利，起先掀起广大的反英运动；自德意订结军事同盟以后，军部更坚主加入德意军事同盟，强化所谓“防共轴心”。这与当时主张稳重主张改善英日关系的元老重臣财阀，更有如水火，而平沼则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法西斯军阀不仅发动反英，更发动大规模的反苏军事行动，制造蒙伪边境冲突。可是结果，被苏蒙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单是飞机一项，损失便在千架以上，整整两个机械化师团全部被歼。法西斯军阀挑衅的惨败，更使平沼陷入困境。

平沼在风雨飘摇中过日，本想以英日谈判造成一个远东慕尼黑来挽回残局。由于英国的退让缔结了英日初步协定，这一成功的确曾使日寇乐不可支。然而突然地，美国宣告废弃商约，英日谈判也不能如日寇愿望顺利进行。在这时候，平沼的确已是处处碰壁，无法恋栈了。再加上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成立，“防共轴心”的宣告瓦解，更震动了日寇。所以由于侵华的不顺利，由于



国际上的波折，财阀不必说要埋怨平沼的不力，军阀也巧妙地将责任一齐推在平沼身上，说他不该对参加德意军事同盟抱观望态度。因此在双方拆台局面之下，平沼内阁于挣扎八个月之后，终于不得不引去了。

二、阿部内阁的出现

平沼以“收拾事变”为旗帜，而无法使中国抗战终止，以国内“总亲和”自命，而国内财阀军部重臣之间纠纷反愈来愈多。平沼因此倒台了。结果却出现了一个阿部行信内阁。

阿部新内阁成立以后，从表面上看起来，平沼内阁中的激进分子是退却了。陆相由板垣换上畑俊六，文相由荒木换上阿田原，再加上财阀巨头没有出场，投机官僚乘机活动，整个内阁的庸碌，比平沼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日寇自己也称之为“废物收回内阁”。九月号的日本评论上曾经很坦白地说过：“今日不是容易当首相的时代，最平凡的人最为适任。斋藤、冈田、林、广田、近卫、平沼等，历次首相并非依才能而任首相，乃是以平凡而任首相。要想做什么的人，就不会出任首相，只有不想做什么的才会被选为首相。”这的确把阿部内阁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了。

阿部登台之初，我们国内有些人认为这是重臣财阀的胜利，以为在“防共轴心”瓦解的时候，军部已经因此失势了。这种看法完全是表面的。我们知道，由于侵华的失利，外蒙边境的大败，“防共轴心”口号的破产，军阀的声誉的确是一落千丈。可是日本军阀是极狡猾的，他们也正趁此形势于己不利时，来竭力支持一个庸碌的阿部内阁，并且更巧妙地建议要扩大总理大臣的权限，实行少数阁僚制，以便抓住阿部可以左右一切。在军部要求之下，成立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名义上由西尾任总司令，而大权一手操在板垣手里。所以表面上军部是退却了，而实



际上左右一切的权力毫无丧失。尤其是侵略中国的机关方面，一个“兴亚院”是操在少壮军人柳川手里，再加上板垣这一着，可说内阁实在已无权过问对华大计。

但是日寇政局内部的磨擦相克，基本上仍然存在着。

阿部于欧局激变中上场，他要做些什么呢？据他自己所说，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日本不动国策，同时调节国际环境，亦迫切需要。”（见八月三十日阿部初次谈话）根据他的谈话，阿部第一个使命当然是他的“全力解决中国事变”。可是阿部组阁至今有些什么收获呢？首先是湘北的大败，损失兵力三师团。最近以前日寇虽在北海登陆侥幸成功，进入南宁，但是相持迄今，再也无力深入。华北的扫荡战仍然败绩，军事侵略上可说无功可言。在政治进攻上，固然汪逆精卫的活动是愈来愈烈，不过这种被全中国大多数主战人民所唾弃的阴谋仍难圆日寇早日结束“事变”的春梦。汪逆伪政权的一再搁浅，很明显的，这是阿部侵华失败的表现。

阿部所谓调节国际环境，对痛感国际孤立的日寇自然有其必要。阿部也因此于几经物色之后，才选了一个有亲美色彩的野村来担任外相。到最近为止，日寇打开国际孤立的活动，首先可以说的是日寇以开放一段长江为香饵，正在加紧拉拢美国；英日谈判也在暗底进行；自诺门坎事件对苏屈膝后，最近苏日谈判也在举行。不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今天日寇调节外交的用意，是在于实现他的“结束中国事变”这一基本方针。那末以苏日谈判来说，苏日谈判即使成功，苏联援华也不会变，所以于日寇并无利益。美日英日谈判倘使有结果，固然于日寇不无好处，但中国抗战，决不能受美日英日谈判所决定。换句话说，即是欧洲乃至远东有何变化，只要我们的抗战国策绝对不变，日寇鼓吹的“结束中国事变”还是梦想。

阿部的对内政策，已陷于空前的危机。阿部上台之初，实行



军部少数官僚的主张，现在已完全破产。譬如伍堂的兼任商相和农相，原欲以此调整两省的贸易问题、物价问题。但在这长期战争局面下，贸易调整不易，物价更空前高涨，因此一般官僚政客，乘机对阿部大肆攻击，终于以酒井来专任农相了事。十一月二十九日，阿部又以秋田清为专任厚生相，永井秀次郎专任铁相，军部的少数官僚主张，至此，便完全破产了。阿部这一次的补充内阁，在内阁本身并不因引用几个官僚而力量加强，却反而使军部与内阁的关系益趋对立。

再如十月初为了设置贸易省，又引起了外务省通商局长松岛以下三百余人的辞职风潮，结果使阿部的声誉完全扫地，后来事件的解决，也更增加军部的不满。由于这许多原因，今天日寇军阀对阿部的态度，已从过去的支持而走向反对。加上日寇最近国内经济困迫民生痛苦的日益加厉，终于在最近开幕的敌第七十五届议会中，发生了二百五十名议员请阿部辞职的大风潮。阿部命运的坎坷，是暴露无疑了。

三、经济破产的真相

据不久以前的消息，一九四〇年度日寇预算初步发表总数为一百零三亿六千万元，比一九三九年度的八十三亿元（追加预算不计入）多二十亿元。我们从近年日寇的财政情形来加以观察，则不难想象其严重程度。

日寇的财政来源，一部分取于租税收入。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由于军费庞大，以致租税迭有加征。一九三七年度因增税结果，税收约达十九亿元，一九三八年度，因对华军事费预算激增，增税三亿元，合计便达二十二亿元。一九三九年，再度增税三亿八千万元，合计已近二十六亿元。一九三九年度中，为了应付一九四〇年预算，又大举研究增税，所订办法，传将再增六亿余万元。假如再加上八亿元的地方税，则日寇横征暴敛的结果，每年



税收达四十余亿元之巨。以岛国不足七千万人口的数字来摊派，每人不论老幼男女每年租税负担要达五十七元以上。

日寇国内人民虽然租税负担如此苛重，但是每年百亿上下的国库支出，其中大部分仍不得不依靠租税以外的公债收入来平衡。日寇国债数字，一九三九年度底，约为二百零八亿六千万。而其中尚有应发而无法发行的四十五亿元，尚未计算入内。假如合计起来每一个日本人民平均要摊到将近四百元，负担之重，甚为可惊。

再说日寇的恶性通货膨胀，现在也愈来愈显著。日寇通货膨胀最标本的例子，是纸币发行额的增加。我们试举日本银行为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已达二十九亿五千万，除此以外，加上朝鲜台湾伪满华北内蒙等伪银行所发纸币及军用票，数目已超过四十亿。这样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要日益接近整个金融崩溃的道路。

日寇国内物价空前高涨。日寇政府虽三令五申限制物价高涨，可是毫无结果。后来日寇规定以“九一八”的物价为标准，严格限制再涨，但也没有用处。最近的情形，尤其以米价、煤价、烟草等价格上涨，特别使日本人民群情愤激，日寇平抑物价政策，可说完全失败。而人民在高物价下所受的痛苦，也就无待赘述了。

日寇目前自吹自擂的，只有一项，便是连年来大量入超的贸易，现在已改变为出超了。据日寇的估计，一九三九年出超总数可达六七亿元，为近年来所未有的乐观材料。但是我们细按其实际，日寇所谓出超，主要仍在对伪满及我国沦陷区输出，这种输出，在解决日寇亟需外汇以换军需品的需要上，是并无帮助的。除此以外日寇为了要扩大军需生产，而产生的资金不足，原料苦闷，电力不足等等状况，都是极其严重的。总之，从过去一年来观察，显然，日寇经济上已是百孔千疮了。



四、普遍澎湃着反战潮

由于侵略战争的结束无期，人民负担的苛重，高物价下生活的困苦，这种种原因，必然要促成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和在华战线上敌军士兵的各种反战行动。据一九三九年六月底的消息：

“据东京警视厅的统计，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日寇国内因反战厌战而自杀的日本人已有三千余人，其中青年壮年占二千二百余人，妇女占一千余人，实际自杀者恐不止此数”。自杀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表现，许多不甘压迫而意志坚强的日本人民，现在是纷纷起而对反动统治者反抗了。我们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三月间日本反战分子向大阪陆军兵器库投弹引起大火；四月间佐世保镇守府所属潜水艇被另一潜艇反战分子撞破；八月间，大阪皮革工厂也被反战分子投弹等等。由反战而发生的火灾事件，单以东京一地而论，春季三个月就达一百件以上，平均每天有一件以上。日寇统治阶级对国内这种反战运动的揭露，是绝对禁止的，可是就我们断续所知道的消息而论，已甚惊人。此外，在最近由于米价腾贵，关西各地的米骚动更为普遍。

至于在华敌军内部的反战，几乎到处都有。最显著的是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处的反战运动。象六月间武汉敌军五百余人反战哗变，结果被枪决八十余名。日本的士兵，在长期侵略战争中，从切身所感受的痛苦磨难之下，日益了解中日人民利益的一致。日寇统治者的严刑峻罚，决不能阻止这一反抗的。

过去一年日寇各方面情形已很显然告诉我们，日寇的末日是一天近似一天。当此时序更新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努力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新华日报》）



悲惨的日本劳动者

敌寇经明治维新以后，便一跃而成为远东唯一资本主义国家。轻工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全国劳动人数据昭和十二年底的调查共计达六百四十二万余人，几占日本人口总数十分之一。在这次侵华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劳动者的生活向是全世界最悲惨的。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日本半封建的经济特质，如小工场的林立，家庭工业的普遍以及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每年拥入都市，所以资本家得以对劳动者实行非人的剥削。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数百万壮丁从农村中，从工场内抽调出国来华作战，一天几达二百万日元的巨大战费消耗完全压在劳苦大众的身上，他们所受的痛苦，比平常时期是更深重了。日本劳动者当前生活的悲惨，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说明。首先可以从日本劳动者的就业与失业状态来观察。自从侵华战争开始，大量壮丁征调入伍以来，敌寇国内劳动力感到非常缺乏。例如最近喧腾报章的敌寇煤炭饥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由于熟练的矿工都被征从军去了，劳动力来源顿时大成问题。所以敌寇为了挽救煤炭饥馑便设法吸收妇女与殖民地朝鲜等地人民从事开矿，这十足证明了劳动力饥馑问题在敌国内的严重性。

敌寇国内劳动力不足问题在这战争期间发生了两种现象：第一是军需工业中劳动者数量的激增；第二是日常用品工业劳动者数量的减少。据去年秋季敌寇的调查，敌寇国内劳动者人员指数



(以大正十五年为基数)：

机 械 制 造

二二三、〇

二八〇、八

四二二、四

五七三、七

矿 山

七二、〇

八〇、六

九二、四

一〇〇、一

纺织业

昭和十一年

七二、九

十二年

七七、八

十三年

七二、六

十四年七月

六六、二

从这个表中我们看到纺织业中的劳动者是逐渐在跌落，而军需工业中的劳动者飞速的在增加，短短四年中就增加了一倍半以上。据敌人调查昭和七年到十二年五年中，敌金属工业与机械工业中劳动者增加了六十万人，这种增加是多么可惊。由于这种跛行性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表现出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有严重的失业现象。据敌国官方所发表统计，因战时严格统制日常用品工业而受到影响的工人数几达百三十万人。对这些人虽然敌寇政府想使他们转入军需工业中去，或驱回农村里去，但由于技术训练体力条件不适合转入军需工业，问题难以解决。至于回农村去，他们本来就是从农村中被排挤出来的，当然不可能顺利回去。所以尽管敌寇国内喧腾着劳动力饥馑问题，但成千成万的失业群，仍流浪在街头。

敌寇国内劳动力虽然如此不足，照资本主义社会的供求法来讲则劳动者的生活应该略能提高一些，可是实际情形完全与这种想象相反。敌国政府为了加紧榨取劳动者的汗血以支持侵略战争，在所谓国家总动员招牌之下，厘定了许多条例。这些条例表面上虽然说得很官冕堂皇，有什么灾害防止的条例，有所谓保健



卫生条例等等，实际上完全是一套骗术。敌国政府首先利用几个御用的劳工组织如“社会大众党”，“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等，宣传所谓“劳资协力突破国难”，一方面加紧压迫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甚至严厉的检举那些合法的所谓左翼人民战线派。另一方面又组织所谓“产业报国会”，高唱劳资协调，为法西斯侵略者军部财阀充当走卒。

其次是由政府颁布明令，规定禁止纪念“五一”节，并且规定劳动时间，原则上以十二小时为限度，必要时可延长至十四小时。这样长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是十分少见的。据敌政府厚生省的调查，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全国使用五十名工人以上的各机械器具工场，其间劳动时间十小时以下占百分之三四·四，十小时以上至十二小时占百分之三七·〇，十二小时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八·六，从这官方统计中也可看出，劳动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的为数众多。其实日本劳动者工作时间经常超过十四小时。敌寇国内劳动者生活的痛苦，从工作时间的延长上也可以看出一些来了。

工作时间是延长了，但是劳动者的待遇呢？几种所谓“劳务对策决定”早已把人民择业的自由完全剥夺了。政府站在维护资本家利益的立场规定了工资的最高与最低价格。尽管敌寇国内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在倒果为因，把物价上涨归罪到工价过高上去。可是在目前敌寇国内物价飞涨状况之下，劳工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据敌国官方内阁统计局的统计，昭和十四年八月间使用五十人以上的工厂工资指数（以昭和十二年为基数）

	男	女
全工业	九五	九九
金属工业	九〇	九四
机械工业	九二	九六
造船业	八七	九二



精巧工业

九六

一〇五

纺织工业

一〇〇

九六

从上边官方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敌国工人的工资是一天天低落。从去年八月（即昭和十四年八月）到十一月四个月中，虽然敌国有“九一八”事变物价停止令的颁布，可是物价仍在激涨，零售物价在四个月中增涨了百分之五·八。物价的腾贵必然造成工人实际工资的减低，所以敌国劳动者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敌国工人工资的低微，从最近大量妇女涌进产业部门这一事实也可证明。我们知道，日本全国工人中，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工，女工的工资，平常仅有男工的三分之一，这是敌寇资本家封建剥削最具体的事实。据去年十月间在东京开幕的“安全委员会”中敌厚生省代表谷野报告，在警视厅管辖的四十五个机械工厂中，最近两年来男工增长两倍，女工增加两倍半。敌寇代言人常常说，所谓低工资政策可以减省流动资本，缓和紧迫的金融情势，阻止通货膨胀，并且提倡节约等等，这些调调，最近就连敌寇国内稍有人性的人，也认为是强辞夺理。

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工资的低落，工厂设备的恶劣，日寇国内的工厂灾害事件逐渐增多。据敌寇警视厅管辖内工厂职工死伤调查，昭和十一年死伤八千七百余人，昭和十二年为一万二千七百余人，一年中增加千人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劳动者待遇太恶劣所造成的。近二年中，劳动者生活每况愈下，我们只要看报纸上不时传出敌国各地工厂大火或者爆炸的消息，就可以知道这种灾害也是愈来愈烈的。

敌寇资本家的代言人时常夸耀说，近来劳资纠纷绝迹了。这当然不是事实。在敌寇严格的新闻封锁下，有许多真实消息无从向外透露，不过就我们所知道的，去年一月劳资冲突有十一次，二月六十四次，三月八十一一次。因此可以说，在敌寇血腥镇压下，即使不能看见有大规模劳动争议事件发生，然而这决不能就



认为敌国广大劳苦大众不痛恨他们本国的统治者。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到矿区看过的敌国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被贫困的生活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劳工们，他们的胸中已经燃烧着愤怒的烈火，有一天终会要爆发出来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九日《新华日报》）



论米内内阁

经过“浅间丸”事件与斋藤隆夫的“失言”风波，米内内阁的不稳固性，已充分暴露了。不仅是米内内阁的危机已露朕兆，支持米内内阁的“政治上层部”元老重臣汤浅等辈，在军部全面压迫之下，亦有难安于位的传说，日寇的政治危机是更加深刻化了。所以在目前观察一下米内内阁诞生的经纬、它的本质以及分析一下将来的趋势，不是无意义的吧。

一、米内内阁的出现

要说明米内内阁的出现，与他出任敌酋的意义，不得不先从阿部内阁倒台说起。阿部的上台，是军部财阀重臣三大势力矛盾中的一支“插曲”。象阿部这样一个庸俗无能的内阁（日寇自称为废物拾回内阁）的出现，恰恰反映着上述三种左右日寇政治的力量，没有一方面可以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内阁，也可以说是没有一方面敢于在势均力敌状态下来试一试组织独家内阁所引起的必然产物。

以这样一个低能的内阁来担当所谓（一）“处理事变”，即是解决中日长期战争，（二）“调整国民经济”，即不外是挽救日寇的经济危机，（三）“调整对外关系”，不外打开苏日、美日、英日等僵化的邦交，进一步来利用欧美势力解决中日问题，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不仅阿部做不到，就是任何一个日寇所理想



的强力内阁也做不到，这理由是很显著的。所以从阿部上台以后，汪逆傀儡戏，一再演不成功：诱降的目的无法达到，弄得连阿部自己也不得不说对华作战起码还有三五载。再加上日寇国内米谷饥馑与抢米风潮的严重，物资恐慌的深化，通货膨胀的恶兆，以及苏日谈判的毫无进展，美日关系的始终陷入僵局，英日关系也仍处于不生不死状态，这些现象只有使阿部处处碰壁。

然而在当前日寇政治现实情势底下，内阁既然是特别要选庸材来担任，所以倒不见得完全因为内阁的庸碌与处理国策的无力，促成他非马上滚蛋不可。阿部的塌台，客观因素固然是在“处理事变”“安立国民生活”“调整外交”之无力，而实际促成的却是日寇内部三大势力的冲突暗斗，而在这一明争暗斗过程中，官僚政客和政党，只是推波助浪的配角而已。

从阿部上台的内幕来说，实在是日寇军部的“苦肉计”。当苏德协定成立，国际风云丕变的时候，日寇军部的外交路线（所谓强化德意日防共阵线）遭遇意料之外的袭击。平日认为唯一盟兄的希特勒竟放手不顾东方的把兄弟，与苏联言欢。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军部的声势在国内顿遭很大的损失。这正是财阀重臣趁机进攻的好条件。军部陷入这种意料之外的劣势环境里，也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支持元老重臣所提出的阿部内阁。板垣之类少壮军人固然是不得不离开“三宅板”，可是军部很想利用阿部的无能，来一手“挟天子以令诸侯”。

军部替阿部预定的做法是“首相权力的提高”，“采取少数阁僚主义”等等。因为首相既能设法挟持，则首相权力的提高，无疑的，实际上等于军部干政力量的提高。少数阁僚问题，也是一样。阁僚愈少，军部对内阁愈可操纵。可是军部这种“苦肉计”，要实现起来便发生困难，主要的原因是重臣财阀庞大的压力，重重压在阿部身上，使得阿部无论如何非顾到他们的利益不可。所以在阿部登台以后，受着重臣财阀的压迫，“少数阁僚主义”不



久便变成多数官僚主义了。一个亲美色彩浓厚的野村出来充当外相，几个官僚的补充入阁，首先造成军部不满的情绪。接着为设置贸易省问题而引起的外务省的轩然大波爆发了，阿部的态度更增加军部的不满，所以从那时候起，军部的态度已从初期的支持阿部，渐渐转向反对阿部。

到了今年一月八日，二百七十五名议员的突然联名请求阿部辞职，阿部的命运便走到死亡的前夜。虽然阿部当时并不把议员的反对放在眼里，然而军部的公开表示不支持阿部，使得阿部再也没有办法恋栈。阿部内阁塌台，正反映着日寇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的尖锐。

阿部下台之后，对于继任人选的斗争，自然更要紧张起来。元老重臣、财阀、军部，起先都瞩目近卫出马。军部的“专使”和重臣汤浅都曾经再三去拜望近卫，请他出来收拾时局。为什么各派都盼望近卫出马呢？这是因为从重臣财阀方面看，近卫是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决不会跟着军部跑的。从军部看来，近卫过去任内，也尽量容纳军部右翼分子，如板垣、荒木、末次之类，所以觉得近卫是有“亲军”色彩的。但是近卫是吃过苦头的过来人，尽管各派拚命拉拢、怂恿，他终于以“不谙财政经济”为盾牌，拒绝组阁。重臣接着提出了畑陆相，军部又认为畑太温和与稳健派的关系太密切，便以反对现役大将组阁为名，另外推出寺内和杉山。而元老重臣当然反对军部内阁，所以又突然地把米内捧出来组阁了。自从“五一五”事变以来，日寇军部一向实际上操纵着组阁的大权，这一次元老重臣却竟不再事先征求军部同意，突然捧出米内来组阁，这的确是广田内阁以来破天荒第一遭。更值得重视的是重臣层推出米内之后，惟恐军部运用拒绝推出陆相的法宝来破坏，由“天皇”当面命畑留任陆相支持内阁，使军部无法公开来反对米内新阁。米内新阁因此诞生了。军部喉舌“国民新闻”流露出无限的愤懑，说这是汤浅的阴谋。但是碍



于“天皇”，军部虽然怒形于色，却到底不敢立即发作起来。

为什么日寇元老重臣这一次要拖出一个米内来组阁呢？这是有原因的。米内是一个海军大将，当他任林内阁海相时，军部在会议中耀武扬威，硬迫议员“免开尊口”，压迫林内阁解散议会，米内当时曾经代政党议员说过几句“公道”话，结果几乎形成海陆军内部的派别冲突。这一点是对军部的嚣张深为痛恶的重臣财阀们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光杆儿的元老重臣很想利用这一机会，靠靠海军的实力，来镇压一下陆军的蛮劲。

米内的上台，无疑的这是重臣财阀压制军部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是元老重臣运用秘密筹备和依靠利用“天皇”的“优定”来达到的，这正证明了这一胜利并不能表示军部势力已被打倒。假使用日寇军部喉舌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阴谋的胜利。事实上军部虽然被迫无可奈何，但是作为军部支持米内新阁的条件，

（一）通过一百零三亿庞大军事预算，（二）积极支持汪逆政权，米内仍然不能拒绝。所以从这些事实观察的结果，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米内内阁的出现，虽然可以说是军部的失败，可是这并不是说军部势力从此瓦解了，正相反的，军部的潜势力仍然存在，而且正积极准备着乘机而动。

二、米内内阁的本质

军部机关报“国民新闻”评论米内内阁是“池田木户的合作”。我们知道池田成彬是今天日寇国内财阀巨擘；而木户幸一，国人知道的或许不多。木户是明治维新元勋木户孝允之孙，一九二八年袭授侯爵，任贵族院议员，与近卫是同窗好友，并且同是元老重臣西园寺牧野寺的得意部下。由此可知他是彻头彻尾代表元老重臣的。所以“国民新闻”之谓池田木户合作，说明白些，实在就是说财阀与元老重臣的合作。军部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根据米内拜命组阁时，他的组阁参谋便是石渡庄太郎和广濑久患



两人。石渡任了内阁书记官长，广濑出任法制局长。他两人中，石渡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是池田成彬的干部，当平沼内阁时，池田曾以石渡为其替身出任藏相，广濑是木户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属，所以“国民新闻”的论断，事实上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探究米内内阁的本质，对它的全部阁僚加以分析是必要的。米内内阁除掉陆海两相仍由畑吉田两人蝉联外，全部阁僚均有更动。内相是儿玉秀雄，他是日俄战争时，有名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的儿子，他世袭伯爵。无疑的儿玉的出马是受重臣的推荐。我们要知道日寇内阁中，在政党内阁时代，内相地位最为重要，日本人称内务大臣为“大臣中之大臣”，把这一把交椅看做等于副总理，可以想见其重要性了。在过去政党内阁时代，日寇各方面所以重视内相一席，当然与内相是选举的总管这一点有很大关系，然而人民生活的调整与国内治安的维持这两大任务，也形成了内相的重要。当此元老重臣与财阀采取积极态度之际，重臣层抓住内相一席，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外相有田八郎是纯粹官僚出身，任何人都知道，他是曾经抱着希特勒照片很肉麻地亲吻过的人，他是以侵略中国起家的东方外交官僚。从这一点说，日寇外交重心已索性集中最大的注意力到所谓“处理中国事变”方面来。

藏相是民政党的金库樱内雄幸。他一方面是代表了民政党总裁町田出马，而实际上他又是一个高根县的大财阀，以财阀的身份出场。

此外，农相岛俊雄是政友会中岛派。铁相松野鹤平是政友会久原派。递相胜正宪是民政党重要角色。厚相吉田茂，文相松浦镇二郎是官僚。法相木村尚达是司法界的元老。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子制纸会社的主人，大财阀藤原银次郎的出任商相。近年来日寇的工商省，实际已经变成军部御用的“军辖省”。腐败的官僚，加紧压榨日本人民来支持侵略战争，



以至物价飞涨，百物奇缺，弄得怨声载道，对商相的不满特别深刻。现在藤原以大实业家姿态出现，许多日本人认为他的出马，将要修正被官僚弄得一团糟的统制经济。其次是小矶国昭的出任拓相，日寇内阁中的所谓拓殖省，说穿了便是侵略省，现在起用一个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军阀小矶，无疑地可以说明在米内内阁中，军部并非是全面的后退了。

以上仅仅从每一阁僚的出身和背景来观察米内内阁的本质。现在我们从整个的方面来与阿部内阁比较一下。首先是财阀与重臣的力量增大了。关于这一方面，已经用不着多讲，樱内、藤原与池田的心腹石渡的登场，儿玉、广濑的出马是一个具体的证明。第二是政党阁员的增加与官僚势力的衰颓。我们知道从“五一五”事变以后，政党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摒于内阁之外，一直到了近卫内阁出现，方始招请两位政党人物入阁。近卫倒台以后，每一内阁中有两名政党的所谓“伴食大臣”，变成了习惯。到了米内登台，政党阁员由两名变为四名，而且重要的职位如藏相，也请政党人物担任，这自然是一特点。其次是官僚力量在内阁中的衰退。我们知道这在阿部内阁中，官僚力量最为雄厚，所以有人称阿部为官僚内阁。日本大部分资产阶级把阿部内阁经济统制破产的大部分罪过都放在官僚身上，认为官僚只晓得做官，不懂经济为何物，所以要官僚执行统制经济，自然要矛盾百出，斥责官僚之声不绝于口。例如拿到今天还是严重万分的米谷恐慌来说，有许多日本资本家认为米谷并不缺乏，去年受灾区域不广，米谷问题决不至严重如此，所以一口咬定是官僚“独善”的统制所造成的。此外如电力饥馑、煤荒、各地因经济统制而出现的停工减工、物物交换等状态，资本家一起埋怨官僚。政友会的岛田俊雄出任农相，不能不说是这种趋势的反映。本月九日日寇议员古岛议英痛斥递信省办事不力，说彼二十二岁时向递信省要求在家中设置电话一具，当付压金十五元，乃等候三十三



年之久，电话既未装置，押金也未退回。并称三年来递信省接受押金，而未装置电话者已达十万起，所以他带着讽刺口吻说：“余只得将此事列入遗嘱中，俾余之子孙，或有享用电话之一日。”古岛这一席话，自然把官僚政治的腐败，形容得淋漓尽致了。在米内内阁中民政党胜正宪的出任递相，以及大实业家藤原的出任商相，自然也说明官僚势力的退却了。

我们总结上述分析的结果，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断语：米内内阁是重臣财阀扶植的内阁，军部与官僚势力，比较失势，然而拥有庞大势力的军部左右时局的力量，仍然不可轻侮。所以米内内阁决不是重臣内阁，也不是财阀内阁，更不是军部内阁，而是各种势力矛盾统一的内阁。米内内阁的“过渡性”“中间性”基本上与近卫、平沼、阿部三代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财阀重臣与军部是今天日寇国内统治阶层斗争的三个主角。这一个主角的斗争，表现在所谓“国策”上面，主要的分别是：财阀重臣是主张稳健的，它主张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求得在有利条件下，结束中国军事。他们并不对汪逆伪政权太热心，主要的希望全面的结束战争，这是对外方面。至于对内，当然他们也知道目前经济危机严重是侵略中国的结果，所以他们一方面期望着中国军事的有利结束，同时削减军事预算，缓和因侵略军事而促成的统制经济，同时期望除掉军需工业之外，使一般和平产业也获得发展的生机。

至于军部方面呢？对外是主张独霸中国，排除第三国在华权利，积极支持汪逆伪政权，以便进一步掠夺我沦陷区资源。对内则加紧发展军需工业。对那些因军需扩充促成的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昂贵，军阀却说这是官僚们弄坏的，和财阀不热心支持的缘故。假使拿日寇所惯用的术语来讲，则财阀重臣是“现状维持派”，军部所代表的是“革新派”。这两派的斗争，有其长远的历史。具体说起来，团琢磨被杀，犬养毅遇刺，是明朗化的



开端，此后经过“九一八”事变，“二二六”事变，华北事变，一直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这一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当然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是随着局势的演变而不同的。

米内内阁不是一个彻底的金融寡头政权，环境不允许他完全遵照重臣财阀的意志去实行，同时他不是军部内阁，在本质上他仍是一个“夹板”内阁。重臣财阀军部的斗法，只有一天天加深，一天天撼动米内内阁的基础。最近日寇政治上纷争百出，便是因此而来的。

三、最近日寇政争的观察

米内内阁的出现，第一感到不满的，自然是军部。但是上面我们说过，军部因受“天皇优定”的关系，无法正面攻击米内，所以只好侧面来攻击一手扶植米内的重臣汤浅等辈。军部喉舌“国民新闻”认为汤浅是一个阴谋家。最近路透社所传内大臣汤浅将要去职的消息，充分说明军部与元老势力的肉搏。

米内登台以后，首先发难的是内阁参议官，海军方面法西斯首领末次辞职，松井石机出家当和尚。接着，军部方面，更大发宣传小册子，要求日本人民赞助扩充军备，要求英国改变对华政策，否则英日两国紧张局势决难避免。这是军部不放松它“时局指导立场”的表示，无疑也是从侧面给予米内内阁的一个压力。其次便是浅间丸事件的爆发，军部乘此机会，煽动国内的反英情绪。浅间丸事件虽然因为英国的退让政策，事态并未扩大，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军部给予米内内阁的另一压力。再其次，如开放长江问题，军部通过畑俊六之口，狂言并不准备以开放长江来讨好英美，露骨表示无意开放，这更是给米内内阁的一个大打击，使米内内阁缓和英美关系遭受极大的困难。

浅间丸事件过去不久，议会中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的一番质问演说，又引起了轩然巨波。军部乘机以“侮辱‘圣战’目的，



冒读“皇军”二十万英灵”作大帽子，竭力主张开除斋藤隆夫的议席。“国民新闻”则称，斋藤演说中，有若干部分犯大不敬罪。这一风波被军部有意扩大之后，军部更唆使政党中的一部分所谓革新势力大闹清党。现在经过一个多月了，斋藤先是被民政党开除党籍，继被众议院开除议席，民政党社大党的清党风潮仍在酝酿着。由斋藤事件扩大的事态现在尚未平静下来。

所谓斋藤事件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呢？我们仔细分析电讯中所传斋藤当日的演说，以下三点颇引人注意：第一，他质问“东亚新秩序”的具体意义如何？从他的讲演中，可以看出，这便是质问如何来“处理中国事变”。第二点是他暴露日寇国内经济危机，借此反对军阀蛮干的军事侵略。他说，日本在四十年前与中国作战，三十年前又跟俄国作战，统统以国家存亡作孤注一掷，而其牺牲范围绝对不能与今日比较，这完全表明日寇资产阶级对战争的心理。第三是公开暴露汪逆伪政权的脆弱性。他不敢正面提出，所以曲曲折折的说了一大套“新政权”有无兵力？“新政权”树立后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从这三方面看，斋藤隆夫正是彻头彻尾代表财阀在议会中非难军部的代言人。所以日寇议会中的斋藤隆夫“失言”纠纷，实际便是军部与财阀的斗法。

苏联“真理报”评论斋藤事件，很扼要地指出了：“斋藤之‘失言’，充分反映日本内部对解决所谓‘中国问题’之方法，正继续激烈之斗争。此类自由主义者（指斋藤）对奴役中国并不反对，当然与过去二年半来事件之发展（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与日本经济破产）已使彼等对军阀在‘东亚新秩序’招牌下所规定的‘最高’方案的效力发生怀疑。彼等深恐如继续在华作战，将使国内经济日益濒于崩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势必丧失干净。因此宁主缩小范围，即仅取中国若干领土与物资。关于其它部分中国领土，则与英美成立谅解。彼等需要休息，以治愈创伤，再发动完成‘最高’方案。这便是今天财阀重臣与军部斗争的根本